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理解
经济变迁过程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 / 著

钟正生 邢华 等 / 译

杨瑞龙 郑江淮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这本由大师创作的著作将为人们广泛阅读、探讨和争论。它大胆地迈向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是一本比经济增长甚至是经济史更加雄心勃勃的著作。它的主题是经济变迁，并且敢于提出那些对于专业人士而言仍将迷惑多年的论题。

——乔尔·莫可里，西北大学

正如诺思早期的经典著作《制度与制度变迁》引起了主导90年代的理解制度的革命一样，他的新著——《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寻求同样革命性的变迁。现在，诺思把认知成分融入这种分析：意识是怎样运行的，我们是如何形成有关世界的信念和理解的，以及社会怎样解决——或没有解决——它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本书是诺思的上乘之作。

——巴里·温加斯特，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

在这本著作中，诺思再一次开创了经济研究的新前沿。他提倡探究人类意识，以寻求关于个体和社会获取的知识如何在文化上和制度上影响变迁过程的理解。他勇敢地闯入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比较陌生的领域，如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并用这些发现深化了我们对当今时代最为迫切的经济问题的理解：现代技术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可是为何许多经济体仍然未能实现繁荣？

——阿夫纳·格雷夫，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鲍曼·法米利教授、经济学教授

这本著作使诺思的研究历程达到了顶点，并指明了解决当今经济学中最有价值但也最不易解决的问题的方向：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当第一次读这本著作时，我立即发现了它对我研究工作的意义，并开始反思有关经济体及其政府如何相互联系的几个基本想法。从诺思那里学到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这种改变是对其智力影响的最好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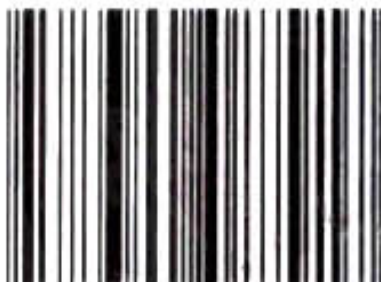
——约翰·约瑟夫·沃利斯，马里兰大学

策 划：马学亮
责任编辑：胡安荣 陈 静
版式设计：赵星华

 COVER DESIGN
装帧设计 / 蒋宏工作室
JIANGHONG STUDIO

ISBN 978-7-300-08791-7/F · 3016

ISBN 978-7-300-08791-7



9 787300 087917 >

定价：26.00 元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理解

经济变迁过程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 / 著

钟正生 邢华 高东明 陈长江 赵晓男 尹振东 王成思 / 译

杨瑞龙 郑江淮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 1 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诺思著;钟正生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ISBN 978-7-300-08791-7

I. 理…

II. ①诺…②钟…

III. 经济发展—研究

IV. F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8037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道格拉斯·诺思 著

钟正生 邢 华 等 译

杨瑞龙 郑江淮 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mm×235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3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1 00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选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洗练，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



“经济学系列”策划人语

经济学到了 20 世纪才真正进入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 20 世纪，经济学第一次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包容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主要的领域。经济学家们在这两个主要的领域不断地深耕密植。使得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日益精细完美。经济学家们还在微观和宏观这两个主干之上发展出了许多经济学的分支，比如国际经济学、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等等。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学的范式，细致的分工带来了专业化的收益。这正是经济

学能够以加速度迅猛发展的原因。

走进经济学的神殿，人们不禁生出高山仰止的感慨。年轻的学子顿时会感到英雄气短，在这个美轮美奂的殿堂里做一名工匠，付出自己一生的辛勤努力，哪怕只是为了完成窗棂上的雕花都是值得的。

然而，21 世纪悄然降临。经济学工匠向窗外望去，发现在更高的山冈上，已经矗立起一座更加富丽堂皇的神殿的脚手架。我们的选择在于：是继续在 20 世纪的经济学殿堂里雕梁画栋，还是到 21 世纪经济学的工地上添砖加瓦。

斯蒂格利茨教授，这位 21 世纪的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经济学的又一个世纪》。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20 世纪的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脱节，这种脱节既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又反映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对立。21 世纪将是经济学分久必合的时代。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也正在试图从微观个体的行为推演出总量上的含义。这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风气转变也值得我们注意。斯蒂格利茨教授曾经讲到，以下两种主张都无法正确估计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一种是凯恩斯式的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没落的悲观思想；另一种是里根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我们已经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我们的时代指引方向。

21 世纪的经济学的将从纸上谈兵转变为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现象。炉火纯青的分析方法和对现实世界的敏锐感觉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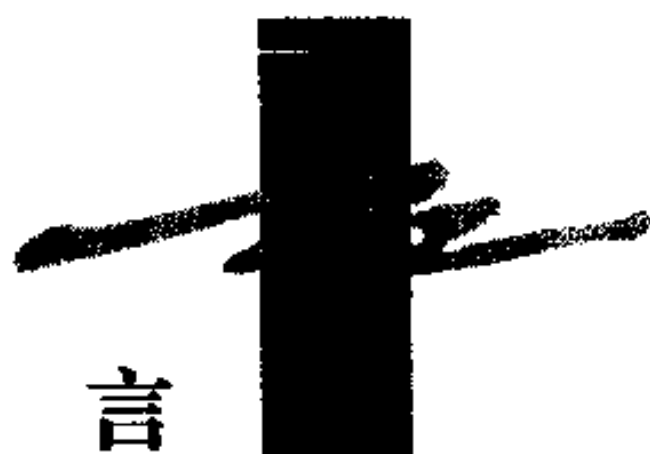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所翻译的主要是处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的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在学术的演进过程中起到的更多是传承的作用。它们是 20 世纪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 21 世纪经济学的开路先锋。这些著作的作者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不仅是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是最好的导师。他们善于传授知识，善于开拓新的前沿，更善于指引遥远的旷野中的方向。如果不惮“以偏概全”的

指责，我们可以大致举出 21 世纪经济学的若干演进方向：博弈论将几乎全面地改写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将日益动态化；政治经济分析尝试用经济学的逻辑对复杂的政策决策过程有一个清晰的把握；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将“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平等、道德等伦理学的讨论也将重新进入经济学。

介绍这些著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追踪国外经济学的前沿。追赶者易于蜕变成追随者，盲目的追随易于失去自己的方向。经济学是济世之学，它必将回归于现实。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更有可能做出突破性的创新，坚持终极关怀的学者更有可能成长为一代宗师。中国正在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也到了关键的阶段。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并不是出于赶超的豪言或是追星的时髦。我们的立足点是，在世纪之交，经济学的发展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思想最为活跃，最为开放。这恰恰契合了中国的当前境况。我们借鉴的不仅仅是别人已经成型的理论，我们想要从中体会的正是这种思想的活跃和开放。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以及留学海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参与了这套译丛的推荐、翻译工作，这套译丛的选题是开放式的，我们真诚地欢迎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在关注这套丛书的同时，能给予它更多的支持，把优秀的经济学学术著作推荐给我们。

前言



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将使得我们能够解释各经济体过去和目前各不相同的经济绩效。我们将能解释美国和欧洲持续增长的长期历史、苏联蔚为壮观的兴起与衰落，并解释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经济体的黯淡表现之间对比鲜明的绩效，以及拉丁美洲与北美对比鲜明的演化。这种认知除了有助于理解已发生的变迁外，还是改进各经济体目前和未来经济绩效的关键。对经济如何成长的真正理解，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提高福利、减少

vii

苦难与赤贫之门。

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理论——并非为解释经济变迁的过程而创立。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并且不断变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停地以全新的方式演化。标准理论在这种背景下解释力有限。为了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我们并不能仅仅抓住其中一种变迁而忽略其他），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能够提出与一般均衡理论相媲美的动态变迁理论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地理解了变迁的潜在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有关变迁的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有限的假说，这将极大地改进社会科学理论在解决人类问题时的有用性。

该研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拓展——一种极大的拓展。简短回顾一下我以前有关制度变迁的研究，将会为这里的拓展提供适当的背景。从最初与兰斯·戴维斯（Davis and North, 1971）以及罗伯特·托马斯（North and Davis, 1973）的合作研究开始，我就一直把制度置于理解各经济体的中心，因为它们构成了各经济体的激励结构。但我同样关注那些为停滞和萧条提供激励的制度所构成的经济体是怎样持续的。这种持续性的潜在源泉，正是人类环境以及人类解释这种环境的方式的特征。在先前的研究中，我没有考虑社会变迁的特征、人类理解并作用于这种社会变迁的方式。

经济变迁是一个过程。在本书中，我将描述这个过程的本质。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反，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是参与者的意向性。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选择机制并非由有关最终结果的信念所决定。相反，人类的演化是由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的；选择——决策——是根据这些感知做出的，这些感知能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目标过程中降低组织的不确定性。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感知来自于参与者的信念——关于自身行动结果的推测——这一信念通常与他们的偏好混为一谈。

但是，人类究竟是怎样开始理解自身环境的呢？他们得出的解释是，从当代和历史经验中衍生的心智结构（mental constructs）。人类学

习不仅仅是单个个体终其一生的经验累积，而且也是过去数代人的经验累积。社会的学习累积体现在语言、人类记忆和符号存储系统——包括构成社会文化的信念、神话和做事方式中。文化不仅决定某一时期的社会绩效，而且通过它的支持性框架（scaffolding）约束参与者，从而影响长期的变迁过程。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人类学习——学习的内容、学习在社会成员之间分享的方式、信念和偏好的渐进变化过程以及长期内学习影响经济绩效的方式。

人类建立的支持性框架部分是一系列成功变异的演化结果，因而是人类基因结构的一部分，例如相互作用的小群体内部的先天合作；部分是文化演化的结果，例如有利于更大群体内部合作的制度的发展。在究竟什么是基因结构与文化遗产之间的融合这一点上存在着争论。演化心理学家强调了建立支持性框架过程中的遗传成分，却忽略了文化遗产的作用。人类心智结构中的某种一般性，例如超自然的解释——广义的宗教，表明这些结构适用于全人类的潜在推理结构。同样地，社会绩效特征的巨大差异表明，在历史过程中人类建立的支持性框架中的文化成分也是影响经济和政体绩效变化的核心。

贯穿历史的人类意图与结果之间的巨大差距，反映了人类构建的用来理解人类行为的支持性框架与人类行为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的持续张力。这种张力以及它对过去、当前甚至未来的人类环境的含义是本书的主题。本书第一部分探讨了深入理解经济变迁过程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第二部分则引领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做更深入的理解。

只有理解了经济变迁的过程，我们才能有效地建立经济变迁模型。首先，就一个好的模型而言，对构成这个过程的复杂要素有一个基本理解是必需的，然后需要谨慎地简化以得到关键元素。理解变迁过程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点正是经济学家急于建立经济增长和变迁模型过程中所缺失的。完全理解这个过程，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在试图改进经济绩效的过程中将只会取得极为有限的成功。下文正是改进我们理解的一种尝试。

该研究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超过了十年——并且是在许多组

织和个人的慷慨帮助下才得以完成的。

我主要的工作场所华盛顿大学，以及我冬季的寓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都为我提供了服务周全的研究环境。乔治·梅森大学的美国市场研究中心以及斯坦福国际研究院举办了本书相关问题的会议，我深深地感激前一个组织的保罗·爱华德和布雷恩·胡克斯，还有赛德·沙瑞克，他在组织斯坦福会议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耐心地容忍了我无穷无尽的疑问和争论。我特别感激李，亚历山大·贝纳姆，帕斯卡·博耶，兰德尔·卡尔弗特，约翰·德罗巴克，苏库·金，杰克·奈特，加里·米勒，约翰·奈，诺曼·斯科菲尔德，以及伊泰·赛尼德。

在斯坦福，保罗·戴维，史蒂夫·哈伯，阿夫纳·格雷夫，沃尔特·鲍威尔，纳特·罗森堡以及巴里·温加斯特在我的知识更新方面一直有特别的帮助。

关注本书相关问题的会议参与者（除了上述列举的之外）李·奥尔斯顿，罗伯特·库特，莱达·科西米德，思雷恩·埃格森，琼·恩斯明格，格雷戈里·格罗斯曼，菲利普·霍夫曼，蒂穆尔·库兰，克里斯·曼特维罗斯，乔尔·莫可里以及弗农·史密斯对我也颇有帮助。

我对凯文·麦凯布心存感激，他与同事们在乔治·梅森大学的实验室合作构造实验，检验了对本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系列命题。与安迪·克拉克以及默林·唐纳德的长时间的讨论，增进了我对认知科学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

乔尔·莫可里和约翰·沃利斯通读了手稿并提出了详尽的评论；菲利普·基弗在尼泊尔工作时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彼得·多尔蒂也对整个手稿提出了详尽的评论。他们的评论极大地改进了终稿。

我在电脑操作上的笨拙由能干的专家做了很好的弥补——圣·路易斯的鲍勃·帕克斯、佛罗林·彼得斯库以及胡佛的丹·威廉米反复地纠正我的错误。我对两位能干的研究助手阿特·卡顿、尤里·苏克多斯基以及秘书范妮·贝特也表示谢意。

我要深深的感谢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凯丝，她不仅编辑了整个手稿，而且忍受了本书冗长有时甚至是令人厌恶的酝酿过程所带来的负担。

我同样对允许使用下列文献心存感激：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ouglas C. North, "The Paradox of the West," from R. W. Davis, ed., *Origins of Modern Freedom in the West*, copyright 1995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r. University. xi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Douglas C. North, William Summerhill, and Barry Weingast, "Order, Disorder, and Economic Change," from B. Bueno de Mesquita and H. Root, eds., *Governing for Prosperity*, copyright 2000 by Yale University.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Douglass C. North

Copyright © 2005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6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目 录

第 1 章	经济变迁过程概述.....	1
	I	2
	II	5
	第一篇 理解经济变迁所涉及的问题	
	引言	11
第 2 章	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	13
	I	14
	II	18
第 3 章	信念体系、文化和认知科学	22
	I	23
	II	24
	III	26
	IV	28

	V	30
第 4 章	意识和人类的意向性	36
	I	37
	II	41
	III	43
第 5 章	人类搭建的支撑结构	45
	I	47
	II	47
	III	49
	IV	55
第 6 章	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	60
	I	61
	II	63
	III	64
	IV	65
	V	71
第二篇 前方的路		
	引言	75
第 7 章	不断演化的人类环境	78
	I	79
	II	89
第 8 章	秩序和无序的根源	92
	I	93
	II	95
	III	96
	IV	97
	V	100
第 9 章	正确理解和误解	103
	I	104

II	107
III	108
IV	111
第 10 章 西方世界的兴起	113
I	114
II	117
III	118
IV	120
V	122
第 11 章 苏联的兴衰	130
I	131
II	133
第 12 章 提高经济绩效	139
I	140
II	142
III	143
IV	145
V	146
第 13 章 我们走向何方?	149
I	150
II	151
III	151
IV	152
注释	154
索引	162
参考文献	175



第1章 经济变迁过程概述

理解包括从西方世界的兴起到苏联的衰落在内的所有经济变迁，比理解纯粹的经济变迁更为宽泛，因为它是如下各种变化的结果：（1）人口的数量和质量；（2）人类的知识存量，特别是人类用于控制自然的知识存量；（3）界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框架。因此，一个完整的经济变迁理论需要整合人口统计学、知识存量和制度变迁的理论。我们在这三个中任一个都没有完善的理论，更不用说将三者综合起来了，但是我们正在取得进步。本研究的中心和改进经

济绩效的关键在于人类控制环境的刻意努力。因而，这里把制度变迁置于优先的位置，随后是其对人口和知识存量变迁的激励含义；但并不是说这种方法就很好地处理了后两个问题。

我们为减少不确定性而施加于生活之上的结构是命令、禁止的累积以及作为这一累积的一部分不断演化的人工制品。结果就是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一种复杂混合。这些约束蕴含在语言、物理制品和信念之中，它们共同规定了人类相互作用的模式。如果我们把注意力狭隘地集中在经济学上，那么我们关注的就是稀缺性，进而是对资源的竞争。我们施加的使竞争有序的约束结构影响了博弈方式。由于不同的市场（政治的和经济的）有着不同的竞争得以进行的边界（margins），我们所施加的结构就将决定竞争性结构是导致经济效率递增，还是经济的停滞。因此，能够激励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完备产权将会提高市场效率。政治和经济市场的演化结构是解释经济绩效的关键。

我们所施加的结构可以减少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但并不能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所施加的约束本身会带来不确定的结果，这一点反映了我们对环境的理解是不完美的，同样，我们用来实施这些约束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机制也是不完美的。

本书研究了人类为获得对自身生活的更大控制所做的无尽努力，以及在此努力过程中不断遇到的需要解决的新的甚至前所未有的问题。本书也是关于感知的研究，这些感知能够引致旨在减少不确定性或把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的制度创新。本书还研究了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这一行为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从“非理性”解释中得出的政策通常对我们创造的结构产生影响。

I

有关经济变迁过程的一个简单描述是直截了当的。一个政治经济体系的“真实面貌”永远不为人所知，但人类确实构造了有关这个“现

实”本质的精巧信念——这种信念既是政治经济体系运行方式的实证模型，也是它应该怎样运行的规范模型。社会可能广泛地持有这种信念体系，从而反映了信念的一致性；或者持有广泛不同的信念，从而反映了对社会感知的基本分歧。主导信念——那些处在做决策位置的政治和经济企业家的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促成了决定经济和政治绩效的精致的制度结构的共生。当企业家为了提升自己的经济或政治地位而寻求创新或修改制度时，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对他们的选择集就施加了严格的约束。尽管某种类似于演化生物学中的断点均衡变迁的过程（punctuated equilibrium change）也会发生，但是由此导致的路径依赖却通常使得变迁是渐进的。但是，当企业家制定改进自身竞争地位的政策时，变迁正持续不断地发生（虽然发生的速率依赖于组织及其企业家之间的竞争程度）。结果是，企业家的活动引起了制度体系的变更，制度体系的变更修正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感知，认知的改变又进一步引致企业家在一个永无休止的变迁过程中提高自身地位的新努力。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关键在于促使制度发生变迁的参与者的意向性以及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整个历史以及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是短暂的，要么是因为参与者的意图并非社会福利，要么是因为参与者对问题的理解是如此得不完善，以至于结果极大地偏离了最初的意图。

整个经济变迁过程的本质，可以通过对苏联兴衰过程（这将成为下文全面深入分析的主题之一）的简要描述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信念体系解释了世界的运行方式和未来的道路，成为了列宁革命灵感的源泉。俄罗斯 1917 年饱受战争折磨的境况则为突然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虽然马克思没有提供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或建设的蓝本，但他提供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框架，特别是关于所有权的观念一直被苏联领袖奉为圭臬（以及约束）。然而，严峻的形势迫使列宁和俄共远离了那些基本原则，并导致了 1921 年新经济政策（NEP）的创立；1928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回到了正统的意识形态。在最初的几年里，有关不同战略和制度的大量讨论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由此形成的复杂制度体系的逐渐扩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成功——例如重工

4 业，和失败——例如农业，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正统信念体系下纠正失败的种种尝试。随着经济的成长、纳粹入侵的毁灭性折磨以及随后的长期重建过程，制度体系不断地被外部激励——战争或者对必要的制度变更的内部感知——所修正（这种内部感知受到了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限制之内不断演化的信念体系的引导）。其结果是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物质产出、军事技术和科学知识的快速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超级大国的出现。

在这一时期，整个世界几乎一半的人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被广泛认为是未来世界的潮流。但是，随后增长开始减缓，农业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修修补补的制度变革努力不再有效。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其随后 6 年的政策导致了生产绝对地衰退以及 1991 年苏联的解体——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由国家内部引致快速解体的最惊人例子。

苏联的故事是一个“可感知的现实→信念→制度→政策→改变了的可感知的现实”如此循环往复的故事。理解苏联故事的关键在于：来自（因政策颁布而）改变的可感知现实的反馈修正信念的方式、制度矩阵的适应性效率——当结果偏离意图的时候，制度矩阵应对变更的灵敏程度，以及作为对可感知的失灵的矫正措施的正式规则变迁中的诸多限制。

提供对经济变迁过程的一个概括性描述只是一个方面，为这个描述提供足够的内容，从而让我们理解这个过程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现实？信念是怎样形成的？谁的信念重要，并且个体信念是如何加总为信念体系的？信念和信念体系是怎样变迁的？信念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制度是怎样变迁的？制度是如何影响绩效的？什么东西能够解释迥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绩效模式？并且，可能最为根本的是，制度变迁过程的核心本质是什么？这些仅仅是本书所探讨的一部分问题而已。本章余下的部分将详细阐述变迁难题的各个组成部分。

II

5

驱动人类努力的深层动力是什么——是来自意识的人类意向性的源泉吗？人类让自身的环境易于理解——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努力无处不在。但是，正是人类使自身环境易于理解的努力导致了环境的持续变化，并因而给理解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对经济变迁过程的研究，必须从探究人类在一个非各态历经的世界里处理和面对不确定性时所做的无所不在的努力开始。

究竟什么是我们试图在理论中模型化的东西，是信念还是意识形态？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关注我们的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实现一致时，我们制定的政策才有可能产生想要的结果。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误解现实的概率远比正确理解现实的概率大得多，因而认识现实的本质就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搞清楚现实究竟是如何变化的。信念及其演化方式是本书理论问题的核心。除了极少数重要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思想观念在决策中的作用。理性假设很好地迎合了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在微观理论中范围有限的一些问题上的研究需要，但在处理与本研究有关的中心问题时却是一个缺陷。^[1]的确，对理性假设不加鉴别地接受对社会科学家所面对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破坏性的，并且也是未来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理性假设没错，但是在面对我们自己创造的复杂世界的不确定性时，不加批评地接受这个假设就会妨碍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决策过程。

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解释世界的方式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意识和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这是认知科学的主要课题。认知科学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为探究社会科学现象提供重要的启示。这些问题包括，人类怎样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从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做出反应、人类学习的本质、人类学

6 习与信念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意识与人类意向性对人类强加给自身环境的结构的含义。

为了减少人类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人类试图用自身关于世界的感知来建构所处的环境。但是，谁的感知重要以及如何使之转化为对环境的改造则是制度结构的结果。制度结构是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的结合。这种人类相互作用的结构决定了谁是企业家、谁的选择重要以及这些选择怎样由这个结构的决策规则来强制实施。制度约束随着时间不断累积，我们因袭过去、决定现在并影响未来的那些规则、标准和信仰的累积结构就是社会文化。当政治和经济企业家觉察到新的机会或者对影响他们福利的新威胁做出反应时，制度通常会加速变迁。制度变迁可以源于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或其中之一的实施方式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演化方式是决定谁的决策重要以及他们如何合谋影响政策的关键。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片断放在一起（非常不完全地）探索一下经济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由演化生物学中推导出来的模型相似吗？参与者的意向性重要吗？作为制度变迁直接源泉的意向性的本质是什么？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是源于人类行为内在的不稳定性，还是源于我们对社会环境的感知和信念体系？路径依赖的潜在源泉是什么，并且路径依赖究竟怎样影响绩效？最后，什么导致了适应性效率——某些社会面对冲击进行灵活调整的能力，以及改进制度以有效处理变化了的“现实”的能力？

7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运用第一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试图对历史和当代的变迁过程提供一个更深入的解释。我宽泛地勾画了自人类从其他灵长目动物进化而来的几千年来人类行为的变迁，并且特别关注过去的两千年。这里重点强调被构造用以对付物理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制度与那些被构造用以应对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制度之间的明确分界线。在将制度框架从适合应对物理环境的不确定性转换到能够处理现代人类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困难，是许多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核心。

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国，我们易于视秩序为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该如此。无序——革命、缺少个人安全、混乱——刻画了人类环境的大部分特征，正如拉丁美洲的混乱历史所证实的。秩序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减少，不确定性的减少反映了作为制度结果的人类环境的特征，而制度对人类的作用会有更强的预测能力。政治和经济市场的不稳定关系带来的结果是，个人和组织的权利及特权随时可能被剥夺，所以这种无序增加了不确定性。理解秩序和无序的潜在条件，对于认真研究经济变迁的过程非常关键。

我们在把握自己命运方面有多成功？遵循赫伯特·西蒙——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些问题——的传统，人类远未达到完全理性要紧吗？我们知道，完全理性需要有关各种可能性的全部知识和对决策树的彻底探究，以及在行动、事件和结果之间建立正确的映射。简短的答案是，很重要。经济史是一部由错误计算导致的饥谨、挨饿、战败、死亡、经济停滞和衰退，甚至整个文明消亡的令人沮丧的故事。即便是对当今新闻最偶尔的检视，也表明这种故事并非是纯粹的历史现象。然而，在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是做对了，正如过去几个世纪蔚为壮观的经济增长所证实的。但是，当前的成功绝不是预知的结果。

促使西方世界兴起的信念以及随后的制度说明了精明的判断、好的运气等因素的融合（或多或少地）促成了正确的理解。更为重要的目标是讲述一个动态的故事——探讨历时的成功变迁过程。苏联的兴衰是人类努力创建美好社会的审慎探索，我更深入地探讨这个主题是为了详细阐述经济变迁过程的两个侧面：（1）在参与者知识非常不完全的条件下，试图去改变社会框架所涉及的内在困难；（2）社会在试图进行根本性变革时面临的旨在竭尽全力克服僵化和错误信念的非一体化过程。从第三世界和转型经济体改进绩效的努力中得到的经验累积，以及从成功的故事中学到的东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原始的实验室，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对这个过程所知甚微。但是，我们正在学习；并且我将描述，为了改进对这个过程的理解，我们已经学到了什么以及仍然需要学什么。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本质的一个清晰含义是，这个过程对人类的预见力施加了限制。在本书中，我将探讨我们对未来究竟知道了多少，以及还有多少仍属于占星术、预言家以及政治家的领域。这一研究表明，在面对非各态历经世界中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时，对人类的未来的评价应该慎之又慎。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第一篇

理解经济变迁 所涉及的问题



引言

我们必须提出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呢？我们拥有的理论是静态的；虽然一个真正动态的理论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所及，但我们可以把时间维度作为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对随时间推移的经济运行做一系列的概括。我们的目标必须集中于那些奠定了这个过程的基础并解释了这个过程的因素。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的理论——到目前为止，一直都还不错。但是，这门学科忽视了对选择发生的背景的探讨。我们本质上是在可供选

11

择的人类意识构造物中进行挑选。因此，意识如何运转以及如何理解环境的本质是本研究的基础。但是，环境是什么？社会环境是规定人类相互作用框架的规则、标准、习俗以及做事方式的人为构建。社会环境规律被社会科学家细分为各个不同的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但是我们需要从社会环境中分辨出的人类意识的构建并非与这些人为的分类相一致。如果我们试图理解变迁的过程，我们的分析框架就必须整合从这些人为的单个规律中得到的洞见。而且，我们必须理解驱动人类做出构建的潜在力量是什么。为什么存在规则、规范、习俗以及做事方式？是什么诱导了人类意识以这种方式去塑造人们的相互关系？新制度经济学（NIE）把我们引入途中。它关注人类提出的解释自身环境的信念以及人类为塑造自身环境所创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是什么因素促使人类去从事这些人为的构建，然后提出并扩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工具，从而为清晰地探究经济变迁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框架。

第2章 非各态历经世界的 不确定性

我们正踏上的智慧之旅要求我们反思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些基础，特别是那些有关本章的两个主题——不确定性与各态历经的基础。通常，经济学家不会反思人类强加于自身的结构，这种结构旨在控制人类所处的环境，并因此而减少不确定性；他们通常也不会关注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动态特征，这个世界不断产生需要解决的全新问题。最后一点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断地创造全新的世界，我们从过去经验中形成的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

13

这个全新的世界呢？这些问题是本研究的核心。我们必须深究引致人类设计的这种结构的力量的深层源泉。仅仅描述社会变迁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试图找到影响变迁过程的潜在力量。

I

不确定性在经济学文献中有很长的历史，通常可以追溯至弗兰克·奈特在 1921 年出版的一本经典著作中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奈特认为，风险是一种能够推导出结果的概率分布的状态，因此可以对这种状态进行保险。根据奈特的观点，不确定性是一种并不存在这种概率分布的状态。因此，根据诸如肯尼思·阿罗（1951）和罗伯特·卢卡斯（1981）这样的杰出理论家的说法，在不确定条件下建立理论是不可能的。最近，这两个术语经历了一些语义上的变化，不确定性开始用来表示奈特所说的风险，而模糊性则开始用来指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1]但我仍将按照奈特的定义使用这两个术语，虽然在下文的讨论中会做一些变化。

经济学家自己在这个主题上表现出了很大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好像不确定性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状态，因而通常的确定性状态能够保证建立优美的数学模型，而这恰是正统经济学的特征。但是，不确定性并不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状态；它一直是形成整个历史和史前的人类组织的结构演化的潜在条件。为了恰当地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区别于奈特的方式重新定义这个术语。奈特把他的定义局限于概率标准；一个更一般的观点是，人类普遍存在着使自身环境更易于预测的动力。这种动力包罗万象，从把结果表示为统计意义上的可能性，到试图减少那些我们没有任何线索了解其可能的结果的不确定性——诸如原子能对人类未来的影响——的所有事务。罗纳德·海纳在一篇对经济分析至关重要的论文中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不确定性是“可预测行为的根源”（Heiner, 1983）。海纳的论文指向了制度创新的根源，他称之为 C-D 之差——

个体能力与所决策问题的难度之间的差距。人类在这种差距面前，将会构造一些规则去限制这种条件下选择的灵活性。我们把这些规则称为制度。通过把选择导向一个更小的行动集，制度可以改进人类控制环境的能力（但这并不是说人类的感知就是对的）。海纳把我们引向本研究余下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制度框架的构建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主要支柱。

人类构造的信念和制度，仅仅在作为对人类在不断演化的物理和人类行为中已经面对的而且还将继续面对的不同水平的不确定性做出的持续反应时才有意义。虽然人类塑造环境使其更易于预测的努力一直是并将持续是制度的深层的潜在源泉，但是这种努力可能并且通常确实增加了一部分参与者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例如，完备产权的界定将使得整个环境更易于预测，但是会增加那些传统上使用有争议的土地却没有正式手续的人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要提出的一个本质问题是，谁制定了规则、规则是为谁制定的以及它们的目标是什么。^[2]当经济学家使用（以及误用）效率^[3]这个术语时，在制度和效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区分。事实上，一个需要解释的主要难题是，人类怎样以及在何种状况下创造条件，从而导致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和物质福祉的不断增长。

15

通过探讨人类试图使环境更易于预测的方式，我们可以就有关规则的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回答。每个人都是在面对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环境下开始生活的。人们通过积累两种经验——那些从物理环境和那些从社会文化语言环境中学得的经验——而减少了这种初始的不确定性。文化不同，经验也不同，不论是在某一时点上还是在一个历史过程中，人类对环境从而对不确定性有不同的解释。因此，了解学习在意识中是怎样发生的对于理解人类怎样处理不确定性非常关键。

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大量不能够用理性来解释的现象——一部分需要用魔法、巫术、宗教中的非理性来解释；一部分则需要用教条、偏见、“半生不熟”的理论所表现的、更加平淡无奇的非理性行为来解释。^[4]事实上，尽管如上述引用的杰出理论家所论述，建立一种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理论是不可能的，但是人类一直试图做到这一点；他们做出了各种努力，从前文的论述和那些包括在“保守”和“自由”标签

16

里的、结构松散的信念，到诸如马克思主义的优美的、系统化的意识形态或者有组织的宗教。

人类历史的总体特征一直是与物理环境相关联的、可观察的不确定性的系统性减少，从而那些需要用魔法、巫术、宗教中的信念来解释的不确定性的源泉也减少了。但是，如果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降低了，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环境更大的复杂性。虽然我们在理解这种环境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我们的理解仍然非常有限，而且还有大量的非理性解释的特征。我们理解有限的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科学中还没有出现可以与物理学中的定理相媲美的基本“公理”。一个更为基本的原因则是我们不断加以改造的世界的非各态历经的本质。各态历经的经济是一种潜在的基本经济结构恒定不变，即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经济。但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经济是非各态历经的——一个新奇变化不断涌现的世界；理解这种不断变化的世界需要全新的理论，或者至少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理论做一些修正。因此，虽然科学上取得的令人敬畏的进步极大地减少了物理环境的不确定性，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搞对了”。记住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人类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改变环境以使其更易于预测的。我们回到不确定性的定义，并把这个术语分解为不同的层次：

1. 给定现有的知识存量，可以通过增加信息的方式来减少的不确定性^[5]；
2. 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可以通过提高知识存量的方式减少的不确定性；
3. 只有通过改变制度框架才能减少的不确定性；
4. 在全新条件下，使信念必须重构的不确定性；
5. 为“非理性”信念提供基础的那些不确定性。

经济史学家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写出探究其中每一个历史过程的经济史。下面是有关每一类别的简要阐述：

- 17 1. 有关人类活动特征的更多信息的出现导致了可预测性。例如，15 世纪海洋保险的发展使得收集并对比有关轮船、货物、目的地、航

行时间、海难和损失的信息成为必要，从而把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海洋保险是现代欧洲早期贸易不断增长的主要因素。

2. 知识存量的增加一直是人类福利增加的基本源泉。^[6]某些知识存量的增加并未伴随着导致激励变化的制度结构的变迁。整个人类历史上，在现存制度框架下知识存量的增加都是无所不在的人类发明和创新的动力的结果，即使是在缺少制度激励的条件下，正如有关人类创造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记述所证明的那样。知识存量增加的其他主要源泉有相对价格的变化或信念的改变，两者都导致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整个人类历史上，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根本变化改变了获取有关这些生产要素的知识的激励结构。例如，新石器革命以及欧洲 14 世纪瘟疫的出现，都导致了根本性的社会重组、资源重新配置以及知识的获取（见 North, 1981, chapters 7、10）。至于信念的变化，最终是观念及其造物——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的——构成人类环境的基本驱动力，也构成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18

3. 制度框架的改变使得激励结构的变化成为必要，并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环境不确定性的关键条件。它一直是人类试图去有意改变自身环境的主要工具。它包含了当代世界改进第三世界经济体绩效的种种努力。从历史的角度看，制度变迁改变了合作行为的收益（例如契约的依法执行），提高了发明和创新的激励（专利法），改变了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收益（建立制度以整合复杂经济体中分散的知识），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创设司法体系以降低契约的执行成本）。

4. 人类对全新环境的反应依赖于环境到底有多新以及参与者的文化遗产。他们的文化遗产在许多情况下将决定参与者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化遗产使得他们能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做出使这种环境更加易于预测的反应。如果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他们可能会做出不恰当的反应或把问题归结为魔法和/或类似的反理性反应。经济体对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的不同反应有助于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那些逐渐演化出能够导致非人格化交换制度的创立的文化遗产的经济体成功地应对了这种基本的新颖性。而那些

没有这种文化遗产的经济体则失败了，正如阿夫纳·格雷夫（forthcoming a）所证明的。

19 5. 尽管事实是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已经极大地减少了（虽然导致了社会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但是其余的导致非理性信念的不确定性在当今世界仍然和整个历史上一样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宗教信念的历史和传播就是例证。宗教信念体系，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影响社会变迁上一直并将继续起着主要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传统意识形态和信念体系在决策中的关键作用，正如苏联的兴衰所清楚说明的那样。

II

在韦伯词典中，各态历经被定义为“涉及或与任何状态的重复发生相联系的概率，尤其是任何状态永远不再发生的概率为零。”因此，“一个各态历经的随机过程仅仅意味着根据过去观察计算的平均数不会持续地不同于未来结果的时间平均数”（Davidson, 1991, 132）。在萨缪尔森看来，各态历经假说对科学的经济学尤为关键（Samuelson, 1969, 184）。事实上，在当前的许多经济理论中，各态历经假设是隐含的。罗伯特·索洛在讨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时，阐述了如下观点：“我的印象是，经济学专业中最好的、最耀眼的假设仿佛是，经济学是社会物理学。存在一个关于世界的单一的、普适的有效模型，只需要应用它就够了”（Solow, 1985, 330）。

然而，对于经济史学家而言，在总结从新石器革命开始以来的一万年的人类历史的各态历经假说是反历史的。而且，毫无疑问，当今社会各个方面的超常变化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我们一直在并正在创造的社会与过去任何社会相比，显然是独一无二的。

自然科学借助于简化来得出基本规律，使得它们的科学（可能）是各态历经的。社会科学没有这种基本规律，除非有一种行为假设，并且

即使这样仍被证明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认知科学研究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从过去经验得出的理论对于理解当前和未来是无关的。微观经济理论不断地展示了它对经济绩效各方面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我们必须解决的是，在一个非各态历经的世界的具体环境中该用哪一种理论以及该理论的适用性。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理解了非各态历经世界的本质特征。

20

准确地说，什么是永远变化的东西？是物质世界吗？是的，它是变化的，但是我们的主题是社会环境。并且我们今天已经在使得环境更加易于预测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因此，我们能预测明天将会怎样吗？答案是这种预测的时效性非常短。我们今天造就的环境变化为明天创造了一个新的并且在许多情形下全新的环境——“全新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历史经验来为我们应对这种环境作准备。我们回到前一部分的阐述上：

1. 海洋保险的出现是扩展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个主要步骤，但是随之而来的含义是必然激起对15世纪商人的敬畏。

2. 历史上，战争技术演化的结果是导致了没有预期到的也不可能预期到的社会变迁。在一个更微观的层面上，存在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创造性破坏特征的洞见，这种创新连续不断地产生预想不到的变化，这不仅体现在特定的革新产品上，而且体现在对社会变迁的范围更广的后果上，例如，汽车在过去一个世纪带来的影响。新石器革命以及14世纪的瘟疫，两者都为社会带来了里程碑式的根本性变化。至于不断变化的信念，它们是变迁的基本动力——其中一部分被预期到了，但是大部分则没有被预期到。

3. 导致物理环境不确定性下降的制度变迁创造了复杂的社会环境，它又进一步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不确定性（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仍然没有解决）。过去几个世纪的技术革命使得人类福利达到了对于过去而言不可想象的水平，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个相互依存、外部性普遍存在的世界，从而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不确定性。商法、专利法、分散知识的制度整合和司法系统的创设，已经构成了使发达国家市场更有效率的努力

21

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它们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具有未来不确定性的未知世界。当这种制度变迁应用于第三世界经济体时，它们经常会改变收入分配并产生政治的不稳定，有时甚至导致与预期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

4 和 5. 但是人类怎样处理真实的新奇性呢？如果非各态历经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参与者的历史经验已经使得他们能应对这些问题（前三种不确定性），那么他们可能会有效地解决。然而，在真正的全新条件下，我们面临不确定性并且我们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那么成功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就仅仅靠运气了，而且参与者将会求助于非理性信念。事实上，非理性信念在社会变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前述论述表明，路径依赖——从过去衍生而来的制度和信念影响目前选择的路径——在这种灵活性中起着关键作用。那些过去的经验使人们以怀疑和憎恶的态度来看待创新性变化的社会，与那些文化遗产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一个适宜环境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成这种不同文化遗产的潜在原因在于每一种情形下参与者共享的心智模式。

未来将会反映我们对自身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感知，随着我们对社会（物质）环境的改变，这种感知也会经历持续的变化。为了了解未来，我们今天必须知道明天我们将会知道什么。为了对我们将走向何方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我们必然要关注意识运行的方式，并搞清楚我们的外部环境。我们人类的思想以及更加结构化的信念影响我们不断做出的改变这种环境的决策。当我们把不完美感知产生的问题与非各态历经中产生的问题结合起来时，我们得到了如下混合结果，这些是本研究的核心^[7]：

1. 完美感知：

a. 静态不确定性——不能确定世界在任何时刻的概率分布。在一个静态世界里，不确定性是知识存量的函数。如果个人有完美的感知，那么即便在不确定条件下，可能也不需要制度。如果这种静态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重复，那么不确定状态趋向于零将是可信的。

b. 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形与静态不确定性之间的

唯一区别在于不确定状态是随机生成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存在一定水平的残留不确定性。

c. 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系统性关系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因此，新的、完全不同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出现。即使个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完美的理解力，在既定的世界历史中，他们的行动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新层次的不确定性总会出现。在某种意义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会贬值。

2. 不完美感知：

a-b. 静态不确定性和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如果个人对环境的感知是不完美的，那么即使静态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断重复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持续存在。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是否有一个最优的学习规则。个人的不完美感知可以定义为对风险状态一个错误的概率分布估计，或在对不确定状态分配概率时发生了错误。非理性信念可能属于后一类情形；换言之，人们为并不能“合理”地分配概率的不确定状态分配了某种概率。在一个不完美感知的世界里，不确定性是知识和制度的函数。

c. 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这里的主要变化是，在一特定时刻采用的制度，即使在这个时刻是最优的（换言之，正确的感知），当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时，也可能远非最优的。人类如何应对这种全新的发展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3章 信念体系、文化 和认知科学

23 只要一想到我们对“现实”总是有着不完美的理解，对人类行为经常会产生相互对立或者冲突的观点，我们就应该着手研究人类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人们持有的信念决定了他们所做出的选择，然后，这些选择建构了人类行为的变化。人们怎样来认识人类的行为，他们怎样学习，以及他们学习什么，这是本章的主题。作为理解社会信念的必要条件，让我们先来研究个人的心智。

理性假设是经济理论（并且越来越

成为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有大量的文献对这个行为假设的无效性和局限性进行了研究。^[1]在价格信息充分的竞争性市场上,经济学家所采用的充分理性假设是非常有效的。在竞争性环境这样的条件下,价格被视为一个有效的参数,人们只需要选择买或卖的数量。如果所有的选择都是简单的,选择很频繁,而且能够得到具体而迅速的反馈,同时人们有足够的动力进行选择,那么只需要理性假设就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理性假设既是对均衡条件做出的一个预测性和描述性模型,又是一个通常用来描述偏离均衡的动态变化的学习模型。但是一旦我们脱离这个简单的竞争模型,价格取决于其他的买家和卖家,决策的复杂性就会增加,这时我们就需要深入研究认知过程。特别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这在前面几章讨论过。在利用纯粹形式的理性假设分析包含不确定性的复杂问题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的研究取向已经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障碍。

24

很多需要解决的有趣的问题来自于人类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的互动关系,在这些环境中,参与人具有不完美的信息,对他们行动的反馈同样也是不完美的。这并不是说理性假设是“错误的”,而是说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理解人类在各种重要情况下选择的指南,而这对于变迁的过程却是最为基础的。不完美信息和反馈是不确定性的最普遍的特点;同时,理性假设也没有充分解决心智和环境的关系。在上述观点中,前者是第2章的主题,但是后者还需要加以充实。

I

“任何思想都来自于大脑。但是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思想的流动和理智的适应性成功取决于与外部资源之间不断重复的至关重要的交互活动。这种交互活动具有明显的意图,并且能够传递信息:它的目的是为了转化投入,简化搜寻,帮助认知,改善人们的联想能力以及转存记忆等等……大脑和世界之间的协作方式比以前人们预想的更加丰富,更

加受到计算和信息需要的驱动” (Clark, 1997, 68—69)。这个论断对于社会科学理论化的意义在于, 很多被我们看作是理性选择的东西, 与其说是个人认知, 倒不如说是根植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之中的思想过程。萨茨和弗里基 (Satz and Ferejohn, 1994, 72) 总结道: “[传统的] 理性选择理论在选择受到限制的环境下最具有解释力。” 克拉克 (1997, 1982) 这样解释: “当政策、基础设施和惯例等外部的支撑体系非常强大, 而且 (重要的是) 当这个支持性框架是竞争选择的结果的时候, 个体成员实际上就成为安装在一架巨大机器上的可以更换的齿轮。这架巨大的机器在个体外部扩张, 将大规模的社会、物质甚至地缘政治结构整合进来。传统经济理论在建模方面通常获得成功的地方正在于对这架机器的运作及其原因的不断思考。” 如果我们对这个过程的理解还不是很完善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更好地把握认知过程、信念结构与制度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

II

如果我们能够说, 认知科学已经足够成熟, 可以给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将会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实际并不是这样, 但是它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并且将来有希望对问题作出更权威的解释。^[2]

从广义上说, 人类的学习过程可以描述为认知过程, 这个过程如下:

学习需要建立一种结构来解释感官所接受 (到) 的信号。这种结构的构造最初来自遗传, 随后的发展来自个体的经历——包括从物理环境以及社会—文化语言环境中得到的经历。这种结构由很多类 (categories) 组成——这些分类从最早的童年时期逐渐演化而来, 以此来组织我们的感知活动, 使我们对分析结果和经历的记忆更加明了。在这些分类的基础上, 我们形成心智模型来解释和理解环境——这些解释通常与某些目标相关。类和心智模型也会演化,

以反映从新的经历中所得到的反馈：这些反馈会强化我们最初的分类和模型，也可能在短期学习中引起它们的改变。因此，心智模型会根据新的经历，包括与他人的思想的接触进行重新界定。^[3]

根据“演化环境中的学习”（Dosi et al., forthcoming）这篇很具有洞察力的文章，学习的演化理论由以下几个模块组成：

集中于类和心智模型动态变化的认知基础；

26

作为决策和学习的非常一般的过程的试探性方法（heuristics）；

环境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解释性模型和决策规则的社会嵌入性（embeddedness）；

（或许不一致的）目标和偏好的内生性；

作为各自行为的主体的组织；

在（或者主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完全）引导着行为和表现的学习、适应和探索过程。

关于认知过程的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大脑是像计算机一样运转还是通过肉体选择的过程来运转？^[4]我没有资格对神经系统科学家最近提出的不同的观点进行评判。本章我只对联系模型（connectionist model）进行研究，以指明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5]联系模型和选择模型都认为，大脑是以模式为基础进行推理（pattern-based reasoning）的，这种推理过程对于解释不确定的世界中的选择行为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点对于本书后续的分析非常重要。模式认知（pattern recognition）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推理是人类神经网络运转的最基础的方式。“人们根据综合后的模式，而不是根据逻辑进行思考，因此，它通常可以超出句法或者机械的关系所能达到的范围”（Edelman and Tonini, 2001, 152）。这种方法与有关人类学习本质的研究是一致的。很多学习来自于对影响我们生活的重大事件进行吸收和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累积，缓慢地改变着我们的行为。隐性知识的演化无须进行推论。实际上，相对于我们理解问题和寻找问题答案的能力而言，我们推理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差。如果问题与我们经验中所发生的其他事件有足够的相似性，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和领会。思想与根植于我们文化之中的规范不

27

同，它不能轻易被整合到我们的文化中去。思想只有在享有某种内聚力，并且与我们所持有的规范相差不太远的时候，才会被接受。模式匹配是我们感知、记忆以及理解的方式。这是我们运用类比和概括能力的关键。这种能力不仅使我们善于模拟“现实”，而且善于在真实的不确定性面前构造理论。

一项由心理学家朱利安·菲尔德曼完成的实验指出了模式认知对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理论构建的某些意义。“菲尔德曼的实验中有一些主题是让受试者预测在连续的两百次实验中，两个事件——以符号‘1’出现或者以符号‘0’出现——在实验者能够控制下一个出现的是1还是0的情况下，哪一个会在下一次发生……菲尔德曼发现，每个受试者都会迅速找到1和0的序列出现的模式，从而对序列产生过程做出假设……有趣的是，所采用的1和0的序列是完全随机的。然而，尽管实验过程中受试者有所不同，但是每一个受试者都能够‘看到’所遵循的模式。”^[6]在什么都不存在的情况下的发现模式与人类在缺乏“科学”解释的情况下，通过形成不同的解释、理论、教义来诠释他们周围世界所付出的普遍努力是一致的。确实，比起对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没有任何解释而言，进行某种解释可能是一个优先存在的特征。

学习的过程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不同的，但是一个共同的制度/教育结构（第5章的主题）将会导致共同的信念和感知。因此，一个共同的文化遗产提供了一种减少人们在社会中拥有的不同的心智模型的方式，构建了一种代际之间传递共同感知的途径。^[7]

28

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对于这项研究中的问题所存在的悬而未决的争论，即它们关心的是心智的基因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人类认知的特殊属性以及认知过程的基本特征。

III

第一个争论所强调的问题是，与环境条件相比，心智的基因结构能

够在何种程度上塑造文化。演化心理学家认为,几百万年的狩猎/群居生活使心智的基因结构能够适应某些特殊条件,并塑造我们文化的大部分特征。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唯一的心理演化机制具有一般意义,而且与内容无关,因此“文化”必须向我们的心智提供所有特定的内容。这种观点是演化心理学方法和传统方法分歧最大的地方。我们认为,不是文化改变了最初的社会交换心理,而是具有特定内容的演化心理构成了心智活动的基本模块,使文化自身从这些模块中构造出来。(Tooby and Cosmides, 1992, 207—208)

然而,斯蒂芬·J·古尔德等演化生物学家认为,在基因结构中有很多空隙,这为环境适应留下了空间。古尔德认为,不仅选择环境会发生改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选择环境相对“宽松”,这使得机会和衍生能力,而不是竞争压力起主要作用。

争论的焦点是人类心智的适应性。演化心理学家把大部分人类合作行为看作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实验经济学家最近的实证研究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某些支持。伊丽莎白·霍夫曼、凯文·麦凯布和弗农·史密斯(1998, 350)将大量实验结果总结如下:

人们在各种不同的小集团的互动环境中应用奖惩策略。这些策略通常与博弈论所预测的非合作策略并不一致,但是却能比那些策略得到更好的结果。虽然我们观察到人们大量使用奖惩策略,并且能够在单个博弈中取得某些合作性成果,然而,这些策略却与博弈理论中的无名氏定理存在一致性,即重复有助于合作。可是,在协调结果的成本很高的时候,例如在大集团甚至私人信息下的小集团中,人们更倾向于非合作性的结果。在利用产权和交易媒介通过市场进行交互的大集团中,以及分散的私人信息的条件下,非合作性的交互活动有助于取得社会合意的结果。实验研究始终支持这个基本的市场定理。然而在小集团的交互活动中,这个定理并不总是成立,这是因为人们会改变他们严格的自利行为,利用奖惩策略来接近剩余最大化的结果。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并不令

人困惑，而只是我们心智演化与社会适应的自然结果。

29

演化心理学家的观点并不新鲜。它与爱德华·威尔逊等社会生物学家的观点一脉相承（如果社会生物学家再增加一点有趣的经验研究的话）。威尔逊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简要地重申了他的立场，他支持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方法来研究知识（Wilson, 1998）。当然，没有人会对他的核心命题“行为受到渐成（epigenetic）规则的影响”进行质疑，此处的“渐成说”（epigenesis）原本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意思是一个有机体在遗传和环境共同影响下的成长过程（Wilson, 1998, 193）。但是社会科学家需要解释的是历史上和当代世界中人类极端不同的生活状况，对于他们而言，诸如对乱伦的普遍的忌讳、人类内在的语言能力，甚至合作行为的倾向等特征——所有这些都被威尔逊、乔姆斯基（Chomsky, 1975）、平克尔（Pinker, 1994）以及图拜和科斯米德斯视为遗传特征——虽然是渐成说理论的重要部分，但是在理解人类状况和变迁过程中（如果有用的话）的用处却不大。演化心理学最重要的贡献是说明了心智的基本推理结构，它似乎可以解释心智容纳和构造“非理性”信念的倾向，例如超自然的解释和宗教，而这些正是社会中个人、集体和组织大量决策框架的基础。^[8]然而，政治/经济单位的绩效特征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出现很大的变化，这清楚地说明拉玛尔克式（Lamarckian）文化的特征也一定是理解变迁过程的核心。然而，遗传倾向和文化的力量之间确切的结合方式还远没有解释清楚，这代表着未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前沿领域。

30

IV

第二个争论与如下问题有关：心智是如何（怎样）运行的？心智基本的“运行机制”是什么？以及这种运行机制是如何通过大脑完成的？人工智能（AI）早期的工作以计算机模拟为基础；最近的工作则以平行分布处理模型为基础，它虽然仍然受到计算机模拟的影响，但是却已

经走向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在这一章，我将运用联系模型探究知识存储和提取的方式问题。人工智能方法的前提条件是，知识在记忆中的存储和提取就像数据在计算机上一样。相反，联系理论不是像人工智能模型那样以符号和系统操纵的形式模拟认知过程，而是对发生在大脑神经系统中的处理过程进行模拟。随之出现的人工神经网络充其量只是非常复杂的大脑结构的粗略模型，但是却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知识存储和提取的方式——虽然保罗·斯莫伦斯基认为这两种方法是相容的。^[9]

传统方法和联系方法的差别将我们引向心智和智力系统 (intelligence systems) 运行的机制上来。认知过程必须要使用、操纵和存储内在表象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吗？“因为人们假设认识过程是一个计算过程，解释智力系统如何运行需要特定的计算框架。因此，计算主义和表象主义 (representationalism) 的联系看起来是很直接的，如果没有内在表象为媒介，计算系统就不能够进行计算” (Stufflebeam, 1998, 640)。但是在联系框架中，网络能够知道由诱导过程所赋予的权重的值。经过试错，这个过程会达到联系理论家通过大量学习运算法则所模拟的权重。“实际上，一个受神经系统激发的计算机‘网络’能够通过调整该局域激发门槛在大范围的个体计算单位上（即使每个个体都非常迟钝）进行模式识别。其基本思想是，虽然个体单位是迟钝的，但是整个网络却非常灵活” (Turner, 2001, 138)。默林·唐纳德很好地总结了我们对联系模型的理解的状况，他这样说道：“联系模型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试图以非符号式的（有时也称之为非表象式的）策略来模拟大脑和心智。联系网络就像是一个原始的神经系统，来构造它自己对世界的感知形式，而不依赖于一个人类操控者所给定的符号系统。目前这些模型还是非常基本的，但是原则上来讲，它们可以变得更有解释力” (Donald, 1991, 366)。

如果后者是对机制的正确理解，那么它对于学习过程将有重要的启示。联系模型通过事例进行学习，“利用那些事例的统计去推动学习。这种方法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虽然学习是由统计上的结果推动的，但是学习过程的结果却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知识可以通过新鲜事例得以

一般化” (Elman, 1998, 496)。然而, 知识的可一般化又进一步产生了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它能够解释内在的趋势 (例如乔姆斯基对语法的研究或者传统的 AI 模型) 并将其作为学习的来源, 同时又进一步将学习归结到物质和社会文化/语言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上来。但是, 心智是如何通过开发已有的知识丰富自身的呢? 克拉克和卡米洛夫-史密斯 (Clark and Karmiloff-Smith, 1993) 认为, 心智会按照它们特定的目的将心智模型整理和重组为更为抽象的连续的形式, 使之能够处理其他信息。从特殊到一般的概括能力以及采用类比的能力是他们所说的表象式再描述的一部分, 它不仅在一一般意义上支撑创造性思维, 而且也在一般意义上支撑信念体系。但是, 正像有些人对于克拉克和卡米洛夫-史密斯的论文所作的评论那样, 对于表象式再描述过程到底是如何进行的这个问题还存在很多争议。^[10]

如果我们从心智转向大脑 (这是作进一步理解的必要的一环), 我们会碰到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释的困惑。虽然新的大脑图像技术 (神经图像技术) 增加了我们对于心智处理中神经网络运行的理解 (同时也增加了很多新的困惑), 但是仍然有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11] 实际上, 大脑和心智科学家只是在最近才走到一起, 以丰富他们各自的理解。例如, 大脑中的神经元被神经键分割, 而通过神经键所进行的联系则以化学物质为媒介。“已经证明这对于正常的认知非常关键, 但是它们在认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详细研究” (Bechtel et al., 1998, 95)。

这些争论还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理解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V

要给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建立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法, 其起点是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理论的认可。他的《感觉的秩序》 (The

Sensory Order) 是理解学习过程和信念形成等方面的开创性著作,该书远远早于认知科学家建立的联系理论。对哈耶克而言,信念是心智的组成部分,可以解释为感知。我们不会对现实世界进行复制;而是建立分类体系来解释外部环境。“因此感知总是解释的过程,是将某些事物放到一类或者几类事物中去……我们对经历过的事物所赋予的性质严格说来并不是那些事物的属性,但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将它们归类所采用的一整套关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所知道的整个世界都具有理论的性质,而我们所有的经验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那些理论”(Hayek, 1952, 143)。

哈耶克认为,心智与环境不可分割。“我们用以了解外部世界的工具本身是很多经历的产物。它被我们生活环境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条件所塑造,它体现了对于我们过去所经历的环境中各种要素之间关系的某种遗传性复制,我们对环境中任何新事件的解释都是根据那种经验进行的。”(同上, 165)。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那些改变头脑中心智分类的经验会而且经常会导致对个体所面临的问题的误解。“我们的感觉对刺激所进行的分类基于所获得的联系系统,这些联系系统会以部分和不完全的方式复制存在于相应的物质刺激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物质世界的‘模型’只能以一种非常扭曲的方式复制存在于该世界中的关系;我们的感觉对这些事件的分类常常被证明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会出现一种那些事件并不会引发的预期”(同上, 145)。

哈耶克的观点最近在认知科学领域引发了惊人的共鸣。埃德温·哈钦斯^[12]认为,如果我们不能解释这样的事实,即“文化、环境和历史是人类认知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它们不能够很好地整合成一个作为相互独立的个体心智的抽象特征视角”,那么就不能充分理解认知过程。基本的任务是“在环境中对认知活动进行定位,此处的环境并不是周边条件一个固定的集合,而是一个更为宽广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认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Edwin Hutchins, 1995, xiii)。完成这项任务以后,我们就能“证明人类认知不只是受到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而且在非常基本的意义上,它就是一个文化和社会过程”(同上, xiv)。

文化的基本要素始自语言，语言的分类和词汇反映了社会累积的经验。默林·唐纳德认为“其他种群基本上每个世代都处于相同的水平上，但是人类不是。语义的内容，甚至支撑特定种类思维的文化规则系统（algorithms）都可能累积，符号环境可能影响个体大脑配置资源的方式。对文化的适应过程开始得非常缓慢，它建立在灵长类动物知识基础的非常渐进的累积之上，但是现在却明显以指数级的速度加速了”（Donald, 1991, 12）。唐纳德用认知的分类标准提出了灵长类/原始人类文化演化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只是一段插曲，以灵长类动物为特征。猿是一种智慧型动物（正如最近大量实证研究所证实的那样），但是其表达的方式却非常有限。这种限制最初必须通过增加活动技能得以克服，这被唐纳德称为模仿阶段。“第二个原始人类的认知转换使模仿文化转向语言和充分发展的口头流传的神话文化。这出现在距今几百万年以前，在现代类人猿的形成时达到顶点。口头文化是一种特别的适应形式，它能够补充，但是却不能够代替模仿文化的功能”。（同上，14）。他将这个阶段称为神话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共同用语言叙述的传统开始变得普遍。正是拥有发达的语言才使得人类分离出来并成为文化动态变迁的基础。最后一个阶段，即符号式文化社会的理论阶段，“其标志是长期的、文化上不断累积的可视符号发明的历史”（同上，15）。符号发明并没有触发内在心智能力。“而是在与外部符号环境共生充分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表象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特别激烈的文化适应形式的基础”（同上）。正是这个最后的发展阶段为心智和其外部环境动态互动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在此，引用唐纳德对“理论性”文化含义的阐述是很有意义的：

理论性文化是专业人士和理论家的王国，它的制度结构取决于高水平的符号读写能力，这种能力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包括所有与符号系统有效使用相关的智力技能。理论出现于对蕴含在这些学科中的法则进行追寻的过程之中。理论一旦建立起来，它们通常就会通过各种外部记忆媒介以持久的形式得以维持，例如法律条文等。理论性文化是更大范围的文化的一个子集。它包括许多理论领

域，如管理、政治和法律体系以及其他专业化领域。不管它们专长的范围是什么，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理论统治一切。（2000，4）

“科学方法”的建立——采用统计技术，以及理论与经验证据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改变了我们对于物质和人类环境的理解。理论性文化是哈钦斯社会文化观的基础，该文化观包括了在心智和外部结构之间连续交互的一个计算系统。他通过对轮船驶向圣佩德罗港口的过程进行冗长的描述来阐述这一观点。

在计算、表象/运算以及执行层面上，航行的基本计算完全能够以观察得到的形式得以体现。从这种认知系统的观点看，参与人之间的沟通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内在于认知系统的处理过程。图表等计算媒介可以被视为内在于系统的表现形式，在这些图表基础上所进行的计算是更多地内在于系统的处理过程。由于认知活动分布在一个社会网络之中，因此很多内在处理过程和沟通都可以直接观察到。（Hutchins, 1995, 128—129）

从这个观点中可以看出，“讨论认知变化的合适的分析单位包括思维的社会—物理环境。学习是一个复杂系统中的适应性重组过程”（同上，289）。像哈耶克一样，哈钦斯认为，文化是一个适应过程，它累积了部分解决方法来应对过去频繁出现的问题。这种方法强调社会制度的认知功能。对个体信念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更详细的说明提供了一套文化和社会制度直接用来解释经济变迁的机制。我们只能像本书第二部分所阐述的那样，通过对诸如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世界不断演化的信念体系与它们社会环境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究，才能很好地比较这些社会的特征。

36

当我们从哈钦斯以航海术语所体现的动态社会集团转向结构、功能以及变迁过程对于整个社会所具有的更大的启示意义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文化遗产向我们提供了人造的结构——信念、制度、手段、工具、技术——它们不仅在对社会成员瞬时选择的塑造过程中，而且在向我们提供社会随着时间推移动态成败的线索的过程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用。实际上，人造结构越丰富，就越能减少在某段时间内决策的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环境在提供更多实验和创新性竞争方面越来越丰富，社会就会越有可能成功地生存下来。这个概括需要仔细地研究和论证，但是它们却是本研究的基础。

人造结构越丰富，常规决策的范围越广。实际上，这已经构造出了减轻个体决策不确定性的博弈结构。相反，在一个无序的环境中，常规会被打断，不确定性将会增加。美国等现代西方社会体现了一个丰富的文化遗产，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人造结构，这不仅使我们能够以空前的方式驾驭自然，而且同样扩展了我们随时空转移做出“容易”决策的范围，而这些决策的方式已经超出了我们祖先所能理解的范围。实际上，这种人造结构已经将不确定性转化成确定性，或者至少转化成更广泛的人类活动中的风险。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日常决策与不发达国家的日常决策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拥有一个丰富的人造结构的重要性给予冷静的确认。

但是，如果人们扩展了他们对于环境的理解，他们就会通过不断探究未知领域来做到这一点；有时候他们会成功，因此会扩大人类控制的范围，有时候他们会失败，由此而导致抑制发展、衰退或者人类衰亡等结果。当碰到新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寻求能够增加人类成功可能性的条件。

安东尼奥·达玛索（Antonio Damasio）在他的著作《对所发生事件的感觉》（*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的结论部分中指出了支撑认知的自我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意义：

人类环境的戏剧性变化完全来自于意识。当然，意识及其表现形式使我们能够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那种更好的生活的代价是很高的。它不仅仅包括弄清楚风险、危险和苦痛的代价，更糟糕的是，它还包括弄清楚什么是快乐，什么时候快乐将会消失或者无法得到的成本。

因此，人类生存状况的戏剧性变化之所以来源于意识，是因为它与讨价还价中所获得的知识有关，这种讨价还价是我们任何人都

无法摆脱的：获得一个更好的生存条件的成本是失去另一种生存条件所具有的单纯。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感觉是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一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同时，在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进行的浮士德式的讨价还价中，对所发生事件的感觉也是我们没有谈论过的问题。自然向我们提出了这一问题。(1999, 316)

第4章 意识和人类的意向性



38

意识的性质占据了许多最优秀的心理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研究者的思想，尽管有些人不这么认为，但是它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对此，约翰·瑟尔这样描述：“‘意识的问题’是要解释大脑的神经生物过程到底是如何引起我们意识和感觉的主观状态的；这些状态在我们大脑的结构中是如何实现的；在大脑的整个系统中意识的功能到底是怎样的，由此它在我们生活中的一般功能是怎样的”（Searle, 1997, 192）。这段描述的第一部分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

论，而且争论现在仍然非常激烈。但是奇怪的是，与其他问题相比，最后一部分——它在我们生活中的一般功能是怎样的——即此处的焦点，却似乎被相对忽视了。然而，它却是所有涉及人类意向性的问题的核心。不妨再一次引用瑟尔（1995，105）的话：“达尔文最大的成就是证明了在人类和动物起源和发展中，意图、计划、技术和目的的表现完全是一种幻觉。这些表现可以用演化过程来解释，而演化过程根本不包括那些意图。但是思想通过模仿所进行的传播却需要人类意识和意向性的所有手段。”

我在这里并不想对此进行全面的解释，而是在我们所知道的意识的基础上为理解变迁过程提供一种解释。特别是，我们需要解释人类行动的巨大差异，从莫扎特的创造力或者爱因斯坦的天分，到匈奴王阿提拉（或者希特勒、斯大林或者红色高棉）的野蛮，萨沃纳的宗教狂热（在这里要进行冗长的祈祷），或者在过去和现代世界中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穆斯林对持异议者的褊狭。它们是意识与不同的人类经验之间复杂交互方式的产物，这种交互方式使个体具有了特定的特征和信念，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行为模式，该模式已经塑造并将继续塑造着经济变迁。

39

I

人们常常把意识分为两个层次：基本层次或者核心的意识以及更高层次或者扩展的意识。^[1]前者是大脑对世界中事物的认识——是目前头脑中的印象。这是动物的非语言学和非语义学意义上的特征。更高层次或者扩展的意识包括认知，这种认知通过他或者她的行动或者感情的思维主题得以进行，包含了一个个人的、过去的和未来的以及现在的模型，展示了直接的认识。我们可以意识到被称为意识的东西。意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2]

1. 物理学假设——意识理论没有违反物理学法则。我们不需要求助于幽灵或者鬼神（虽然我们看到人们的确求助于幽灵或鬼神来解释这

种现象)。

2. 演化假设——意识在类型 (species) 的演化过程中的某个时期作为显性特征得以出现。意识的获得要么将演化适应性直接赋予具有意识的个体，要么为能够增加演化适应性的其他特征提供了基础。

3. 特质 (以及大多数有争议的) 假设——可以感受到的特性构成了伴随认识的个人的或者主观的经验、感觉和感情的集合，对每一个个体而言，这些特性都是独特的。

意识的两个特征应该得到特别的重视：意识和感情是不可分割的 (Damasio, 1999, 16)；意识和良心是可以区分的：“意识与对任何对象和自我行动的认识有关，而良心与行动和对象中所发现的善恶有关”。(同上, 27)

虽然很多灵长类动物表现出某些高层次意识的特征，但其在人类身上的发展却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基础，并且正如第 3 章所描述的那样，它与人类心智的发展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人类文化的连续过程被嫁接到基因结构上，并产生出我们称之为意识的复杂结构。特别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以共享的叙述传统为特征的神话阶段，以及最后的符号式文化社会的理论阶段已经使人类的意识远远超出了其他灵长类动物。“有意识的人类经验产生了文化，文化产生了历史。历史并不简单是一个编年史，而是一种解释，包括所推想的原因和价值。科学出现在历史中，它试图用更多的确定性来解释世界的边界——即它所受的约束和物理法则” (Edelman, 1992, 162)。我们或许永远都不能完全弄清楚基因和文化属性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但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却使我们能够弄清楚人类生存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化，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所作出的某些结合是任意的。注意到这种结合所存在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在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时我们能够走多远。

我们的“故事”是从与其他动物相同的核心意识开始，对意识进行扩展。这种扩展有两个关键特征，它们是本研究的核心。一个特征是对更大范围内扩展的认识进行解释时所发展起来的想象力，这些扩展的认识体现在迷信、神话、教义和宗教之中。第二个特征是反映了意识的意

向性 (Edelman, 1992, 112), 并对不断扩张的结构进行管制时所形成的越来越复杂的制度和人造结构。我们逐一对这两个特征进行研究。

扩展的认识要求人类去面对可以观察得到的环境特征, 并做出解释, 这些特征不会直接被那些从当前物理环境中学习所形成的解释所改变。“更高层次的意识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丰富的、认知的、感情的以及想象的领域——感觉 (特质)、思想、感情、自我意识、意志以及想象。它能够构造出人为的心智对象, 例如幻想” (同上, 198)。意识是非合理的和超自然的信念的基础, 这些是所有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普遍属性, 因此反映了心智的先天性。帕斯卡·博耶认为, 大脑中的社会推理系统是用来处理内在的道德概念和不幸状况的。他描述了如下几个与所有“超自然的解释”相同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个合作者的物种, 我们的演化足以解释道德理性的实际心理、小孩和成人行为的道德维度的表现方式。但是这不需要特别的宗教代理人、不需要特别的代码、不需要运用模型。然而, 一旦你拥有了具备战略信息的超自然代理人的概念, 你就能够轻易地将它们加入到随时都存在的道德理性之中, 这些概念就会变得突出, 并与上述事实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 宗教概念寄生于道德制度之上” (Boyer, 2001, 191)。很明显, 这些解释有一个基因起源, 但是要对我们更有帮助, 还需要探究文化条件, 这些条件将这些解释转化为推动人类发展的力量。拥有超自然的解释是一回事; 坚持对于那种超自然的解释所具有的信念的一致性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将我们带到第二个特征。

41

随着语言以及随后符号存储系统的发展使更为复杂的人类组织形式成为可能, 不断增加的自我意识开始使人类更加努力地构造他们的环境。埃德elman对这个问题这样总结道:

意义在概念方面所发生的改变取决于基于价值所进行的分类。它随着有记忆的身体感觉和心智印象的历史而发展。事件是独立的,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预测的。当社会中语言学和语义学的能力出现以后, 以及包括比喻的句子与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创造新的世界模型的能力就会以爆炸性的速度发展。但是我们一定要

记住，由于它们与价值和自我概念的联系，这种意义体系几乎不会
 不受影响；它要受感情的控制（Edelman, 1992, 170）。

42 在不同环境下，非常不同的人类经验产生了极其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超自然的信念和制度组合，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基因特征和这些不同经验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社会变迁过程的起点。

我们如何解释文化的差异呢？许多演化理论家已经为基因建立了一个平行分类来解释文化的演化。他们采用术语“记忆”来描述代际之间文化属性的转移。^[3]但是这种扩展很明显具有误导作用。文化轨迹并不拥有与基因类似的属性，确实，越来越多的制度经济学文献已经研究得非常清楚，即制度必须（要）从人类的意向性等方面进行解释。非正式规范建立将基因起源的道德推理与人类有意识的目标混合起来，两者共同为我们对文化这一术语的理解提供了支持。

神话、迷信和宗教在塑造早期社会中所具有的重大影响，来源于它们在秩序（第8章的主题）和顺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意识形态对顺从的要求至今仍然是减少维持秩序的成本的主要力量，但是它带来了另外的社会成本，即阻止制度变革、惩罚偏离常规者，以及在与其它与之竞争的宗教冲突中成为无休止的人类冲突的来源。因此，意识的扩展不仅是人类创造性的奇迹和人类所创造的丰富文化的来源，而且是褊狭、偏见和人类冲突的根源。在人类的意向性中很难不把它放到中心位置。

43 顺从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的成本很高。在长期内，当人类在一个非各态历经性的社会中面临崭新的挑战，需要创新性的制度革新的时候，由于没有人知道生存的正确路径，此时顺从就会产生停滞和衰退。因此，正如哈耶克提醒我们的那样，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选择的制度多样性就应成为一个较好的生存路径。例如卢瑟和加尔文所创造的宗教多元化，在很长时间内就都被人们称赞，认为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刺激，正如韦伯所认为的那样。但是创造性的一个更为基础的来源是一般意义上制度多样性的演化，其中新教就是与文艺复兴相联系的整个思想多样性的一个例子和象征。在西欧，政治的分裂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为不同的信念和经济制度创造出多样性和竞争性的制度环境，这对欧洲的相对兴

起非常关键，同时对支撑现代经济增长的非人格化交换的增长也非常重要。所有这些都是第10章的主题。

II

如果不确定性是解释制度变迁的一个常量，那么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向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转变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差异呢？经济变迁的所有三个来源——人口统计特征、知识存量以及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同样，人力资本的增加也是空前的。由于人们必须与其他人住得更近，人口增加带来了一个具有普遍外部性的世界，但是在技术革命性变迁的环境下，这也产生了新的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推动人类环境发展的力量是知识存量的增长，它使生产技术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增加了丰裕世界出现的可能性。同样，它也创造出了能够摧毁我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此带来的制度发展创造出了越来越复杂的结构，以此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制度作为社会的激励结构已经创造出不同的诱因而促进对不断增加的知识进行投资、扩张并应用不断增加的新知识解决人类稀缺性的问题。

意识的意义在于这种诱发机制已经扩展了人类的创造潜能，并通过与不同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反应，来应对由人类变迁导致的新问题。但是这些反应并不总是创造性和生产性的。有时候经验与意识的交互方式会产生导致停滞的制度，从而使人类在更为动态的社会中受挫。信念体系从处理物理环境的结构向处理人类环境复杂问题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这种转变的成功并不是自动实现的。

44

一般意义上的超自然信念和特定意义上有组织的宗教继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文化环境的变化改变了该作用的性质。宗教教义和哥白尼、伽利略到达尔文等自然科学家不断增长的知识之间的冲突在西方世

界中造成了一种张力。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的投资和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激励结构造成了经济福利的差距，差距的不断增大形成了新的主要的冲突，而这些差距是由于投资和应用知识解决问题方面所具有的不同激励结构造成的。12 世纪以后穆斯林世界持续动态扩张的失败很明显地反映了其文化演化中存在的僵化，这与西欧动态变迁形成鲜明的对比。^[4]在现代世界，在穆斯林和西方世界之间差距不断增大的环境下，穆斯林对顺从的要求有时候会演变成宗教狂热主义。现今世界上没有人需要被提醒宗教狂热对于冲突的意义。

但是，如果现代世界的推动力量是知识存量的增长，那么就会引起我们对导致富国和穷国之间差距不断增大的知识应用上的差异的困惑——这个差异只能部分由宗教对顺从的要求所解释。对意识的争议已经集中在身体/心智与它们对我们世界的影响等被相对忽视的因素之间的联系上。我们需要解释那种信念和制度的复杂混合体，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决定着人类的生存条件。

45

要从人类心智中获得非凡的成就需要意识，这种需要是以它们对生活的需要同样基础的方式进行的，而那种生活需要细加揣摩，需要一个平衡的内部化学环境。但是没有一种成就直接来自于意识，相反，它们是神经系统的直接的产物，这种神经系统能产生意识，具有丰富的记忆、强大的记忆分类能力、以语言形式对整个知识谱系进行编码的异常能力，以及在头脑中保持知识和聪明地操纵知识的强化能力。每一种能力都能够回溯到无数的心智和神经元素。(Damasio, 1999, 310—311)

“那些有感觉力的状态和认识”的组合体现了意识和不断演化的制度框架，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源泉。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同时间人类生存条件的多样性，从文艺复兴时期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发展到同样是我们人类变迁一个组成部分的无尽的宗教狂热、野蛮和战争，在本质上都体现了心智作用和反作用于信念体系基本问题的方式，这个信念体系试图从处理物理环境的构造向适合处理人类环境的构造转变。我们不仅需要解释不同时期的经济中有序和无序的根本源泉等宏观问题，而且需要明确解

释在一个非各态历经性的世界中处理社会面临和继续面临的新问题时不同的经济成功经验。通过考察学习的性质和在各种社会环境下吸收那种知识的人类交互作用的经验证据，我们的解释才能取得一定的进展。

III

进行这种解释的起点是几百万年来人类逐渐成为狩猎者和畜牧者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基因结构。在小团体中天生存在的合作行为的确具有基因的特性，前面的章节已经描述了实验经济学中很多支撑这一结论的经验研究。但是，这种合作能够超出小集团的范围是多远？它怎样修正构成经济理论根基的自利模型？最近以及当前的经验研究正在向我们提供部分答案。或许正在进行的最有挑战性的研究出自对大学学生文化一致性的批评的回应，大学生是这些经验研究的发起者。许多研究者（主要是人类学家）聚集起来，他们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经历非常广泛，他们每个人都采用共同的框架和研究技术，承担了对他或者她所熟悉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任务。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逐一进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

46

第一，在所研究的任何社会中，规范模型都未获支持。第二，不同集团之间的行为可变性要比以前跨文化研究的发现更多，比起以前的实验来说，规范模型在很多方面都不能成立。第三，经济组织和市场一体化的程度等集团层面的差别解释了不同社会之间很大部分的行为差异：市场一体化水平以及合作回报越高，在实验中出现的合作水平就越高。第四，个人层面的经济和人口统计变量不能解释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的行为。第五，实验中的行为通常与这些社会日常生活的经济模式相一致。^[5]

他们总结道：

虽然我们的结论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应该放弃理性人框架，但是它们的确指出了两项重要的修正。第一，自利的物质回报最大化

的规范模型被系统地证伪了。在所有被研究的社会中，最后通牒博弈的出价都是正数，而且远远超过期望收入最大化的出价（就像公共物品博弈中的情形一样），然而在很多社会经常会出现拒绝这种正的出价的情形。第二，对经济选择的偏好并不像规范模型中那样是外生的，而是由日常生活中经济和社会交互活动来塑造。这个结果意味着福利经济学关于外生偏好假设这一判断是值得怀疑的，正如对经济政策和制度变化效应进行的预测不能解释行为变化一样。最后，实验行为和日常经济生活结构之间的联系为修正个体选择行为的规范模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Henrich et al.，2003，39—40）

47 这些结论与前面几章所提出的关于学习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学习过程显然是以下两个因素的函数：（1）一个给定的信念体系对来自经验的信息进行过滤的方式；（2）在不同时期个体和社会所面临的不同经验。

人类社会学家经验研究的社会环境是用以应对物理环境不确定性的世界。因此，如果我们要解释富国和穷国之间巨大而且仍然在不断加大的鸿沟，我们就需要研究社会在历史中不同的经验及其对不同信念体系发展的含义。这些不同的信念体系导致了完全不同的人类环境问题处理能力。上面引述的研究虽然非常珍贵，但是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特殊时间内透视人类行为的简单方式；我们需要的是深入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累积的变迁过程。在向更复杂的、互相依赖的文化演化的压力环境中，人类的意识及其意向性已经导致了不同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结构进一步又可以解释社会不同的绩效特征。要增加对于变迁过程的理解，必须将人类社会学家经验研究得出的人类行为丰富的细节整合到由意识带来的自我意识的复杂性质所导致的复杂的信念体系中。

第5章 人类搭建的支撑结构

人类所有有组织的活动，不论是体育运动还是经济运行活动，都需要有一定的结构来制定“游戏规则”。这种结构是由一系列制度——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及其实施特征——组成的。以职业足球联赛为例。比赛必须遵从一套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例如，不能故意伤害对方球队的主力队员）；比赛还要运用裁判来保证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范的实施。比赛实际是如何进行的，不仅取决于提供激励约束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范的强度，而且

48

取决于规则实施的有效性。改变正式规则将会改变游戏规则，但是，正如每一个观看职业足球联赛的人都知道的那样，规避正式规则或者伤害对方主力球员常常是有利于自己球队的。经济绩效特征也是如此。为了理解经济绩效，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制度运行的方式，不仅要关注正式规则的结果，也要关注那些经常出乎意料的情况。

人类为规范政治、经济环境所创建的结构是经济绩效的基本决定因素。这种结构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人类根据这种激励做出选择。正如足球比赛所阐明的那样，非正式规范的约束力和实施有效性在博弈中起主要作用。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和它们的实施有效性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们源自人类的信念。

49

本篇最后一章以讨论文化背景中的认知作为结尾，认知决定了人类的信念。本章研究文化背景的本质，把文化背景看成是一种支撑框架，它塑造了人类的交互作用。人类建立的这种支撑框架由最宽泛的意义上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组成。换句话说，物质资本是指人类积累起来的所有人工物品，特别是工具、技术和人类改造环境所使用的器械。人力资本是指人类所拥有的根植于人们信念中的知识和人类创建的反映他们信念的制度。尽管我们对支撑框架的全部特征都很感兴趣（的确，我们应该将支撑框架较宽泛的方方面面纳入到我们特有的分析中来，因为这种支撑框架为制度演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背景），但是本章把研究焦点仅仅放在制度框架上。

制度框架由三部分组成：（1）政治结构，它界定了人们建立和加总政治选择的方式；（2）产权结构，它确定了正式的经济激励；（3）社会结构，包括行为规范和习俗，它确定了经济中的非正式激励。制度结构反映了社会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信念，而制度框架的变化通常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反映了过去对现在和未来施加的各种约束。信念、制度框架和其他方面组成了人类建立的结构，用以分析人类行为。接下来我们将要分析信念和制度的关系、文化遗产和它的路径依赖特征、整合与执行各种选择的决策结构以及制度变迁的本质。^[1]

I

信念体系和制度框架有着密切联系。信念体系是人类行为的内在表现的具体体现。制度是人们施加给人类行为的结构,以达到人们希望的结果。也就是说,信念体系是内在表现,制度是这种内在表现的外在显示。因此,经济市场的结构反映了制定游戏规则的那些人的信念。他们制定规则,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也就是说,某种市场类型),不管他们的目的是制造垄断还是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他们的信念可能是不正确的,会产生出乎意料的结果)。当人们的信念存在冲突时,制度会反映那些有能力实现他们的目标的人们的信念(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点将在下面几节中讨论。

50

信念和制度的密切关系尽管在一个社会的正式规则中表现得很明显,但是这种关系在非正式制度——行为规范、习俗和自愿遵守的行为准则——中体现得最充分。这些非正式制度不仅彰显了信念体系的道德准则,这一点在不同的文化中一般都有相同的特征;而且反映了各个社会特有的行为规范,这一点在不同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正式制度可以通过法令来改变,但是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方式却很难完全理解,人们也很难控制非正式制度的演化。^[2]

51

II

正如前面所述,文化是由行为规范、价值观和思想的代际传递形成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文化的作用正如哈钦斯和黑兹尔赫斯特所述,是“一个使上代人所学到的知识对下代人的学习产生更直接影响的过程”(Hutchins and Hazelhurst, 1992, 690)。因此,他们认为,经过许多代的文化传递,一个民族能够学到很多单个人一生都无法学到的

东西（同上，690）。由过去几代人传递并保留下来的东西被哈钦斯和黑兹尔赫斯特称为“人造结构”。这个人造结构是过去几代人所学到的东西，它作为文化传递到当前几代人的信念结构中。尽管一个社会的正式规则能反映这种文化遗传，根植于行为规范、习俗和自愿遵守的行为准则之中的非正式约束才是这个人造结构最重要的“载体”。正式规则在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例如通过革命的方式）；而非正式约束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并在政体演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局部学习”是从一个社会的特定环境（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产生的。在这个特定环境中，伴随着变化不断产生，社会—文化的语言传递结构将逐渐吸纳这些变化，并包含在上文所述的“人造结构”之中。

哈耶克认为，文化是“及时地传输人类积累的知识的机器”（Hayek, 1960, 27）。他把源自过去经验的、人类对环境适应性调整的产物，如习惯、技能、人生观和制度，全部归结为知识。哈耶克的文化演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把文化演化看作一个自发的过程，因为他认为人类理解较为复杂的人类交往结构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人类行为的的目的性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人类有意识地构建他们的未来，人类事实上也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努力建立他们交互作用的结构，人们不希望陷入其他的状态，例如无政府主义或者混乱无序的状态。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别无选择。问题是人类是如何构建这种结构的。^[3]

人类社会如何构建他们的未来，这引导我们直接面对变迁过程的基本方面——变迁的历史特征。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我们曾经经历的状态，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以后将会遇到的情况。路径依赖——一个被正确使用也被误用、滥用的概念——的研究主题就是过去是如何和现在、将来相联系的。路径依赖仅仅意味着现在的选择要受到从过去积累而成的制度传统的约束。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路径依赖的这一含义，我们可能会在制度运行得不好时采取激进式改革。更全面的理解路径依赖含义的一个步骤是认识到积累而成的制度产生了一些组织，它们能否持续下去依赖于那些制度的持久力，因此这些组织会动用资源来

阻止那些威胁它们生存的变革。路径依赖的大部分含义可以在这个背景下得到很好的理解。上一章让我们认识到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观点来看待路径依赖。在整个人造结构中，信念、制度和组织的相互作用使得路径依赖成为社会连续性（本书的第二部分将深入探讨这个主题）中的一个基本因素。路径依赖与其说是一种“惯性”，还不如说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施加给现在的选择集的约束。要想理解变迁过程，就必须理解路径依赖的本质，以确定在各种环境中路径依赖对变迁所施加的 limits 的本质。

III

人类搭建的支撑框架不仅确定了经济和政治的博弈规则，而且决定了谁有权进行决策。进一步地，这种支撑框架也决定了激励和负激励的正式结构，这些激励和负激励是最接近于选择集的概念。但是，支撑框架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它等同于行为规范、习俗和行为准则等非正式结构，除此之外，它还是制度结构的作用方式以及制度结构对影响一个社会人口特征和知识存量变化的那些因素的反应方式。

一个社会的正式制度结构由广义上的宪法体系所组成，也就是说，确定政治、经济博弈方式的正式制度结构本身是有意设计出来的。尽管研究美国宪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的决策过程，但是这是非常不够的，以至于作用有限。人们如何进行博弈是正式结构、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和实施特征共同作用的一种结果。在为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份报告中，考克斯和麦卡宾斯将一个典型的社会正式结构总结如下：

政体的结构可以被描述成一个委托代理关系序列。例如，在一个典型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存在着三层主要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一，选民（the sovereign people）（通常通过宪法）把决策权赋予国家的立法和执法机构。人们保留的用来保证立法和执法机构按照它们代表的利益恰当地作为的基本权力有二：在选举时替换这些立

法和执法机构的权力；制定、修改宪法的权力……当立法和执法机构具体的内部组织建立之后，权力的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也就形成了……第三层委托代理关系中，立法机构（或者它的政治首领）是委托人，各种行政部门和机构是代理人。我们认为，这些委托代理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的选择。（Cox and McCubbins, 2001, 2—3）

但是，交易成本分析方法能最清楚地阐述这种结构的绩效。交易成本概念作为合同的度量和实施成本，能够用来分析政治市场的效率。例如，美国国会具有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原因是一个精巧设计的制度结构促进了跨期交易，使得可置信承诺成为可能。^[4]但是，这种制度结构具有低交易成本，并不意味着整个政治市场都是有效率的。通过对一个假设零交易成本的政治市场的研究，就可以突出政治市场的内部问题，使之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5]

在这个政治市场上，选民根据福利净效应能够正确评价各个竞争性的候选人所实施的政策；只有能够最大化利益受到影响的参与交换政党的总收入的法律（或规则）才能够被颁布；对受到不利影响的政党进行补偿能够保证所有的政党都不受到损害。为了达到这些结果，选民和立法者需要正确的模型来恰当评价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带来的收益和损失，立法者的投票不得不满足选民的利益，也就是说，每一个立法者的投票行为由选民的净收益和损失来衡量。选举失败者得到补偿，使他们值得为此作交换。立法者在选举时采取的中间步骤——为他或者她认为是代表了选民利益的法律投票，用立法者所观察得到的选民净收益和损失来衡量投票行为——由复杂的立法结构来代替。但是除了这些，仍然有其他几个问题。首先，选民怎么知道自己的利益？具有竞争性的候选人会采取什么行动？甚至候选人不完全了解需要进行立法的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选民福利的各种问题；即使他们了解，他们还必须了解这些问题对选民福利的影响——或许在简单情况下，他们了解，如明显的再分配，或在某地区直接影响到收入和就业的议案，但是对大多数议案，他们根本不了解。对于选民而言，他或者她必须知道由议员颁布的

大多数法案的影响，以及对个人“钱包”的影响。

进一步的问题是，立法的制度结构和零交易成本模型的近似程度如何呢？美国国会具有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明显比极权主义政体有效率；但是，对美国国会的很多研究都证明了，美国国会所显示的非常复杂的激励信号集为策略性投票和政治拨款的立法行为创造了条件。

目标和结果的差距有多大呢？指导立法者的模型是错误的来源之一。立法者并不知道达到合意结果的所有信息或者理论模型。更重要的是，法律是由具有自身利益的代理人制定并执行的，这一点也将影响最终结果。

政治家（和选民）试图使复杂环境变得有序的不完美模型，制度对保证委托人和代理人（投票者和立法者，立法者和政策实施者）之间可置信承诺的无能为力，高信息成本，再加上单个选民获取信息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的报酬，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政治市场是天生不完美的^[6]这种结论并不值得奇怪。政治和经济毕竟是不同的，总有一些剩余活动必须由政府来承担，这一点即使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论者也赞同，这是因为公共产品的特性、搭便车和某些类型活动带来的高信息（或者不对称信息）成本等带来了固有的困难。我们并不期望所有问题随便地就成为公众问题。那些通过个人或者小集团谈判能够解决的问题没有必要作为公众问题来处理。需放在公共议程上处理的问题或是有上述特性的问题，或是某些集团对市场结果不满意的事情，这些集团已经在政治体系中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提高了谈判能力。在政治体制中的谈判能力和交易成本的发生率与经济体制中的不同，否则，该集团就没必要把问题转到政治领域来处理。因此，优胜劣汰过程就将是一种含有将高交易成本事项移入政治体制来解决特征的过程。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第10章中对政治过程固有本质提出了有洞察力的观点。实际上，他认为政治是由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它们运用政治体制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而牺牲了普通公众的利益，这是历史上所有政治制度普遍面临的两难困境。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仍然和在两个世纪之前一样中肯。

以上几段概括了代议制政府的政治框架，这个问题政治科学家们已经详细地研究过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腐败、贿赂和类似于黑手党的掠夺趋于成为日常的秩序，这使得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更难研究。近几年来，政治经济学家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较为关注，他们从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出发，对现实的政体结构建立模型，但是，没有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政治体制结构。政治体制绩效的巨大差异使得政治体制这个主题成为改善我们对经济变迁过程理解的一个关键的问题。^[7]

56

一般地说，我们对政治过程的研究没有对经济市场的研究成功。对政治市场的交易过程做简要阐释有助于我们找出其中的部分原因。政治市场不像经济市场那样运行。为行为设定合适的假设是比较困难的事情。这些行为假设比我们在经济模型中设定的要复杂得多，它们反映了道德、伦理规范和“非理性”行为反应。由于意识和意向性的本质，政治决策对认知有更复杂的需要。人类“理性自利行为”（经济模型的基本假设）和意识形态式的信念之间的复杂结合源于人类自我意识，这种结合是政治科学家们面临的一大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在下面的背景下更为清晰，即在动态的框架下分析政治市场能够更有效地分析非各态历经情况下的不确定性问题。如第2章所述，鼓励永无止境的发现的制度能够降低不确定性。理想的民主形式就是这种制度。迈克尔·沃格姆斯（Michael Wohlgemuth, 2003）的论文“民主：一种演化分析方法”（Democracy as an Evolutionary Method）提出了三个命题，将民主的动态特征描述如下：

1. 政治偏好和政治主张建立在易错的推测和理论之上。
2. 民主主张的形成是从一个永无止境的相互学习和发现过程中产生的。
3. 这个过程的最重要因素不是霸权，而是现有大多数主张的可争议性。

沃格姆斯的方法来自哈耶克（1960，108页以及之后的几页），后者曾论述道：“民主是最重要的，是形成政治主张的过程……民主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静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才具有存在价

值……民主的理想形式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政府遵守的规则是从一个独立的、自发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要达到理想的民主形式，每个人看法的形成要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现有的大多数人所主张的观点。”

这种关于民主的积极论点强调了民主在维持自由的持久性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关键作用，这种论点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但是这种论点也提出了一个难题。当我们用回归方法来分析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时，结果虽是正相关，但相关程度很弱（Barro, 1996）。我试图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分析这个难题；这里我只是简单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分析框架。

57

经济运行中的正式规则是由政治体制来定义和保证实施的，因此政治体制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广义的正式经济规则包括规定了所有权归属、使用、收入权的财产权，以及资源和法律中提到的各种资产转让权。有很多文献都讨论了这个主题^[8]；而关于非正式约束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方式的文献则比较少。近来一些研究确实对特定行为规范及其在博弈过程中的影响建立了模型，但是，有关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全面影响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德姆塞茨（1967）认为，当一项活动引起了不断增加的外部效应时，一个规范就可能产生，规范是这种外部效应内生化的结果，我曾经提到（North, 1990b），在那些人们交互作用仅限于小范围、人格化水平的社会中，非正式的规范就普遍存在；只有当存在非人格化交换，并且对外部符号储存系统的使用日益增多时，非正式规范才能转变为正式规则。但是，我们对规范起源和无效率规范的持久性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我从规范的起源问题开始说起。

在讨论信念和价值观在塑造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时，马克斯·韦伯的开创性成果是不容忽视的。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强调了信念的宗教起源。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也曾强调了道德规范在日本商业中的重要性。“日本的道德规范是儒教、佛教和神道教的混合体，和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斯密认为，这些道德规范——节俭、勤奋、正直和忠诚——是国民财富的基础。在德川幕府统

58

治的后期，这种意识形态是商业和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因为这种意识形态限制了道德风险，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Hayami and Aoki, 1998, 15）。

和简·菲利普·普拉图（Jean-Philippe Platteau）一起，速水佑次郎（1998）提出了社会规范的另一来源。他们两人都强调了非洲部落有关再分配的规范和亚洲乡村有关互惠的规范之间的差异，并且把这种差异归因于居住密度和农业中财产权归属的不同。“从文化上讲，以定居农业耕地为生活基础的人们都是‘大宗教’如泰国的佛教、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菲律宾的基督教和中国、韩国、日本的佛教与儒教的信仰者”（同上，386）。他们的分析说明了，宗教并不是形成行为规范的独立变量，宗教起源于基本的人口分布状况。他们想强调的是“由市场严重不完美所引起的结构性力量，由传统的社会结构而非政府政策错误所引起的错误激励机制、自然或技术困难，以及所有导致次撒哈拉非洲（Sub-Saharan）地区农业进步代价高昂或难以取得成效的原因”（同上，359）。在普拉图和速水佑次郎所强调的各种原因中，主要的是人口密度和土地使用方式，这对亚洲和非洲发展差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认为各种行为规范的来源在亚洲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但是我们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起源和含义还没有定论。

更棘手的是无效率规范的持久性问题。思拉恩·埃格特森（Thrainn Eggertsson, 1996, 1998）证明了冰岛这种无效率规范的持久性，好几个世纪人们都遵守着那些会妨碍他们开发附近丰富的渔业资源的规范。简·埃尔斯特（Jan Elster, 1989）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讨论了无效率规范。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不完善的。

上面的论述表明了正式、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特征是怎样决定着组织效率（同时也决定了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率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使我们能够衡量人们交换的成本，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经济组织成本和更好地理解低经济绩效来源的工具。^[9]

IV

制度本身是如何变化的呢？我提出了五个有关制度变迁的命题：^[10]

1. 在稀缺性的经济学框架中，制度和组织之间连续不断地交互作用，竞争是制度变迁的关键。

2. 竞争迫使组织不断地对技能和知识进行投资以维持其存续。个人和他们所在组织获得的技能和知识的类型将会塑造人们关于机会和选择的不断演化的感知，这将会逐渐地改变制度。

3. 制度框架提供了激励，这些激励规定了哪些种类的技能 and 知识能够带来最大报酬。

4. 感知是从参与者的心智模型中得来的。

5. 范围经济、互补性和制度矩阵的网络外部性使得制度变迁具有巨大的增量特征和路径依赖特征。

我们需要对这些命题进行深入探讨。

1. 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首先要区分制度和组织两个概念。制度是博弈的规则，组织是博弈的参与者；制度和组织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制度变迁。（诺思（1990b）详细讨论了制度和组织的差异。）

制度是人类自身给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施加的约束。这些约束（和经济学中的标准约束条件一起）定义了经济中的机会集。组织由具有某些相同目标的个人共同组成。企业、工会、合作社都是经济组织；政党、参议院、管制机构等是政治组织；宗教团体、俱乐部等是社会组织。制度矩阵提供的机会决定了即将存在的组织的类型，当组织中的企业家面临着来自稀缺经济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竞争时，就可能引起制度变迁。当他们发现新的或已改变的机会，就会通过以下两个方式引起制度变迁，一是改变规则（通过直接改变政体，或者通过经济或社会组织对政治组织间接地施加压力）；二是有意（有时偶然地）改变规则的实施方式和实施力度，或者改变行为规范的实施力度以及其他非正式约束的

实施方式。在历史上，当组织在交互作用过程之中演化出新的非正式交换手段时，社会规范、习俗和行为准则可能会逐渐失去作用。

2. 新的或者已改变的机会可能是由外部环境中的外生变化引起的，会改变组织的相对价格；机会也可能是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内生竞争引起的，这种竞争使知识不断增长，从而引发创新。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稀缺经济世界中竞争的普遍存在都会引起企业家和他们组织的成员对技能和知识进行投资。不管是通过干中学还是通过知识的习得，组织生存的关键是提高组织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效率。

虽然好奇心确实是获得知识的原动力，但是知识积累的速度却是与报酬相联系的。稳居垄断地位的政治组织或者经济组织（例如美国公立学校体制），不用担心生存的问题，但是企业、政党甚至是有高知识含量、面临很多竞争对手的制度都必须不断努力以提高效率。当竞争“很难发现”（不管由于什么原因）时，组织没有动力对新知识进行投资，从而也就不会引起迅速的制度变迁。稳定的制度结构会出现。因此，组织的激烈竞争会引发迅速的制度变迁。

61

3. 前面的两个命题并不涉及演化式进步过程或者经济增长过程，只有变迁过程。制度矩阵规定了机会集合，这个集合或者能在经济的收入再分配活动中带来最高的报酬，或者能在生产活动中带来最高的报酬。尽管每一个经济为这两种活动都提供了激励，但是相对比重的变化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已形成组织反映了报酬结构。更重要的是，组织对技能和知识的投资方向同样反映了潜在的激励结构。如果盗版能够带来最高收益率，那么组织会对那些能够使它们成为更好的盗版商的技能和知识进行投资。同样地，如果生产活动能够带来高收益率，组织会投资于那些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技能和知识。

经济组织对职业培训和在职培训的投资力度由可观察到的收益来决定。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对正规教育、学校、知识传播、应用研究和纯理论研究的投资力度反映了政治领导人和经济组织的企业家们的感知。同样，制度矩阵包含了有关生育行为的激励，这些激励影响着关于卫生和传染病的知识，从而也对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控制情况产生了影

响。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现有制度反映了博弈参与者的信念，以前有关生育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并没有反映出这一观点。^[11]

4. 个人做出选择的关键是他们的感知：也就是人脑理解所接受信息的方式。如前几章所述，个人形成的能够解释和理解周围世界的心智结构部分是从他们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部分从他们面临并且必须解决的局部的（local）日常问题中产生，还有一部分是非局部学习的结果。人们对环境的理解就来源于这些因素，这些源泉的混合在不同地方显然是各不相同的，如以巴布亚部落的人为一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另一端，我们就可以看到差异的程度（我们并没有说美国经济学家的感知独立于他或者她的文化遗产）。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如果关于选择结果的信息反馈是“完全的”，那么具有相同效用函数的个人会逐渐修正他们的感知，最后会收敛于共同的均衡状态；但是如第2章所强调的那样，不完美的理解和非各态历经世界的连续变迁过程使得我们可能并且也会频繁地犯错误。如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小心翼翼地得出的：“存在一个理论连续统一体，其中当经济人没遇到导致其改变理论的事情时，会坚持并按照这个理论连续统一体行动。”（1987，324）。最终结果可能是多重均衡。

5. 生存能力、收益率和社会中各种组织的存续依赖于现有的制度矩阵。特定的制度结构产生了特定的组织，组织之间内在依赖的联系以及其他关系的复杂网络也是在制度结构的基础之上搭建起来的。由此可得两个含义，即制度变迁典型是增量进行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

制度变迁之所以是增量进行的，是因为大规模变迁将会制造出很多现存组织中的反对者，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从而会反对这种变迁。革命性的变迁只有当竞争的组织受到制度阻碍无法从交易中获得收益时才会爆发。路径依赖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增量性制度变迁的方向和现有的制度矩阵大体一致（原因见上文），而且受到组织中的企业家和成员们所投资的知识和技能的控制。

下面将以上各个命题扩充如下：

63

命题 1：如何给制度下定义是制度研究面临的一大难题。制度是博弈规则，组织是参与者。它们需要不同的模型来解释它们的运行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制度模型描述的是人们施加给人与人交互作用的约束，规定着社会的激励结构。组织模型描述的是社会组织结构、治理和政策。^[12] 尽管个人是参与者，但是个人作为组织的一部分，能够做出决策，从而能够改变博弈规则。

命题 2：简要重申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将之应用于经济组织的研究。值得指出的是，个人拥有的知识存量是经济、社会绩效的潜在决定因素，知识的变化是经济演化的关键。西方世界的兴起归根结底是技能和知识积累的结果（不仅是“生产性知识”，还有关于军事技术的知识），那些技能和知识对中世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是很有价值的。关键之处是，个人和组织的学习是制度演化的主要动力。

64

命题 3：古往今来，人们都把经济活动看成是零和博弈，一个人获得知识和技能从而福利提高是以其他人福利降低为代价的。制度矩阵反映了能够制定或者改变规则的那些人的谈判能力。他们对再分配活动或者生产性活动所获得收益的感知将会形成博弈规则和机会集。反过来，博弈规则又形成了他们对能够给他们带来收益的技能和知识的感知。从关于物理环境不确定性的信念体系向人文环境机会集的信念体系过渡，包含着感知在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转变中发生的变化，这一点是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命题 4：感知是如何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这个问题，只是假设人们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在衡量完美市场的机会成本问题时，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但是当不完全信息存在并且需要心智模型来理解这种不完全信息时，做出复杂的选择就不能依靠这样的假设了。

社会科学家需要明确界定理性这一概念的含义，特别是那些运用理性选择模型的学者们。如果我们要运用选择理论，就必须弄清楚人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这就需要研究人们用于理解信息的心智模型和人们接受的信息。

命题 5：为什么经济不能在一夜之间发生逆转呢？在新古典经济学

的框架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是，大多数变迁都是增量性的、渐进的，且受到历史的约束却是很简单的事实。把上文的分析和关于制度变迁的描述联系起来，就为我们提供了探究经济变迁过程本质的基本框架。

对制度变迁这一特征的分析是我们构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框架的主要基石。

第6章 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

65 我们把至今我们对经济变迁过程的理解做一个总结。我们已经理解了多少？为了在这一研究上取得更大的进展，我们还需要知道哪些呢？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关于经济绩效的证据，并且发掘出了促进生产率提高进而改善经济绩效的潜在动力。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能把前面几章所论述的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整合到对经济变迁过程全面理解的更宽广的背景中。

新古典经济理论能够解释发达国家的市场运行情况，但是没有解释市场和

整个经济是如何演化的。要更好地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需要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缺陷。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是无摩擦的，静态的，没有考虑人类的意向性问题。无摩擦意味着市场运行不受“外在”的干扰，交易过程不花费任何资源（交易成本为零）；静态意味着新古典不考虑时间维度；研究人类意向性问题也就是要分析人类制定决策的方式。

考虑时间因素的演化理论受达尔文独辟蹊径的理论的启发，包括凡勃伦和马歇尔在内的经济学家对演化理论很感兴趣，但是仅到近几年来，社会科学界才开始对演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因为人类心智模型最大的特点是能够作出表示型的再描述，所以我们自然要从演化理论中获取灵感。很多文献都把生物演化概念运用到经济学中。^[1]但是，如果我们纠缠于演化生物学及其在人类演化方面的争论，就会偏离我们的主题。^[2]我们的研究的确从生物学中受到一定启发，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生物进化 and 经济演化的两点不同。^[3]第一，生物进化中的变异是沿着孟德尔链通过基因突变和性别重组实现的。针对这一点，经济演化中并没有贴切的类比。^[4]第二，如前面所强调的，生物演化论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和经济演化中的选择机制不同，不是由经济演化中人们对最终结果的信念来支配的。而且在后者中，参与者的意向性通过他们逐渐形成的制度反映出来，从而决定了经济绩效。

66

为了弥补新古典理论和演化理论的缺陷，我们必须正视无摩擦经济、时间和人类意向性三个问题。本章接下来的几节将要分析这些问题，我总结了我们对经济变迁过程的已有认识和今后的研究方向。然后我们将把这些问题放到社会变迁总背景中进行分析。

I

毫无疑问，制度分析十分关注无摩擦经济的问题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本书第5章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总结。制度通

67

过提供激励结构，指导人类的行动从而建立了人类交互作用的结构。但是，理解激励结构需要人们认识到人脑感知外在世界及其运行的方式，这样，制度才能提供激励。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会对外在世界的运行方式产生不同理解，因此需要不同的制度来提供相同的激励。我们有必要理解在不同环境中学习发生的方式，及其对信念体系和相应的制度产生的影响。

但是，即使在给定的信念体系中，制度也总是提供不完美的激励体系。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特征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制度分析的关键就是考虑到制度性激励体系的不完美特征，并将其纳入分析框架。只有这样，制度分析才能对政治经济分析做出力所能及的重要贡献。下面的分析以政治制度为例。

坦白地说，我们对政体有很多理解，但是对如何使政体正常运转却知之甚少。^[5]我们不知道“什么使政体运行”，同一意义上，我们也不知道经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第5章的交易成本分析着重分析了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不同，指出了我们研究中的缺陷。是民主提供了经济增长的理想环境，还是集权政体对社会变迁更有益呢？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建立民主政体之前是通过集权政体启动经济增长的，新加坡当时仍然是集权政体，却也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民主政体受到多重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牵制，而集权统治者相比之下要自由一些。

显而易见，政府处于两难境地，政府在经济中也是有自身利益的。根据我们之前对政治过程本质的描述，政府有强烈的动机来做出机会主义行为，最大化那些能够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人的租金。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政府是一个“盗贼统治者”（kleptocracy）；在其他情况下，这意味着政府将会顺从对政治具有影响力的集团的利益，与之联盟，使经济活动卡特尔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府才会设计和实施有利于生产活动的一套规则。

68

前面几章强调了人们对外在环境理解的不完美性、由此形成的主观信念体系以及政体的交易成本。与经济市场相比，政治市场具有内在

的低效率。“无效率”在这里意味着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非常不完全地体现其中暗含的激励结构。的确，如果我们想要解释为什么有些政体，例如美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运行得相对成功，我们就必须关注和正式规则一同起作用的非正式约束发挥的关键作用。那些把行为假设纳入分析之中的正式的政体模型面临着根本性的两难选择：一个（参与者是理性的、自利的）政体足够强大，能够制定并实施博弈的经济规则；同时也能够使各个集团（使用麦迪逊巧妙的措辞）利用政体，以牺牲全民福利为代价来追逐它们自身的狭隘利益。改善政治秩序的关键在于参与者必须做出可置信承诺。麦迪逊的有关政府之间相互制衡的策略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部分方法，除此之外，非正式约束也能够引导参与者重新决策，从而会产生更为恰当的结果。

要提高制度作为激励结构的预测能力，需要对不同环境中的制度绩效做更详细的经验研究。我们在研究制度在不同环境中的绩效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得出有关制度的一般性结论之前，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实证研究。

II

时间涉及经验和学习的相互作用；学习过程对人类预期施加了约束，因而对动态变迁理论也施加了约束。事实上，这种理论必须使人类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足够简化，以至于这种理论的有效性十分有限。这并不是说以学习和模仿为基础的演化博弈理论不能成为分析问题的一个有用工具。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 forthcoming a）不仅运用博弈论很好地分析了均衡状态，而且很好地探究了这些均衡状态的稳定性，试图提供一个分析从一个均衡状态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状态过程的视角。但是人类预期仍然具有局限性，因为受到两个基本限制：（1）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将来会学习到什么，这会影响我们将来的行动；（2）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非各态历经的世界。

69

这些限制和我们获得的那些能够提高我们解决非各态历经世界给我们带来的问题的概率的知识并不冲突。我们的任务是解释历史上及当前演化的各种信念体系，不同的信念体系会对结构、组织和社会的经济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重点在于分析心智和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个人在社会中会经历何种类型的学习呢？时间在这个框架中不仅体现了现在的经验，而且也体现了过去几代人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经验累积。“文化构成了人脑的使用方式；我们从现有的有关人脑可塑性的知识中可以推断出，这些对人脑的使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极富可塑性的人脑中枢神经系统究竟是如何组织的，也就是认知结构”（Donald, 1991, 14）。学习过程是一个增量性的过程，受到一个社会文化的影响，文化决定着可认识到的报酬。如第4章所述，学习过程是既定的信念体系过滤信息的方式的函数，这些信息是从经验中获得的；也是个人和社会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验的函数。当演化的信念体系创造出了一个“良好的”人造结构，能够处理个人和社会面临的新奇经历，也能够很好地解决新的两难问题时，经济发展就能成功。当新奇经历从信念体系的人造结构中被剔除掉，个人和社会缺少心智和人造结构的“基石”来解决新奇问题时，经济发展就会失败。如果我们想要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想要解释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的差异，我们就必须从这个问题着眼。对人造结构的研究越深入，我们就越有可能成功地解决新奇问题。这也就是适应性效率的含义；创建必需的人造结构是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

III

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模型包括人类意向性问题，在特定背景下构建人类行为模型也是有价值的。但是，正如第3章和第4章所述，理性选择模型没能很好地处理人类行为问题，而即使在市场分析领域也必须处理好这个问题。布赖恩·阿瑟很好地概括了这些问题的性质：“经济人，

无论是银行、消费者、企业还是投资者，都会不断调整他们的市场策略、购买决策、价格和预期来适应由这些行为一起创造的新环境。但与离子仅以相同的方式对它们局部的磁场做出反应不同，经济元素（经济人）会考虑自己的行动对结果的影响，从而策略性地根据预期做出反应”（Arthur, 1992, 108）。这是在自然科学中不曾碰到的问题，给经济学增加了一重困难。在圣菲研究所，阿瑟等人的研究方向是复杂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标准经济理论的附属，而是更一般的非均衡理论”（同上）。这种理论运用高深的数学并且以非线性动态理论为基础。我们现在仍然无法对这种理论的价值做出评价。^[6]

71

但是，我们并不仅仅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类行为问题。事实上，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不同环境中，尤其是在以人格化交换为特征的市场中，心智和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为什么要强调人格化交换呢？因为人类行为的内在特征是人类在狩猎与采集社会环境中经过数百万年相互交往形成的，具备了基因遗传特征，这成为了探索人类行为的出发点。第4章简要提到一群人类学家研究了不同文化环境中人类行为的特征，涵盖了原始社会到相对“发达的”社会。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以人格化的交换为特征的社会（这些社会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自然环境）以什么类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为特征？当人类试图过渡到那些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人文环境的社会时，各种组织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人格化交换从本质上讲会将经济活动范围限制在熟人圈里，需进行重复的面对面的交易。非人格化交换需要大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这就“破坏了”原始社会数百万年演化而成的内在遗传特征。成功的市场交易和政治民主都需要我们能处理这些问题。

IV

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把现有理论的局限性考虑在内，对经济变迁过程做出更好的解释。这就必须处理在以前讨论中提到的种

种问题。

72

人类的基因特征提供了心智的初始结构；心智和文化遗产、个人经验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学习。学习这三种来源（基因、文化遗产和经验）的相互作用还未得到很好的研究。例如，演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心智经由数百万年的狩猎与采集经验影响，已被程式化，它适应当今非常不同的世界的灵活性是有限的；而斯蒂芬·J·古尔德（Stephen J. Gould）却认为人类心智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如果演化心理学家是正确的，那么评判我们构建的基因—文化模型的标准就是能否较好地解释基于特定目的的基因特征的本质，及其对我们理解不同文化的影响。另外，人类能否成功适应人类环境突变引起的新奇问题日趋成为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很显然，人类对“非理性”解释的迷恋，例如宗教、迷信和原教旨主义信条等，都可能都是由心智的某些内在特征引起的，进而产生相应的信念。更好地理解这些信念产生的动力是更好地理解引导社会变迁的选择的一个关键部分。^[7]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像古典认知科学家们认为的那样，心智具有内在逻辑性，像计算机一样运行，还是像联系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心智以模式为基础做出推理行为。如果前者是正确的，那么人工智能（AI）研究者的工作大大地改进了我们对推理和学习过程的理解。联系主义者的观点却迥然不同：按照模式为基础进行推理，对新奇问题和学习理解就会大大不同。如果学习过程是以模式为基础而不是以符号为基础，那么人们面对和解决新奇问题的能力就会不同。

哈耶克关于文化演化的理论所提出的集体学习由知识、工具、态度、价值观和制度等的代际间不断积累而形成，不合适的行为方式会被演化过程所淘汰。它们经受住了缓慢的不断试错的演化过程的考验，从而存续下来。社会的文化就是由这种演化过程而产生的，是过滤出来的过去经验的具体体现，这些经验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人一辈子能够积累的知识。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劳动分工并非简单地指人类能力的更有效利用，而是人类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因此，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增加与不断增强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是密不可分

的。但是，因为劳动分工使得知识也具有专业性，不同类型的知识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知识协调需要比价格体系更复杂的体系来保证知识在解决人类问题时的有效性。这就意味着当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时，制度结构在分散知识的整合程度和可供解决问题方面起关键作用。知识问题，引用哈耶克的话，“就是要找到这样一个方法：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散布在社会成员之中的知识，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发现和开发新事物的能力”（Hayek, 1979, 190）。

最后一点需要斟酌。如第2章所述，不确定性会随着知识的增加而降低。但是这是什么类型的知识呢？是人们掌握了这种类型的知识能够更熟练地发挥他的专业特长呢？还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知识能够提高人们应付复杂外在世界的的能力呢？显然，精确性和多样性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权衡。经济人拥有知识的多样性程度越高，他或者她越能够应付复杂的环境，即伴随着专业化而来的变化，但是经济人拥有知识的精确程度越高，他或者她在既定的环境中就越能降低不确定性。此外，专业化导致了一类特殊的交易成本——确定那些与个人专业化知识不同的产品和服务的（度量和绩效）特征。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我们通过成熟的制度、组织结构“解决”这个问题，宽泛地说，是通过人造结构提供了担保、抵押，以及必需的非正式结构，有效地大范围地确定产品和服务的性质。然而，这种人造结构不是自发产生的。^[8]事实上，经济发展需要复杂的制度结构和符号存储系统以低交易成本来整合关于当今复杂世界的分散知识；知识整合的成败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社会以参与者的信念为基础。布赖恩·洛斯拜清楚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经济模型的构建必须首先考虑逻辑关系，不论是建模过程中还是把“经济人”定义为理性行为者时，都要优先考虑逻辑关系。但是逻辑推理仅仅决定了人类行为的很小一部分；甚至在逻辑关系起作用时，还要依赖于作为其前提的知识基础，而仅有一小部分知识基础是遵循逻辑关系的。因为演化经济学被誉为严密逻辑思维的产物，所以可能存在一种危险，即夸大有意识的理性逻辑结构在经济

进程中的作用，而忽视演化力量的作用，即使在那些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中也是如此。关于如何得到合意结果的知识的增加是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Brain Loasby, 1999)

第3章讨论的“理论文化”(theoretic culture)的发展是经济演化的关键。

演化生成的制度结构决定了策略性参与者的特征，也决定了他们有效做出选择的方式。第5章讨论的支撑框架对这个问题作了简要总结。由此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推论。社会决定的决策规则在确定谁的选择重要和如何重要的问题上起关键作用。人类构建决策过程的方式决定着谁的信念是重要的。从正式制度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这方面的文献很多，并且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我们仍然对这个问题的动态特征缺乏了解。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非正式约束的演化方式。这和正式规则的变化有什么关系呢？它们是如何演化的呢？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即是人类有意设计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增量性的、自发的？改变非正式约束如何影响整个文化变迁呢？关于非正式约束的不断增加的文献开始探寻这些问题。^[9]显然，非正式约束是构建人类相互作用的制度框架时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些可能是人与人之间无意识的协调行为的结果。习俗可能是偶然发现的，然后通过模仿得以传播。很多非正式约束是对正式规则的补充、扩展和修订。还有一些，例如世仇，显然是负和博弈，我们不深入探讨它们存续的原因。

我们关注的问题是非正式约束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尤其是非正式约束变化的原因。非正式约束直接影响交易成本。诚实、正直、可信的规范降低了交易成本。当今流行的社会资本（由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提出）这一概念就反映了各种规范和价值观对各种类型市场上的交易所起的良好作用。格雷夫对文化价值观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最系统的研究（1994a 和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他比较了11世纪和12世纪热那亚商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格里布商人所带来的不同经济绩效。他发现二者组织结构存在系统性差异，并将之归结为个人主义和

集体主义信念的差异。伊斯兰世界的商人形成了集团内社会交流网络以进行集体行动。然而,这种网络只在相对较小的同质的种族群体中是有效的,而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种族群体多样性的增加,这种网络不可能仅限于人格化交换。相反,热那亚商人形成了双边实施机制,这就需要正式法律组织和政治组织来监督并实施合约——一条允许并导致复杂交易的制度和组织路径。

是什么引起规范的变化呢?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 1993)比较了意大利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他认为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社会资本的显著差异来源于八个世纪之前北部被不同类型的等级制控制,而南部却能自由解决问题。第5章提到的普拉图和速水佑次郎的研究认为,规范的发展来自先前的物理环境和政治结构。以非洲为例,再分配规范是在具有低人口密度和丰富土地资源的物理环境中产生的。因为土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发展中作用不大,有关土地的私人财产权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因此,在乡村社区中,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制没有形成,在人口众多、土地较少的亚洲也是一样。“在这些社会中,压制那些试图从经济上解放自己的人们规则往往根植于对世界超理性的神奇理解中。在自由发挥奇思妙想的情况下,信念体系把超自然的、神话了的人物纳入进来,人们认为他们能负责供给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人类的努力和最终实现的生产被看作是不相关的,没有因果关系”(1998, 408)。在这样的结构中,成功是靠运气,而好运气的收益不应仅限于胜利者。而且“有一种担忧,即如果能够自由选择,那些获得高收入的人就会试图逃避他们应负的责任,而且会在互相保险机制中背叛其他人(因为他们通过积累剩余的收入能够有效地实现自我保险)”。这种结构中的再分配规范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税收,是为了控制“获取地位的竞争”。如第4章所述,这种关于规范起源的观点和人类学家对文化多样性的系统性的研究结论是矛盾的;但是,它反映了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从解决物理环境问题而建立的信念体系转换到解决人文环境问题的信念体系是很困难的。

经济绩效最终是由一般经济规则及其实施特征和每一个市场——要

素、产品或者政治市场——上的特定制度结构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时点上，每一个市场的激励结构和其他市场的都不同，会随着它的实施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在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中普遍存在一个偏见，即无政府干预是一个特定市场有良好经济绩效的充分条件，所以我们有必要强调任一市场的绩效是制度（正式规则——包括政府制定的——非正式规范及其实施特征）施加的约束集合的函数，制度决定着那个市场的激励结构。如第5章对制度变迁的讨论，如果激励有利于盗版，那么盗版就会盛行。任何一个怀疑这一点的经济学家只需要考察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各种要素和产品市场就可以看出，从制度框架中产生的激励结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2001年到2002年美国大型公司不正当行为猖獗，正是由于制度框架的演化改变了相对价格，才为这种不正当行为提供了激励。

随着技术、相对价格和其他外部约束的变化，相应市场的绩效也发生变化，制度并不一定会自动调整来保持市场的效率。关键问题是认识到有效的市场需要低的构建市场的交易成本，并且不同类型的市场交易成本不同，同一市场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成本。要实现必要的变迁，我们就会面临路径依赖施加的困境。

路径依赖是一个历史事实，是研究历史的最持久、最重要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变路径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了，通过学习过程，我们今天的制度限定了未来选择。由现有制度矩阵产生的组织是依靠现有制度矩阵得以生存和获得福利的，因此会努力阻止任何会给它们福利带来负效应的变化。决定制度矩阵的信念体系也会阻止激进的变革。关于路径依赖的前沿性研究正在对路径依赖的各种来源进行经验分析，从而使我们能够精确地了解路径依赖的含义。

西方经济维持了长足进步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济增长是系统内生的，然而在一千万年前经济增长只是偶然出现，甚至是没有发生过的。既然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或者最近才实现了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内生于系统这一命题还值得怀疑。值得强调的是，15年或20年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能证明经济增长内生于系统。拉丁美洲的经济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停滞—增长过程。适应性效率——描述美国和西欧的那种类型的效率——需要一套能够迅速适应冲击、扰动和普遍不确定性——这是每一个社会的历史特征——的制度体系。这种灵活的制度是以非正式约束所形成的信念为基础的。尽管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必须声明，我们不知道如何在短期内创造这些条件。在西方世界，这是几个世纪制度变迁的结果。

V

作为本章的小结，我们把前面几章提到的问题综合起来讨论：我们所讲的经济变迁是什么含义？它和第5章论述的制度变迁的源泉有什么关系？通过这一章，我们对经济变迁过程有什么新的理解？

经济变迁是指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变化。从广义上讲不仅可量化为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变化，市场活动带来的人类财富的变化，而且可量化为非市场经济活动所反映的人类财富的变化——这个方面虽不能精确地度量，但却很重要。

知识存量的增加是增进人类福利的基本决定性因素。如果仅仅关注这一点我们的研究就十分简单了；而实际上是知识、制度和人口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才构成了经济变迁过程。

制度变迁是人类施加给人类交互作用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目的是为了达到某种合意的结果。因为制度变迁对结果的影响程度与相关参与者的意图有关，所以意图和目的之间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尽管参与者的意图并不一定在整个经济过程中都得以改善）。尽管如此，我们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参与者的信念反映“现实”的精确度，以及预测参与者行为能否产生合意结果的精确度。经济变迁的广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由制度变迁来预测，这就反映了目的和结果之间存在一个由“错误”信念造成的差距。这种错误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地理解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制度结构的改变没有按所期望的方式改变参与者行为。

79

如果精心设计的人造结构是对制度框架的有益补充，而且制度的改变建立在反映其特征的合理知识的基础之上，那么结果就很有可能和目的一致。随着外在符号存储的发展和存储系统信息丰富程度的增加，人脑解决认知问题的能力会大幅度增强。但同时人类也增加了环境的复杂性，这又进一步对认知能力提出挑战。

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制度框架是结果偏离目的的重要源泉。如前所述，这是因为在政治市场上，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信息（知识）是不完美的，并因此具有高交易成本。尽管合意的制度结构能够避免恶性循环，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制度结构才能产生合意的福利结果。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的某种组合能够提高经济绩效，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哪种组合能够在某一个时点上或者在不同时期产生合意的结果。

不管人类意图是提高经济绩效，还是使参与者“钱包变厚”，人类在改造外在环境时所犯的错误也是结果背离意图的原因。参与者的意图是什么也是一个问题。经济变迁的总方向反映了具有不同目标的政治家和企业家的总体选择意图，其中大部分人并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对总体绩效的影响。当经济市场的构造使参与者通过价格和质量而不是通过非生产性的谈判进行竞争时，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会起作用。但是，最终结果是经济和政治决策的混合产物，这些决策总体上影响了各个政治和经济市场的绩效，同时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参与者都要受到路径依赖的约束——从过去继承而来的信念、制度和人造结构的组合对决策的约束。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第二篇

前方的路



引言

83

信念是建立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基础的关键，它既包括个体拥有的信念，又包括那些形成信念体系的共享信念。这种解释简单明了；我们所构建并试图去理解的这个世界是人类心智的建构物。它不能在人类心智之外独立存在；因而我们所理解的与自然科学中的不同。在自然科学中，我们能够使用简化论（reductionism）来理解自然界。在寻求对自然界中某些困惑的更多理解时，自然科学家们能从自然科学的基本单位入手建构理论，以探究他们试图理

解的问题的维度。而社会科学没有与基因、质子、中子和分子相类似的基本单位来建构理论。构成人类互动 (social interaction) 基础的总体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一种建构,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一种递增的过程演化着; 社会文化就是世代沿袭的信念和制度的集合体。

尽管人类创造的这种建构是人类心智的主观函数, 但人类仍不断地以证据检验这些建构, 看其是否具有解释价值。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证据和理论都是人类的建构, 它们充其量只是我们试图理解并进而控制的这个世界的很不完美的映象。

我们有必要记住: 人类的建构是“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迷信、宗教、神话、偏见)的混合体, 它们共同影响着人类做出的选择。我们的任务是理解信念体系的演化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复杂的社会结构; 我们更要去尝试理解这种社会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化的方式。

84 因此, 我们必须考察意识与不同经验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的经验产生不同的文化——制度——模式。我们必须解释信念体系的起源: 信念体系或者为生产性政治经济制度的创立提供有利环境, 或者反过来阻碍这些制度的创立。不管制度建构是否为改善经济绩效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我们都必须理解逐渐形成的这一复杂结构。

集中研究人类构建的激励结构的新制度经济学, 应该能够提供对我们构建的相互依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世界里的复杂联结的更深入的理解。形式化的(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忽视了这种结构, 因而对于处理这些问题, 其价值是有限的。社会学家们提出的信息网络考察了从事各种经济活动^[1]所必需的复杂联结。硅谷发展起来的复杂信息渠道, 能实现计算机革命的潜能, 而且超越了在标准经济学中形成的企业和市场的正式结构。交易成本经济学为我们拓宽和加深经济分析以应对这些问题打开了一个窗口。但是, 要理解人类心智创造的、不断演化的社会结构中的复杂的相互依赖性, 我们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缺乏这种理解, 我们基本上无法去提高社会经济绩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隐含着经济发展的四个基本障碍, 由于这些障碍涉及显性的制度分析, 因而被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忽视。

1. 从人格化交换 (personal exchange) 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这一转变已经是并且仍然是一个基本障碍, 它阻碍了亚当·斯密将国民财富视为市场规模的一个函数时所想象的经济潜力的实现。必要的制度变迁——获得来自大规模 (和人格化) 市场的收益所必需——要求根本性的反思, 这与我们的基因传承不相一致。

2. 亚当·斯密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是知识的专业化。以低交易成本整合分散的知识是一个不能完全依靠价格体系来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新的制度和组织的联结来克服妨碍价格体系充分整合分散知识的一些问题, 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

3. 必须建立运作良好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 为参与人竞争利润提供激励, 从而促进生产率不断地增长。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实现斯密所说的有益结果。此外, 在一个技术、信息成本和政治不断变化的动态世界中, 没有哪种结构能够自动改变以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参数, 从而继续产生有效率的市場。

4. 运作良好的市场需要政府, 但并不是什么政府都能胜任。必须建立限制政府行为的制度, 使市场免受其害。因此, 解决发展问题需要建立政治制度, 这些政治制度能为运作良好的经济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奠定基础, 同时, 还能限制政府及其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和权威。

以下章节概述了人类环境演化的总体轮廓, 考察了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制度复杂性, 以及不同经济体所发生的变迁过程, 然后得出了理解经济变迁和提高经济绩效的含义。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出一个研究议程; 我希望能激发学术热情, 使研究议程继续下去。

第7章 不断演化的人类环境

87 理解不断发展的人类环境的必要前提是理解那些导致物理环境被“征服”的革命性变化：这些变化为不断发展的人类环境提供了背景。对物理环境的征服是有关物质世界的知识及其在解决经济稀缺和人类福祉问题上的应用不断增加的结果。我已在较早的研究中（North, 1981）描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一次经济革命是肇始于公元前第八个千年的农业发展。第二次经济革命是科学知识在解决经济和人口问题中的应用（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

其结果是经济生产率和人类福祉及寿命的巨大飞跃。我将首先概述对物理环境的征服，然后尽我所能地描述人类环境不断演化的特征，并考察与理解这一特征密不可分的各种挑战。

I

征服物理环境的背景是类人生物 (humanoids) 身体特征的初始改变与文化变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首先注意到大约四百万年前人类从其他灵长类动物中分化出来；一直到新石器革命之前，人类都在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这四百万年留下来的基因特征为思维过程提供了位于深处的公分母 (common denominator)。人类脑容量的增加、直立行走以及声带的发展都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复杂性，而文化的复杂性正是伴随着非常复杂的工具，特别是语言产生的。结果就是不同的语言和组织模式的发展以及农业被社会采纳。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活动和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也与日俱增。在城邦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以及埃及王朝统治之后，是在中国、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地区多种文明的兴起。甚至在最近两个千年之前，我们就有了令人困惑的大量不同的政体、经济和社会。^[1]

88

环境对于人类发展的慷慨在不同的发展模式起着关键的作用。不仅气候非常重要，而且动物与人类的相互影响、随后的免疫系统的发展模式，以及暴露于并非初始环境一部分的病菌中的毁灭性结果都在人类活动的分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直到现代，随着科学知识在经济稀缺问题中的系统应用、对许多传染病的征服和空调装置的发展，物理环境才停止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但是，直至今日，疟疾和舌蝇对人类的定居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最近的两千年以史无前例的变革为特征。外部存储源 (external memory sources) 的发展促进了这一变革。外部存储源经由日益复杂的符号存储系统的发展，为复杂社会的兴起提供了可能。从文字的发展到

89 现代计算机，这一过程历经人类对日益复杂的环境的处理能力不断增长的漫长故事。^[3]西方学者相当近视的眼光不仅在地理上只集中于西方世界的兴起而忽略了世界的其他部分，而且在时间上只集中于将工业革命作为经济史——实际上是社会史——的分水岭而忽略了更早的世纪，也忽略了构成现代经济增长基础的社会、政治和广泛的制度因素。全面分析必须一视同仁地包括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其他文明的“受抑制的”发展，包括英国创新的加速和在此之前的长期渐进的变革。凡是已经存在的统计数据，我们都可以用来一部分一部分地描述这一图景中变革的大小。它们提供了人类环境革命性变化的引人注目的证据。

90 人类对与物理环境相关的不确定性的征服在自 18 世纪现代伊始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图 7—1 阐明了这一引人注目的变化，同时也阐明了知识的主要发展、技术进步和归因于爆炸性发展的科学突破。结果就是预期寿命的显著增加（图 7—2）和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图 7—3）。随之发生的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之间的增长差异如表 7—1 所示。这些不发达世界未能利用科学技术来解决稀缺问题。在不确定性与物理环境相关的世界中，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相互依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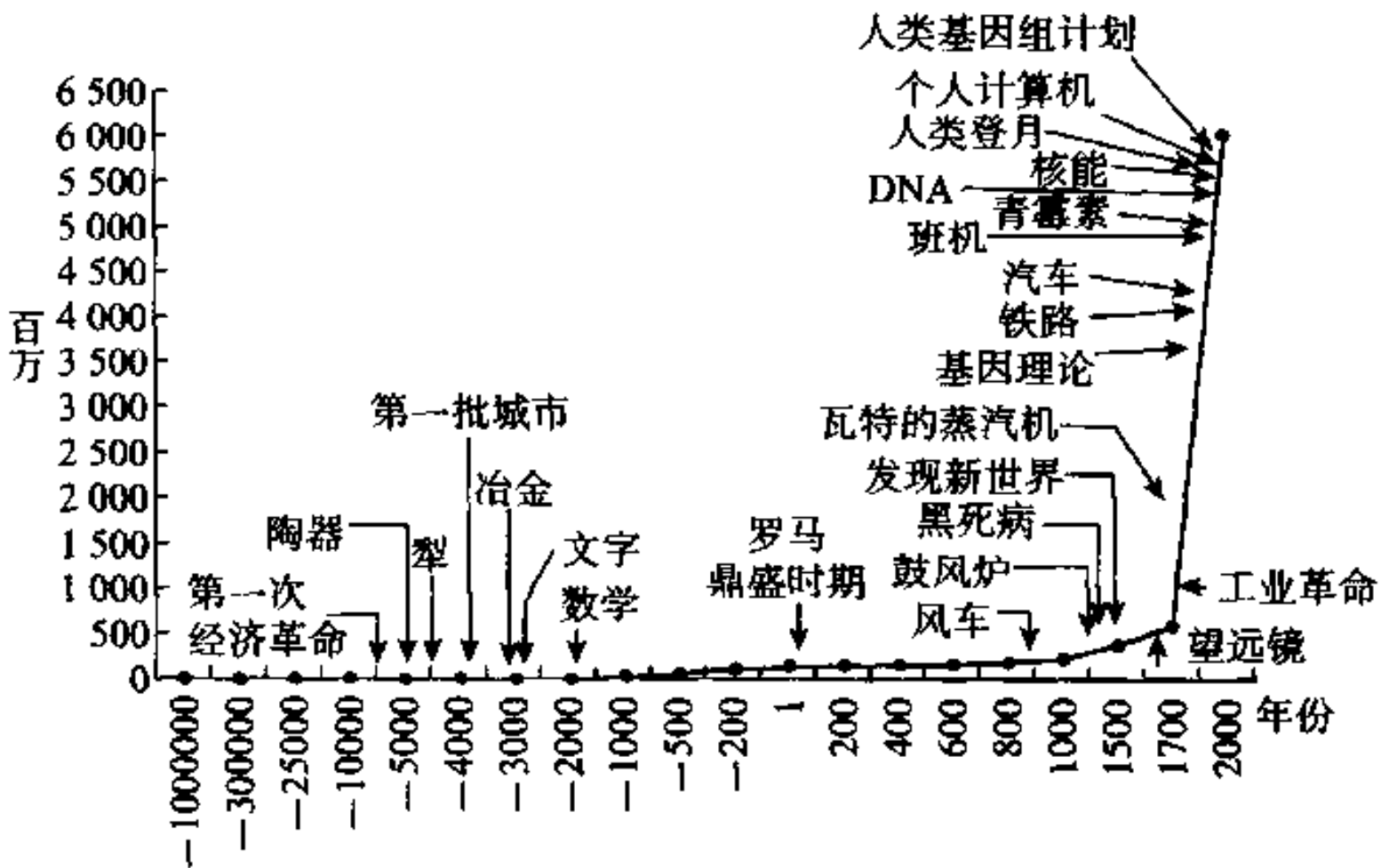


图 7—1 公元前 100 万年至今的世界人口

资料来源：Kremer (1990, 683)；另根据 Fogel (2003) 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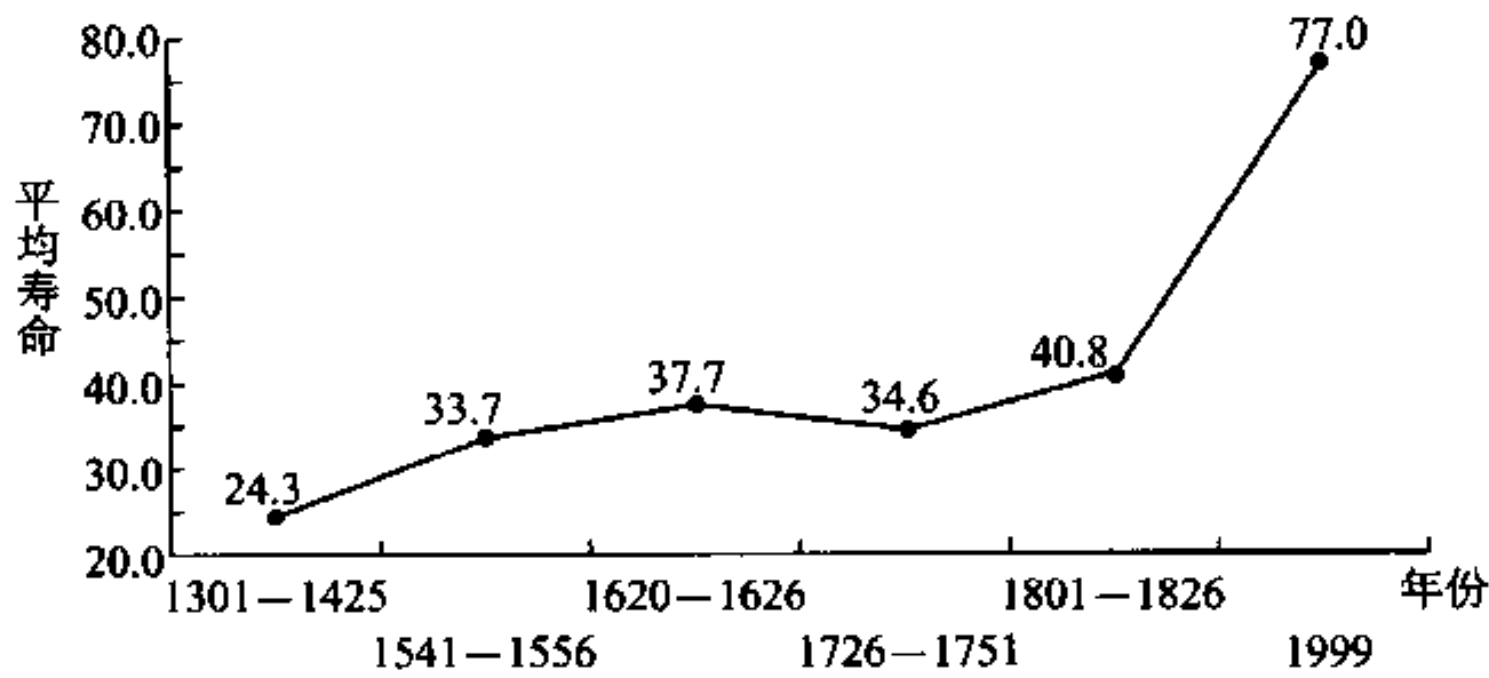


图 7—2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从 1300 年至今的平均寿命

资料来源: Maddison (2001,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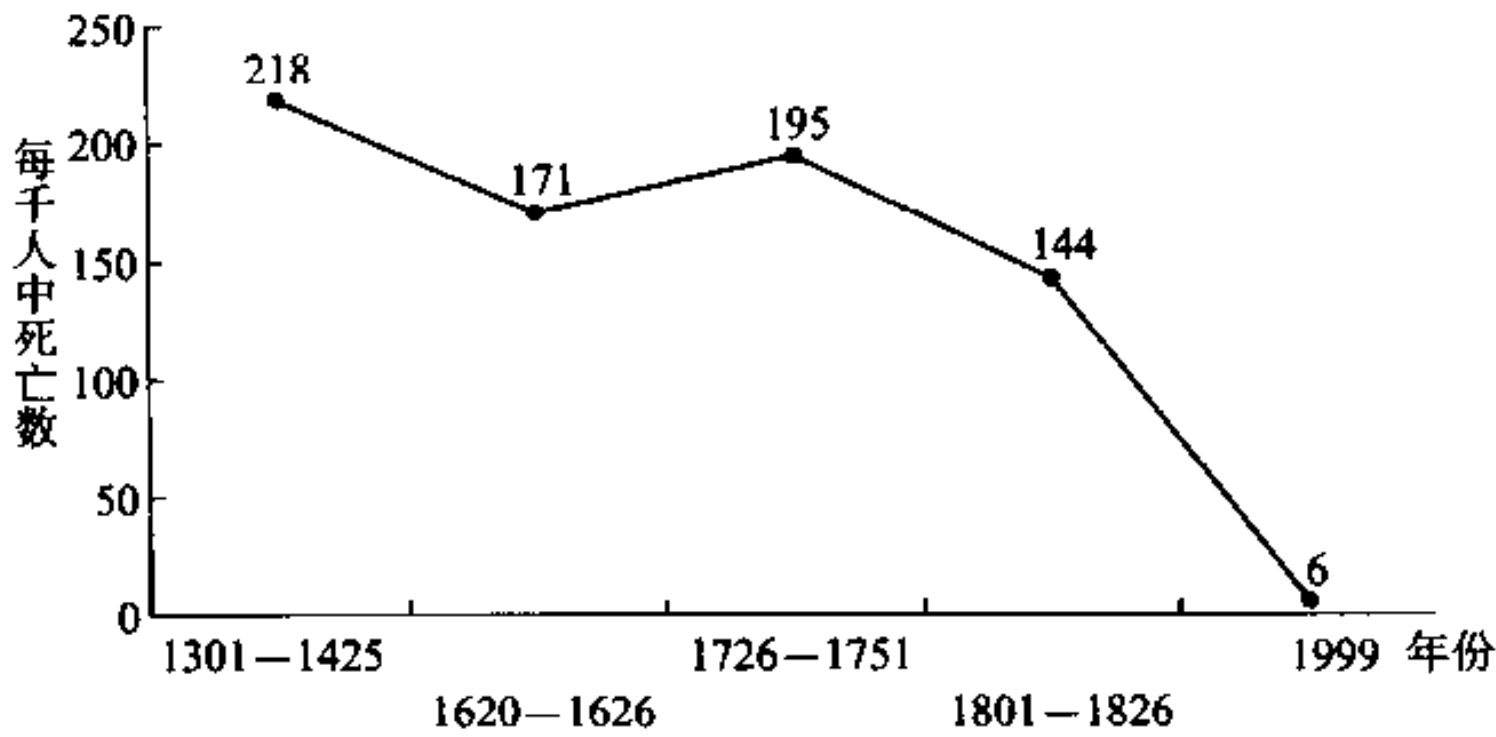


图 7—3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1300—1999 年出生第一年每一千人的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 Maddison (2001, 29)。

表 7—1 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的人均 GDP: 1000 年—1998 年

	(1990 年国际美元)					
	1000	1500	1600	1700	1820	1998
发达世界平均	405	704	805	907	1 130	21 470
不发达世界平均	440	535	548	551	573	3 102
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的比率	0.92	1.32	1.47	1.65	1.97	6.92

资料来源: Maddison (2001, 46)。

世界作为人类环境复杂结构的体现，它们的发展又体现在大城市数目，特别是自 1900 年之后的大城市数目（图 7—4）的不断增加，以及居住在超过 5 000 居民的城市中的人口百分比的不断上升中（图 7—5）。农村向城市的转化反映了产出中的一个基本改变，即从农业和其他耗取自然资源的活动向制造业并最终向服务业的改变。这并不是说耗取自然资源的活动绝对地衰落了——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产品出口国；而是说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用相对较少的生产要素投入不断扩展农业和制造业产出成为可能，同时不断提高的服务需求也导致在很大程度上更高比例的资源流入服务业。某些服务，比如医药，富有收入弹性（当我们变得更加富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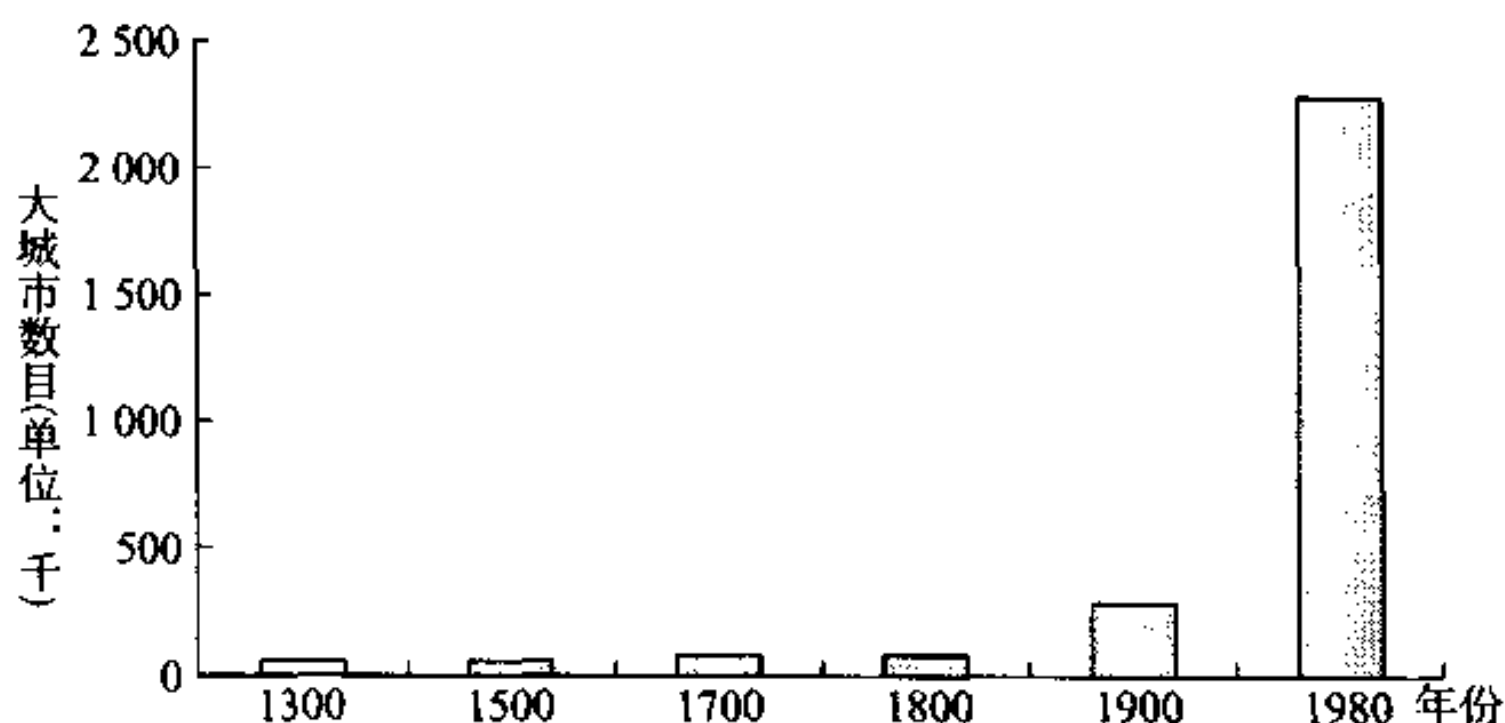


图 7—4 世界上的大城市数目 (1300 年—1980 年)

注：大城市指人口超过 10 万的城市

资料来源：Baivoch (1988, 5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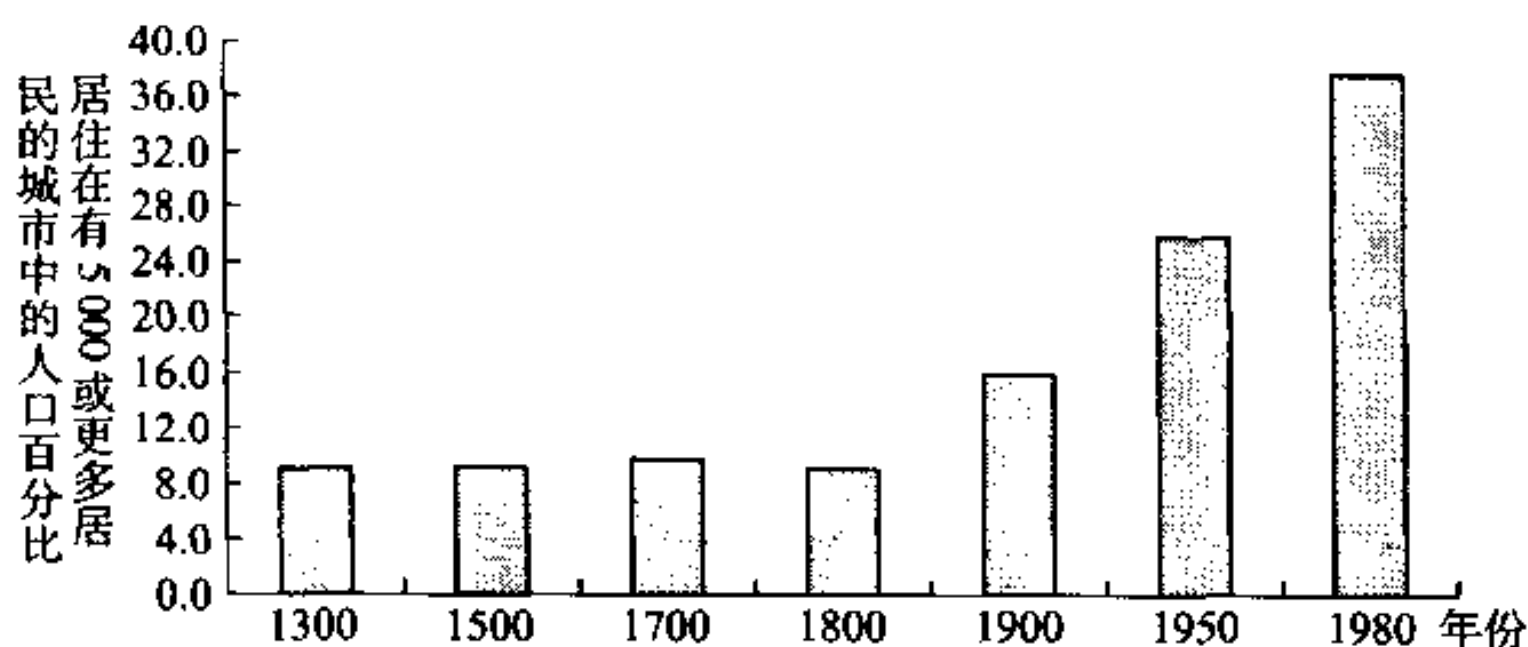


图 7—5 世界上的都市化

资料来源：Baivoch (1988, 495).

时,我们将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它们),但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原因却是资源被用于交易过程。交易成本是与交换有关的成本;而且随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增加,交换次数也会增加,而每一次交换都需花费资源。银行、保险、金融、批发和零售贸易连同大部分政府活动都是交换环节的组成部分。同时,在企业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会计、律师和其他人专职于在复杂的非人格化交换的世界中使交换更容易。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不无例外地提高了交易成本,但结果却是生产成本的急剧降低,这在抵消不断增加的用于交换的资源之后,仍绰绰有余——同时也成为现代经济急剧增长的原因。图 7—6 表示从 1870 年到 1970 年美国经 92 济中交易部门的总体增长(外推至 2000 年)。这一增长主要反映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以及随之发生的非人格化交换的不断发展,虽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增长也部分反映了通过垄断和限制竞争来限制生产率增长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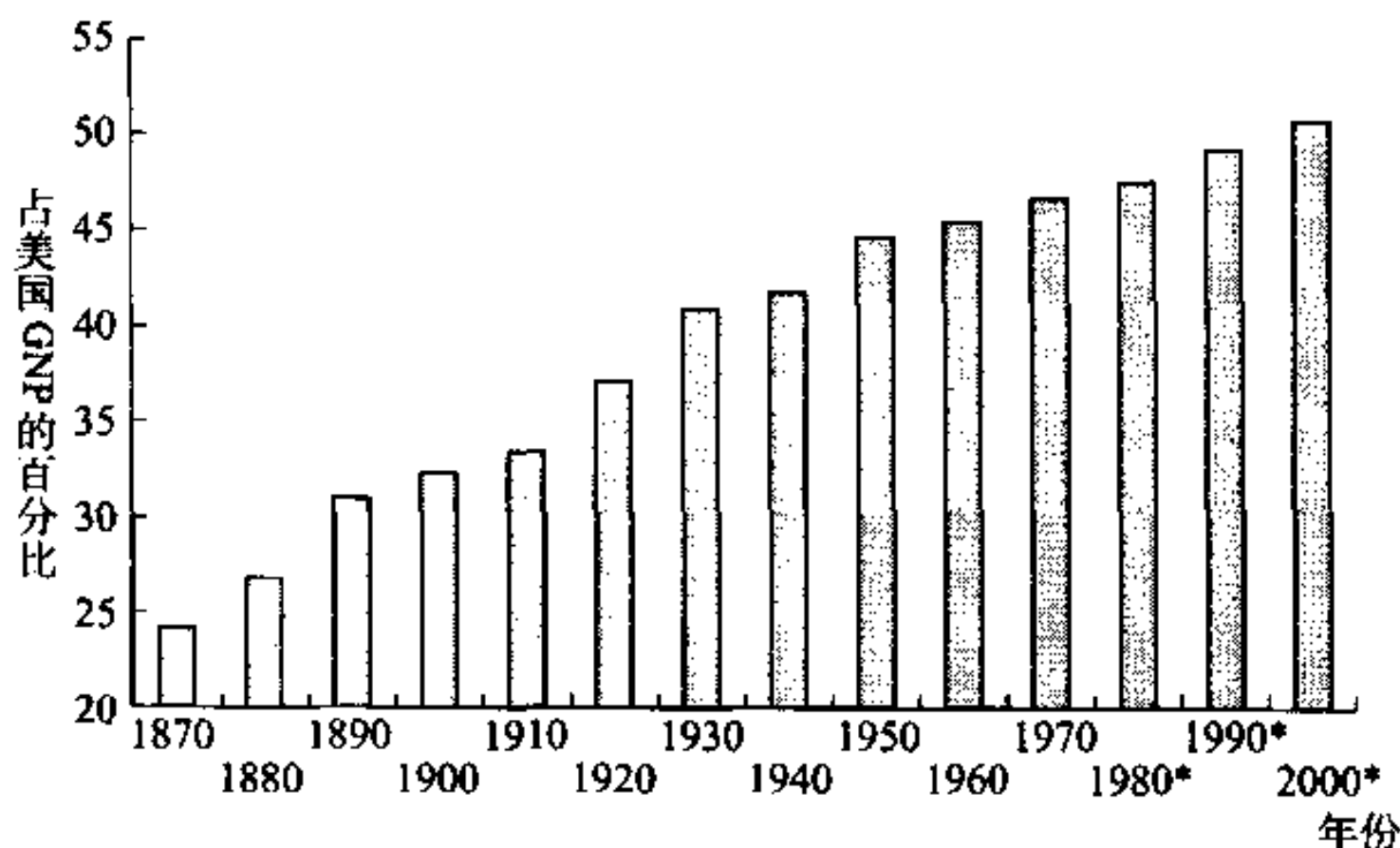


图 7—6 交易成本占美国 GNP 的百分比, 1870 年—2000 年

资料来源: Wallis and North (1988).

不断增加的国际间相互依赖在国际贸易的增长中得到体现。即使国内增长是新人类环境的引人注目的特征, 现代世界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依然可以由图 7—7 中出口占 GNP 的百分比的增长来突出地说明。

对物理环境的征服降低或消除了人类不确定性的传统根源, 但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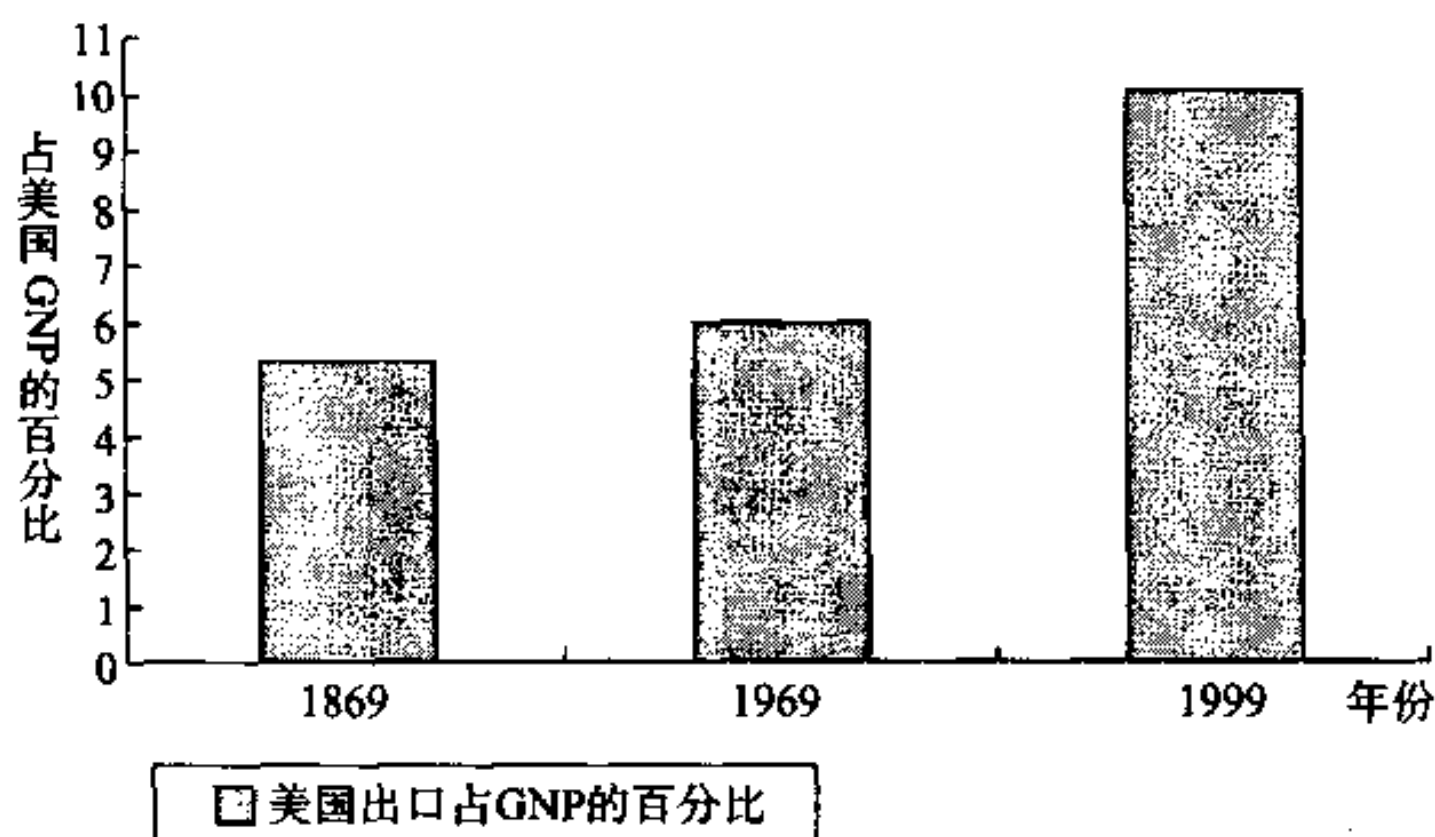


图 7—7 1869 年—1999 年的国际贸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商务部（1976 年）和美国财政部（2001 年）资料的计算。

发展的人类环境取而代之，并对人类福祉甚至人类生存提出新的和更加致命的挑战。技术革命一方面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世界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成为其破坏力足以毁灭城市、国家甚至全体人类的武器的根源。20 世纪见证了比以往历史更多的人员伤亡（图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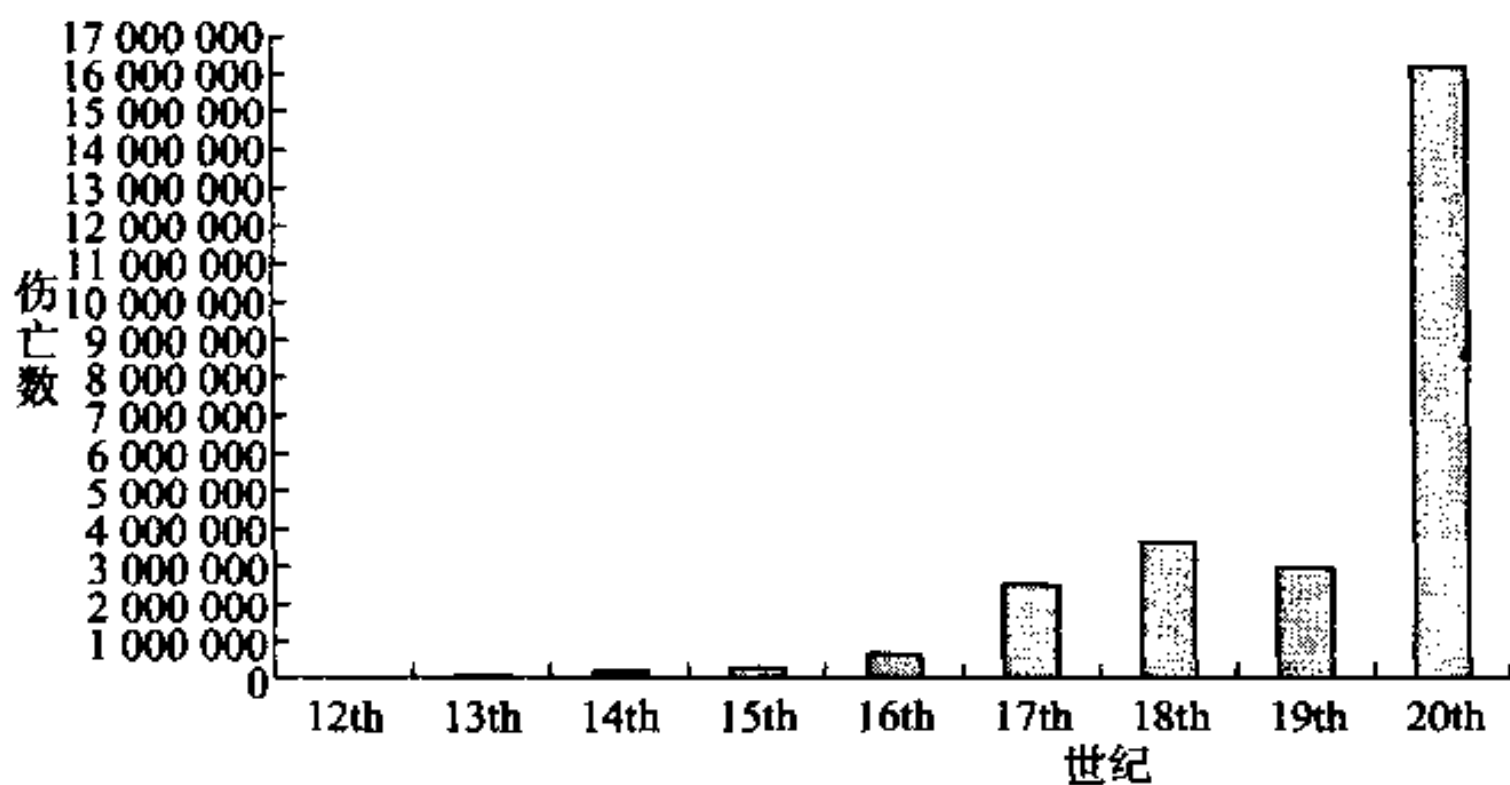


图 7—8 12 世纪到 13 世纪英国、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的伤亡人数

资料来源：Peace Pledge Vnion, www.ppu.org.uk/war/facts/nine_century.html.

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生活标准相对同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最近一个世纪的显著特征。第三世界没有能

力利用现代技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令人吃惊的对比，也是对阻碍非人格化交换的发展进而阻碍生产率发展的制度框架和基本信念的反映（图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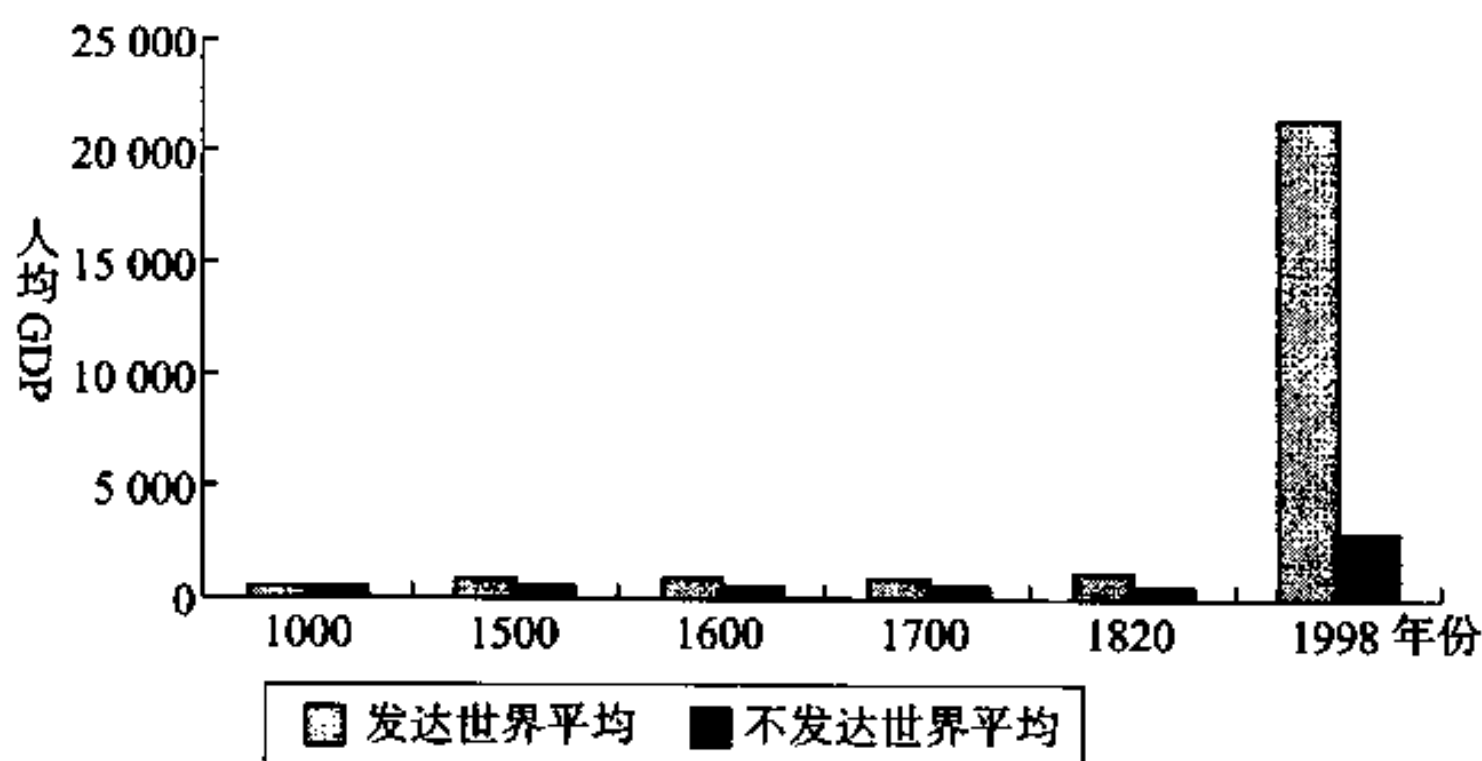


图7—9 1000年—1998年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的人均GDP

资料来源：Maddison (2001)。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对不同环境的多种多样的反应通过语言、习俗、技术和组织的方式清晰地表现出来。物理环境对人类发展的有差别的慷慨解释了在人类福祉上存在的大量历史差异。但是，由于科学技术减缓了物理环境上的差异，人口、知识存量和社会制度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就逐渐地决定了绩效（尽管过去的长期阴影还深深影响着现在）。

对人口规模和人口质量——不仅是身体质量而且是“人力资本”质量——随着时间的发展，人口统计学家的最新研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说明。对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不断变化的源泉、营养状况、发病率以及在文献中——这些文献有时具有新家庭经济学的特征——广泛涉及的人口质量的其他方面等不断变化的源泉，我们的理解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正是在人口统计的变化上，我们见证了对物理环境的征服的最引人注目的结果。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及其合作者的开创性工作清晰地说明了人类人口统计上的显著变化。具体来说，“在过去三百年，特别

是在上个世纪，人类对环境的控制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控制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不仅使人类与其他物种分离，而且也使他们与所有前代人有所不同。这一新的控制程度使现代人（Homo Sapiens）能将平均身高提高超过 50%，平均寿命提高超过 100%，也大大改进了要害器官系统（vital organ systems）的稳健性（robustness）和机能”（Fogel and Losta, 1997）。福格尔最初关注的焦点是营养状况，这从托马斯·麦基翁（Thomas McKeown）的著名研究《人口的现代兴起》（*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中汲取了灵感。该书指出，医学进步不能解释观察到的死亡率下降。福格尔和其他人近来的研究承认：营养状况不仅受到营养摄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疾病的影响；对传染病的征服才是最重要的。

福格尔和其他人的研究向我们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质量和数量都得到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是度量人类质量的一种尝试。人类发展指数是经过标准化的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寿命和成人识字率指标的简单加总。科斯塔和斯特克尔（Costa and Steckel, 1995）估计了美国 1800—1970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图 7—10）。质量改善的另一显著方面是更低的慢性病发病率。正如福格尔（Fogel, 2003）表明的，我们不仅活得更长，我们也活得更健康（图 7—11）。主要成就包括始于 19 世纪中叶的预防疾病传播的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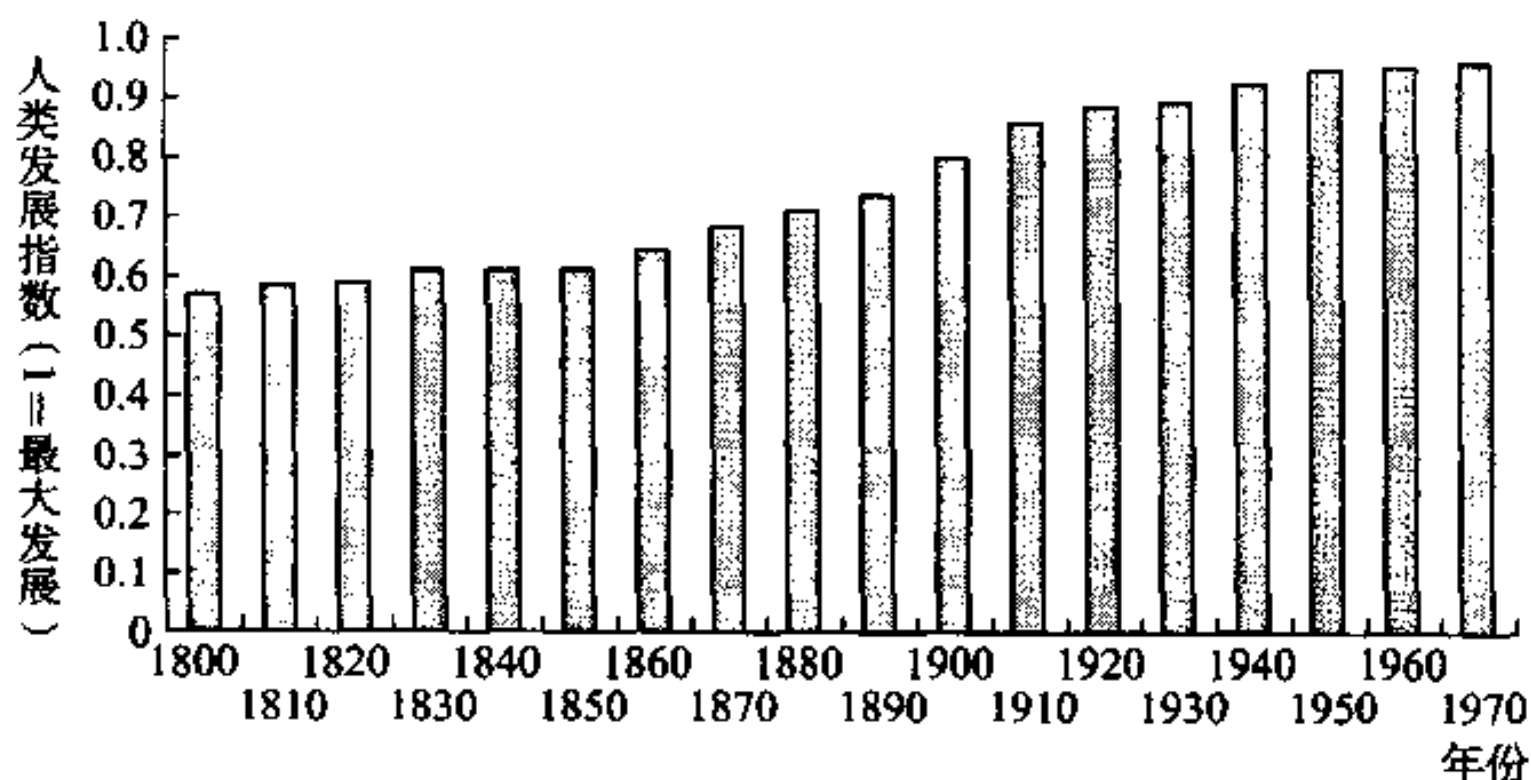


图 7—10 科斯塔和斯特克尔对人类发展指数的估计

资料来源：Costa and Steckel (1995)。

方法；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用于预防特定疾病的新疫苗；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用于治疗传染病的新药物。很明显，新知识是这一革命性的人口统计变化的关键所在；但制度扮演什么角色呢？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 1999）令人信服地表明，成为这一革命基础的制度发展并非市场制度的发展（市场制度支撑着经济福利的增长），而是以公共健康体系为中心的新制度。“这一体系的功能在不同程度上包括健康教育、管制、强制以及服务的融资或服务的直接供给。公共健康体系的建立要求对控制主要传染病的社会责任的认可。由于生物医学知识的进步日益表明超出个人控制的因素才是疾病的主要源泉，这一规范发生了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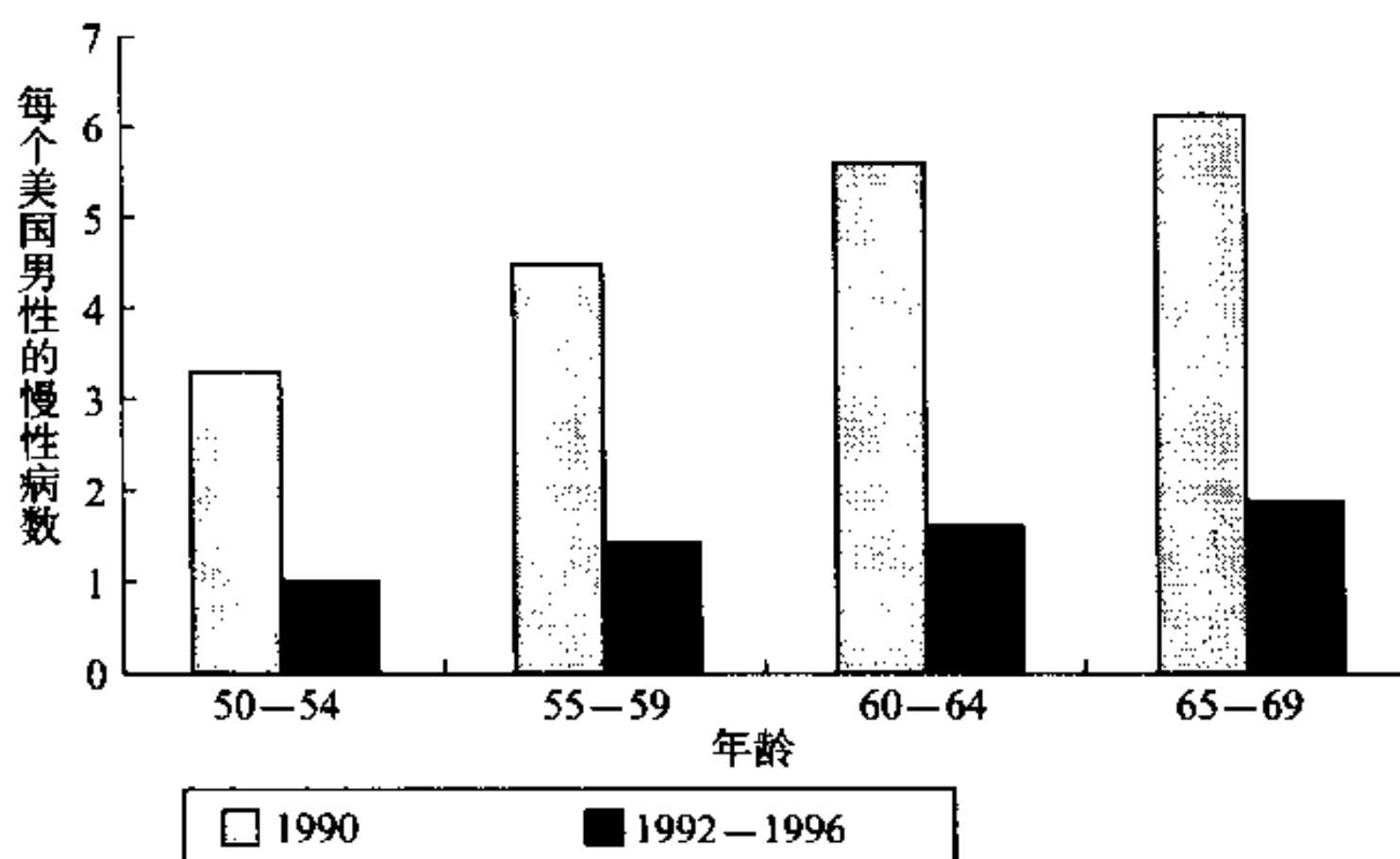


图 7—11 1900 年和 20 世纪 90 年代每个美国男性得慢性病的年龄和数目

资料来源：Fogel (2003, Table 4.5).

最近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不断变化的知识存量的理解，尽管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一变化的一个方面——但却是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即技术知识变化的根源。虽然人类对自然控制能力的不断增长是我们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由于社会已越来越复杂，并且在过去几个世纪又因科学的发展及其在技术中的应用而发生彻底变革，这种技术的发展已经加速了。16 和 17 世纪科学的发展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始于 19 世纪晚

97

期德国化学工业的科学在解决稀缺问题上的应用是个构思巧妙的故事。乔尔·莫可里 (Joe Mokyr, 2000) 逼真地描述的故事比通常经济历史学家的故事更复杂。新知识、应用知识和技术的复杂混合体被用于实现这些知识潜力的制度和组织整合到一起。在最近的著作中, 莫可里 (2002) 强调了支撑科学发展的制度框架的发展。

已成增长关键特征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实现了知识专业化, 使其成为一个基本特征, 这导致了人类生产率的显著提高。知识专业化的一个指标就是 20 世纪专业科学杂志的显著增加 (见图 7—12)。以低交易成本对专业知识进行整合, 要求的不仅仅是有效的价格体系。在必须克服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搭便车问题的场合, 制度和组织是补充价格体系所必需的。现代社会日益分散的知识需要一个复杂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来整合和应用这些知识。对本文的研究来说, 这具有根本的意义: 知识的增长依赖于互补的制度, 这些互补的制度促进和鼓励知识的增长, 知识不会自动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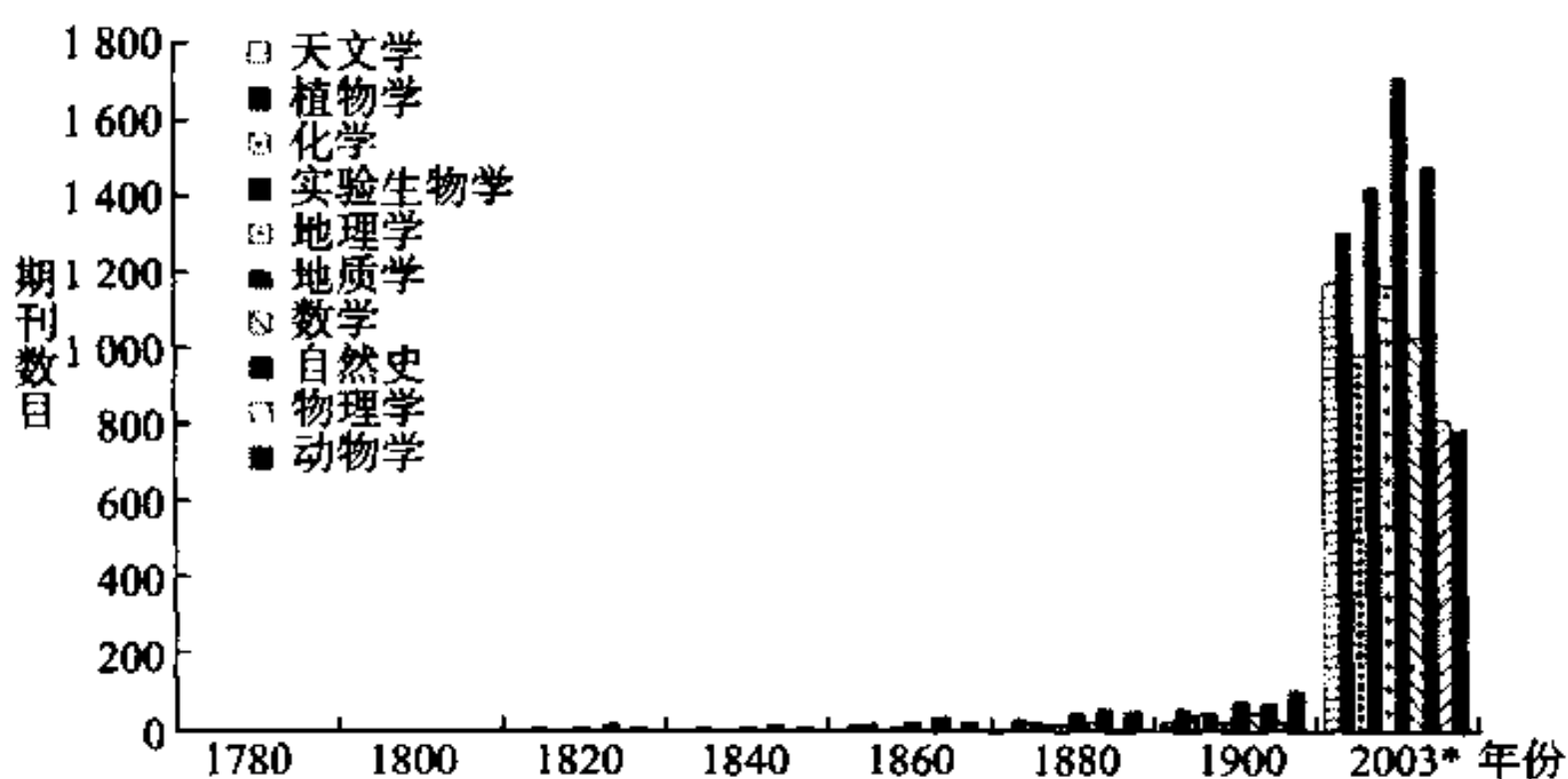


图 7—12 1780 年至今的科学期刊

资料来源: Law and Kim (2003).

* 取自哈佛大学霍利斯目录 (Hollis Catalog)。霍利斯目录中的书目数等于从霍利斯期刊数据库以关键词为条件的搜索中获得的记录数。

前述讨论仅限于与经济绩效直接相关的知识; 但是正如前面章节所强调的, 我们必须关注更广阔背景中的知识。对于知识存量的总体增加

及不断演化的认知和信念如何影响知识增长的方向，我们都所知甚少。一个棘手的问题正是当我们谈及知识的时候，我们到底指什么。因为纵观历史，人类决策都受到所拥有的时常被证明是错误的信念的指导。实际上，本研究的中心就是有关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他们处理不确定性的方式。信念也是知识吗？19世纪早期的医学信念常常是无效性与有效性并存（as often counter-productive as productive），“正如他们做的那样，集中于依靠催吐剂、通便药、利尿剂和放血进行治疗”（Rosenberg, 1979, 13）。而且这一错误的医学信念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在孟加拉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不到30%的母亲相信，受到污染的食物或水是造成腹泻的可能原因（Easterlin, 1996, 15）。

II

现在我试图结合第一部分的材料和对从适于物理环境的制度向应对人类环境的制度的转化所进行的讨论，从中整理出一个不断发展的人类图景的概要。结论强烈地支持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的结果。^[5]人类的先天智力成为个人交换的基础。这些基因特征为交换提供了框架，也是将整个历史过程中各个社会区别开来的人类互动结构的基础。对决策功能和权利的认可允许个人交换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区。

100

前面第一部分的一个论点是，信念反映了人类在不同社会和物理环境中遭遇的不同经历。至于从面对与物理环境相连的不确定性时的信念转换为能够应对不断演化的人类环境的复杂性的信念，不同的经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适应性。特别地，西方世界向应对这些复杂性的信念的成功转型，正如在非人格化交换的发展、在复杂的经济结构中有效利用非人格化交换所不可缺少的专门知识的整合，以及支撑这些变化的政体的或多或少成功的发展中所反映的那样，与不发达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不发达世界拙劣的经济绩效反映了它们没有能力进行这种转型。这样，“传统农村社会的特征非常适于应对过去的挑战。例如，在风险充溢而

又不能以别的方式加以套期保值的世界中，当迫切需要共享信念以维持风险分担的安排和长期的社会凝聚力的时候，共享信念就利大于弊”（Abraham and Platteau, 2002, 25）。

这些是面临物理环境不确定性的社会的特征。随着环境的变化，人类环境日益提出至关紧要的问题，即不断增长的机会使得社会组织的根本转换成为必需。“这要求依赖于相互控制、尊重等级和严格实施的慷慨准则的以身份为基础的强制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在开放社会中，自由进入和退出、民主治理（包括对异议的容忍）、能力标准和社会经济的分化被用作指导准则或清楚地运行”（同上，26）。

101 适于应付物理环境不确定性的制度和信念与人类建构的应对人类环境的制度和信念的对比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关键。实验经济学的最新研究开始给我们提供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理解。作为前一种社会特征的集体主义文化信念产生了适于人格化交换的制度，其内聚力和结构是围绕紧密的个人纽带建立的；与之相比，在对新的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演化而成的个人主义框架却更少地依赖于个人纽带，而更多地依赖于规则和实施机制。每种结构孕育了自己的一套信念，这套信念又塑造了政体、经济和社会不断演化的结构。在此基础上，我试图描述经济变迁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不断变化的人类状况的关键特征，也将作为随后章节的引言。

1. 现代经济增长就其根源来说源于与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有关的知识存量的增长。作为这一革命的特征的态度、程序和实验方法的根源是什么？这是一个西方的现象，很明显这与导致西方世界从 10 世纪世界上相对落后的地区兴起，成为 18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卓越地区的制度发展有关。但那是个相当复杂的故事，其中制度变迁的方向受到包括我们分析的三条线索（人口统计的变化、知识存量和制度）之间的互相作用在内的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又反映了信念体系的发展。信念体系来自何处？我在其他文章中（North, 1995b）指出，信念体系的根源存在于中世纪早期现代欧洲宗教信仰逐渐演化，以及宗教信仰随后又深受该地区特有的经历影响的过

程之中。

2. 适于应对物理环境的经济和人类建构的应对人类环境的经济之间不同绩效特征的鲜明对比，提出了有关基本的不同模式的根本问题。这些不同模式的逐步演化一方面导致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却导致经济停滞。很明显，这是一个变迁的动力学问题，其中一个社会正在发生的经历逐渐地改变了现有信念，因此也逐渐改变了制度框架；结果可能形成了对人类环境的变化做出有效反应的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或者可能导致了经济停滞和日益机能不良的态度和政策。我们能描绘出产生这些对比鲜明的模式的序贯模式（sequential patterns）吗？

3. 理解现代经济增长需要将前面的分析纳入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在下列诸多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改善营养使人更富生产力、用于解决人类稀缺问题的有用知识存量的增加、引导人们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政治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政治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政治制度）、不仅一时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组织要素和产品市场以提高效率的经济制度、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用于改善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所有这些都对现代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存在非理性的信念、带来更具破坏力的武器的技术、对不同信念持久的不宽容以及随之发生的持续的人类自我毁灭模式。有多少经济增长是英明决断的结果，而不是单纯地归结为好运？

第8章 秩序和无序的根源

103 经济学家很少将秩序和无序置于研究的中心。^[1]历史——和当代——经验显示他们应该如此。在动态变迁的环境中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曾是古老的社会两难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中心问题。经济变迁引起绝对和相对收入的改变、经济地位的改变，以及个人和集团在社会中的保障的改变，因此是无序的滋生地。在某些时期，无序（例如通过革命）对所有社会来说都是地方性的；但是，尽管某些社会迅速重建了稳定的秩序，其他社会的无序状态却持续

很长时期，甚至即使秩序重新建立了起来，它的维持也异常脆弱。从表面上来看，无序状态的持续令人困惑，因为无序增加了不确定性，而且绝大多数参与人显然都是输家。如果从人类意识的背景中来理解，无序就并不那么令人困惑了。信念，不管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都是意识的中心。我们不仅看到经济社会是如何运行的，而且还对社会应该如何运行以及社会如何重建以更好地运行有规范性的见解。这样，意识能够导致一套信念的构筑，这套信念促使参与人相信与其继续维持被视为不断恶化的状况，不如起来革命。而在另一个极端，意识能够导致一套对一个社会“合法性”的信念的构筑。我们需要考察在什么条件之下信念被激发出来，从而产生秩序或者无序。

I

秩序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它也是建立和维持构成个人自由和产权基础的各种条件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而我们将个人自由和产权与一致同意或民主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不断改进我们对于秩序和无序的根源以及对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型的理解，对于理解经济变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104

秩序可以通过独裁统治来建立和维持，而无须被统治者的一致同意，秩序也可通过被统治者的一致同意来建立和维持。每种理想类型可描述如下：

当参与者发现给定他们对别人行动的预期，遵守统治者规定的成文或不成文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时，独裁政治秩序的存在最为理想。遵守秩序通常被归因于统治者强制力和社会规范的某种混合产物，以至于人们发现按照有利于现有社会秩序的方式行事符合自己的利益。体现社会规范的、与统治者政策一致的共同信念体系会减少强制力的使用；相反，不同的信念体系或者与统治者政策不一致的共同信念体系将会增加统治者对强制力的依赖。

当参与者发现给定他们对别人行动的预期，遵守要求相互尊重的成文或不成文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一致同意的政治秩序最为理想。遵守秩序通常被归因于社会规范的内在化，以至于人们发现按照有利于现有社会秩序和/或社会控制的方式行事符合自己的利益。而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或社会控制的实施是针对他人可能的社会偏离的。反映共同信念体系的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s）转化为公认合法的一套制度。^[2]一致同意的政治秩序要求处于均衡之中的所有社会成员都有遵守和实施规则的激励，并有足够数量的社会成员有动机惩罚潜在的偏离者。倘若：第一，同样的人参与同样的博弈并有同样的支付和风险；第二，有关未来的不确定性保持不变，那么规则就是有约束力的。^[3]

两种理想的秩序体系都具有下述特征：

1. 产生一套组织和建立一套权利和特权的制度矩阵；
2. 不仅在政治市场上而且在经济市场上稳定的交换关系结构；
3. 使国家受到一套能够保护组织和交换关系的政治规则及其实施制度的可信约束的潜在结构；
4. 作为规范内在化和强制实施的某种混合的结果的遵从性。

两种类型处于政治组织谱系相反的两端，而且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独裁统治可以而且确实形式多样，从约瑟夫·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到“新加坡”模式；一致同意的秩序也可以形式各异，从瑞士某些州的直接民主到成为墨西哥过去几十年政治秩序特征的事实上的一党统治。这一比较要强调的是：第一，秩序降低了不确定性，因此秩序本身具有某些被认为“有价值”（a good）的普遍特征；社会中的个人和集团通常有意识地优先接受独裁秩序而不是无序。第二，独裁和一致同意的统治趋向于在这一谱系的中间位置相互融合，这里强制和社会规范的某种混合是秩序的基础。当影响社会大众的决策不是由全体成员一致作出时，强制是一致同意政治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样，强制和力量就是两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差别在于在何种程度上决策者受到这一体系中的正式约束尤其是非正式约束的影响。

无序增加了不确定性，因为个人和组织的权利和特权很容易被攫取，

这就意味着政治和经济市场上现有交换关系的中断；而且随着规范的分崩离析和/或实施的变化，对秩序的遵守也消失了。在此我们将考察经济变迁中无序的起源，然后研究随着经济变迁，维持秩序稳定的条件。我们将通过比较美国和拉丁美洲经济史做到这一点，这将说明无序、随后向稳定秩序的恢复和紧随长期无序之后的革命。

II

无序可能产生于使规则的强制实施减少的变化，也可能产生于合作规范的弱化，这一弱化促使组织试图寻求博弈规则的根本改变。一种变化就是驱除能够提供社会中的可信承诺的旧机制而没有代之以适当的替代机制，例如（独裁）统治者的死亡，但这些事件通常反映了一种危机，寻求重大政治变迁的集团凭此可以造成政治力量的突然逆转。危机可以以几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祛除旧秩序。例如，经济危机限制了可分配的资源，这就促使某些以前的当权政府的支持者们反对它，从而破坏了支持这个当权政府的一致同意。

另一种变迁可能产生于一组增量的变化，这些增量的变化使某些个人和集团相信，与被视为威胁其生存的持续的增量变化相比，革命的风险更低。德·菲格雷多和温加斯特（De Figuerido and Weingast, 1999）总结了这一过程中的各个步骤，如下：

1. 一批政治企业家清楚地表达一套与现有秩序根本冲突的新信念，起初只有极少数人持有这些信念。

2. 这些政治企业家的对手按某种方式行事使得这些信念看起来是正确的，这样就证实了关键参与者眼中的革命信念。这样新观念的建议者无法直接控制的事件发生了，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这些信念的真实性。

3. 结果就是信念传播到某些关键决策者那里。当关键决策者接受了这些激进的新信念时，他们就为激进的行动提供了足够的政治支持。

III

秩序的长期维持以及社会采取激进变革之后秩序的迅速重建，使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与世界历史中的大多数社会区别开来。其中关键是建立非人格化交换制度，从而约束参与人并限制政治规则的制定。在过去的三个半世纪里，美国（正如现在这样）随着经济的变迁，包括从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革命和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内战中迅速恢复，一直维持着一个秩序体系。而且，这一时期发生的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中各个集团的收入和地位。在具有适应性效率的社会中（North, 1990b），制度矩阵的灵活性使其能够调整来解决与根本的经济变迁相关的问题。在面对经济变迁时，维持政治秩序的四个命题能为我们提供对于适应性效率的某些洞察。

第一个命题涉及有关政府合法性目的的共享信念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不管是个人的、经济的、宗教的、民事的还是政治的——都意味着对政治官员行为的限制。政治秩序的关键是建立对政治官员行为的可信限制。公民权利及其暗含的对政府的限制对于政治官员来说必须是自我实施的，即违背它们就会危及政治领导人的未来。社会共享信念体系的建立反映了与对政治官员行为的合法限制有关的社会规范的发展（通常历时弥久）。

108 第二个命题指出，成功的宪法部分地通过分派公民权利和对政府决策施加其他限制来限制政治冒险（the stakes of politics）。第三个命题宣称，产权和个人权利必须很好地界定，使得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个人能够心知肚明。第四个命题指出，国家必须提供尊重这些权利的可信承诺，以此提供保护，防止公共官员的机会主义和掠夺行为。

成为这些命题基础的是制度矩阵，这个制度矩阵不仅在正式规则中规定了这些条件，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坚守的社会规范将这些价值融入社会文化之中，加强了这一制度矩阵。因为这一社会的文化调节是

在几代人之间发生的，所以经历持续的无序状态的社会要建立稳定的一致同意的秩序就异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独裁秩序可能很受那个社会的成员的偏爱。

IV

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的特征是：殖民时代直到七年战争末期的相对稳定；接着发生不稳定直到 1781 年的革命；然后是秩序的重建和迅速的经济增长，直到被 1861 年到 1865 年的内战再次打断；接着是相对迅速的秩序重建和经济增长的复苏，此后经济持续增长。这一故事的主要轮廓可以根据前面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描绘出来。^[4]

18 世纪的不列颠帝国是由多级政府治理的，每级政府都有界定相对良好的权力范围。直到 1763 年七年战争末期，英国在北美的角色被限制于提供帝国范围的公共物品，特别是安全和国际贸易。与英国总督合作的殖民地会议对于地方公共物品、产权、宗教自由和契约实施拥有广泛的权力，当然，这些权力受到英国法律的某些约束。在单个美国殖民地内部，帝国制度对英国扮演的角色施加了相当多的限制。英国制度在帝国内部创造了共同市场，从而防止了单个殖民地提高贸易壁垒。

109

来自法国的普遍威胁将大西洋两边的这两个国家限制在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关系之中。因为双方彼此需要，所以它们能够建立和维持帝国联邦结构所固有的政治和经济自治体系。尽管每一方都可能存在欺骗的倾向，但两方都发现帝国的联邦结构十分方便。实际上，整个体系的贸易和安全问题与所有其他的殖民地内部的国内问题（比如宗教自由、税收、所有权和社会管制）之间的严格界限创造了一个可信的承诺机制。在这一体系中，一方的背离很容易被发觉。用用于一致同意的政治秩序的四个命题的话来说，帝国的联邦结构创造了一个天然的聚点解（focal solution），使得行动易于被每一方监视。

在 1763 年之前的一百多年里，英国开始接受地方的政治自由，以

此交换殖民地居民接受英国对帝国的控制，包括对殖民地居民的贸易限制。帝国制度和支持这些制度的共享信念体系结合在一起，支撑着大西洋两方的合作。1763年之后，英国在帝国政策上的多方面改变威胁着这一体系，其中两种变化最为关键：第一，尽管战争驱除了来自法国的威胁，但却消耗了巨大的财政资源，结果给英国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巨额债务。英国求助于殖民地作为部分债务融资。第二，法国的失败极大地改变了帝国。在法国失败之前，美国殖民地代表着帝国的主要部分。损害美国殖民地的任何事情都会同样损害帝国。七年战争之后，这就不是必然正确的了。在新的和更大的帝国里，英国无理由设计帝国通用的政策以治理这个体系，而这些政策可能就会损害其中的一个部分。加之殖民地对英国安全保护伞的需要减少，因此也没有更多的理由遵照英国的利益行事。

110 这些变化导致许多美国人得出结论认为，英国将不再遵守帝国的联邦主义原则。在一个新兴的激进集团内部，这一观点尤其强烈。这一集团指出，英国通过税收直接干预殖民地事务的先例意味着自由的终结，包括殖民地议会自治的终结，因此也包括殖民地珍视的所有东西的终结。随着这一先例的建立，这一集团继续宣称，英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其他政策。一开始，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些激进分子不太注意，他们有关自由的声音听起来也似乎不太真切。英国仍得提供许多理由，才会使人们相信它想要作出重大的政策改变。更进一步地，温和派和反对派都担心摆脱英国的统治只会更糟。但是一连串的英国政策，从1766年要求殖民地提供四分之一的英国军队到《1773年茶叶法案》，引起了殖民地内的强烈反应并为支持激进派提供了铁证。正如激进派一开始提出的那样，新的英国政策威胁了美国的自由。

简而言之，美国无序状态的突然出现体现了上面清晰表述的原则。法国的失败有助于驱除旧体系，从而导致了英国在帝国内部行为和政策的变化。作为反应，美国的激进派清楚地表达了一种起初处于美国人信念边缘的新观念，即英国的行动代表着自由的终结。在同英国人争论的早期，政治上非常关键的温和派并不同意激进派的话。然而，英国的行

动（在贝叶斯调整意义上）提供了有利于这些观念的证据，导致激进派赢得了关键的温和派的支持，到 1775 年，温和派在反对英国的革命上已转而支持激进派了。

革命之后秩序的重新出现从根本上依赖于殖民时期的传统。一套英国统治时期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博弈规则提供了殖民地的自治和经济领域良好界定的产权。在《联邦条例》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建立的时期争议不断，但是政治和经济规则稳定性的基础却从殖民地宪章中延续到独立时期。上面讨论的政治秩序的原则体现在宪法通过创立一个列举权力（enumerated powers）的复杂体系、一个分权体系和一个对国民政府施加显著限制的联邦主义体系来降低国家政治冒险的方式上。这一时期的争论提供了有关对全国性政府的限制、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和州自治（state autonomy）的新的共享信念。面对不断发展的共同市场，各州之间的竞争使各州有激励培育有利的经济氛围，而硬预算约束又大大地限制了各州补贴地方经济参与人的能力。早期美国的居民支持州和地方政府的自治，因此也支持对全国性政府的强有力的限制。普遍持有的信念体系与政治制度、产权和法律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非常有利于分散的（decentralized）竞争性市场的体系。当这一体系与这个国家传承下来的有利的要素禀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是快速的经济的发展。

政治僵局的崩溃导致的内战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可怕的中断。这一政治僵局通过南北之间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维持着联盟。实际上，随着这一政治僵局的崩溃，为双方提供可信承诺的机制消失了，因此就使南方各州确信脱离联邦是唯一可行的选择。^[5]南北战争是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战争之一，但就本章的主题而言，其显著特征却是异常的复苏。战争结束之后几年之内，北方的经济增长就恢复了，在世纪末之前，南方的经济增长也恢复了，尽管 1877 年重建的结束导致了非裔美国人的二等公民权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持久地存在。但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确接踵而至；不仅产生了贯穿那个世纪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且经由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也引人注目地改善了非裔美国人的状况。

111

112

成为美国经济特征的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结构是如下因素的结果：路径依赖（从英国统治继承下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利的要素禀赋（无边无际的富饶土地和资源、来自欧洲的劳动力移民和资本）、加强了那些支持正式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信念体系的贯穿 19 世纪的无数的有利事件（例如，19 世纪末期普遍发现了金矿，从而带来了农业几十年不尽如人意之后的繁荣）和好运（例如，反北部联邦同盟者对宪法惯例的联合抵制）。一个关键事实值得强调，英国制度的继承为非人格化交换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而非人格化交换制度正是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V

拉丁美洲的故事开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新大陆的征服。整个殖民、贸易和发展模式都适于为国王榨取贵金属。这是一个马德里统治下的独裁体系，既不存在自治，也不存在竞争性市场。国王授予被选中的商人排他性的垄断特权，贸易也被限制在整个南美的少数几个港口。西班牙重商主义结构的目的是将贵金属运到西班牙，而不是促进拉丁美洲的发展。这样的殖民类型和榨取型经济政策对独立之后的拉丁美洲有着深远的含义。

113

1807 年拿破仑囚禁了西班牙国王，这导致了重新界定殖民地对宗主国关系的努力，并在整个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各国引发了独立运动。西班牙军队的失败导致前殖民地分裂为新的共和国。许多共和国以美国宪法为蓝本作为用于独立的范例，但结果却截然不同。没有殖民地自治和良好界定的产权的传统，独立蜕变成各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对政治和经济控制权的激烈争夺。结果就是，俘获政权并将其用作所有市场上人格化交换的工具。在大多数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花了半个世纪才有一个集团通过竞争最终取胜。建立秩序本身就成为一个目标，这样，独裁政权就被创造出来并持久存在——“军事独裁统治”

(caudillismo) 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

殖民体系的灭亡产生了新建各州不能解决的新冲突。建立新的共和制度（受美国启示制定的宪法）的努力与旧秩序的政治基础相互冲突。在皇家体系之下，权利基于与国王的个人联系被授予个人和集团。结果就是大地产授予富裕的个人和教堂，权利和特权授予军人，以及一系列生产和贸易的地方垄断。宪令没有自治政府，人格化联系主导着政治和经济交易。而在独立体系之下，深远的政治冲突出现了，那些从皇家体系中继承了权利的人与共和制度及其伴随独立不断演化的组织产生了根本冲突。

对无序根源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对独立之后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前殖民地的理解。它们没有关于政府角色、国家、社团权利（corporate privilege）和公民权利的共享信念体系。然而，却有一套基于人格化交换的共同信念，这一共同信念促进了牢固的人格化联系，但却削弱了非人格化交换制度的构筑。对政府的合法目的和应该如何组织社会的一致意见的缺乏使得无法对国家施加限制。对基本政治结构未能达成一致与共享信念体系的缺乏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新建国家可信承诺的缺乏以及固有的政治不稳定性。

然而，固有的政治不稳定性并没有完全中断经济增长。在拉丁美洲，政治不稳定性既没产生经济崩溃，也没产生经济停滞，而是伴随着经济的低增长产生了持续的不稳定性、广泛的寻租、政治独裁主义、不利的收入分配和公共物品的无效率供给。例如，在墨西哥，垂直政治一体化由政府、资产持有者和一个第三方的联盟组成。这就可信地承诺了各个政党会维护协议。尽管第三方可能是外国，在墨西哥第三方却是个国内集团。这个集团的支持对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们也从资产持有者那里获得租金。结果就是没有对产权的普遍保护，只有对有关资产所有者的选择性保护。^[6]对墨西哥的这一解释不仅对拉丁美洲而且稍加变化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停止所有的增长不符合政治上主导集团的利益，因为这样做会使收入源泉枯竭，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曼库·奥尔森（Mancur Olson）描述的常驻匪帮模型

就是这样一个其中的常驻匪帮在不没收资产持有者的所有净收入上拥有基本利益的模型 (MaGuire and Olson, 1996)。

在独立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历史差异仍为两者对比鲜明的绩效提供了根本基础。美国保留了联邦主义、民主、有限政府和繁荣市场的强健体系。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仍以走走停停的发展、脆弱的民主制度、可疑的公民权利基础、人格化交换和被垄断的市场为特征。^[7]对比鲜明的绩效部分可以用新古典经济学标准的要素禀赋分析来解释。禀赋显然是欧洲殖民类型的驱动力。但是，要素禀赋的论证需要下列因素的强有力结果的根本补充：殖民传统的路径依赖结果、奴隶制和监护征赋体系，以及作为两个多世纪经济和制度力量融合结果的对比鲜明的制度演化。这些对比鲜明的制度类型的根源在于每一情形中关键参与人的根本信念。英国信念体系的演化将在第 10 章中考察。这一信念体系延续到美国殖民地，提供了不断演化的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的基本源泉。相比之下，成为西班牙国王制定的制度的基础的信念却引发了两个世纪的不稳定、动乱、非人格化交换和有限政府。

秩序和无序植根于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演化的制度结构之中。尽管在持续变化的世界中危机总是困扰着每个社会，并常常给社会带来无序，那些具有稳定的制度传统的社会要比没有这一传统的社会恢复得更快。

第9章 正确理解和误解



当人类理解了他们的信念所反映的环境，并且构筑了能实现他们意愿目标的制度框架时，在这些参与人的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目标和意愿的结果之间就存在着一致性。我们可以将过去几个世纪平均寿命和物质福祉的巨大提高想象为反映了这种一致性。但是，这种改善是个不断试错的变迁过程，带有大量的错误和无穷尽的失败者，也无法保证我们仍将继续正确理解，尽管在过去若干个世纪里，知识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实际上，人类历史就是人类在面临无处不

116



在的不确定性时容易犯错的令人警醒的证明书。从前面几章来看，原因应该一目了然。我们不断地以新的方式改变环境（当然还有非人为的改变），但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我们正确地理解环境中的变化，发展适当的制度，以及执行政策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对动态背景下正确“理解”的严格条件的审视应该可以解释为何如此。

在时间进程中“正确理解”意思是说，我们正确地理解了人类环境中的变化，将这些理解融入我们的信念体系之中，进而改变制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

1. 异常变化的含义应在它对变迁的三种基本源泉——人口统计、知识存量和制度——的影响和随之发生的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加以理解；

2. 新知识被融入到能够改变制度矩阵的信念体系之中；

3. 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和实施特征被相应地改变，并将产生意愿的社会绩效的变化。

麻烦的是对这一背景中的两个问题我们知之甚少：人类在面对强烈的不确定性时如何决策，以及人类如何学习。这是第3章和第4章的主题。这里我想详细阐述我们曾经倾向于——或正在倾向于，或将要倾向于——弄错的人类决策的三个关键点。前两个涉及宏观水平的变迁过程：在面对实在异常的情形时社会如何演化，以及为最好地应对这一情形，社会应该具备何种信念。第三个涉及更加微观层次的变迁过程：在技术、组织和外部环境不断改变的背景下，要素和产品市场必须作何调整以维持经济效率。

I

当过去积累的经验和信念没有为未来决策提供正确的指导时，我们倾向于弄错。在我们信念体系——通过它新证据被过滤——中不断演化的心智模型、范畴和神经网络的分类构成的集合没有可以正确评估新证

据的现有模式。而且在相互冲突的信念不断演化的情形中，占优势的组织（和它们的企业家）可能将必要的变革看作对它们生存的威胁。就这些组织的企业家控制决策而言，他们能够阻碍必要的变革。这些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产生于我们没有正确地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二个因素产生于缺乏进行必要的制度调整的能力。

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当今世界，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产生的恰是这样的绊脚石。人格化交换依赖于互惠、重复交易以及倾向于从发达的互惠关系中演化而来的非正式规范之类的东西。非人格化交换则要求发展经济和政治制度以改变交换中的支付，回报合作行为。要建立必要的制度就要求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改变，给定参与人来自历史的信念和制度，这种根本改变通常不在可行集之内。西方世界从10世纪的相对落后到18世纪的世界霸权的独一无二的发展，让我们瞥见了使得这一变革成为可能的历史演化的本质。很多研究都考察了这些制度在西方世界兴起过程中的演化（例如，Milgrom et al., 1990; Greif, 1993 and forthcoming a）。成功的演化需要经济制度的激进变革以使远距离和非人格化的贸易得以进行。格雷夫考察了前现代欧洲推动这一转换的过程的中间步骤：在社区责任制中，有关社会结构的共同知识可以利用社区内人格化的契约实施来支撑社区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换（Greif, forthcoming b）。

118

经济制度最终必须要由政治制度来加强。社区责任制（Greif forthcoming b）通过鼓励远距离贸易和社区规模的增长给经济体系施加了压力，同时鼓励国家介入以提供契约的法律实施。但是事实上，建立和实施必要的法律体系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必然发生的事情。诺思和温加斯特（1989）在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的案例中考察了这一过程。他们详细阐述了君主独裁权力的缩减和议会的发展——代议制政府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一步。对这一转换最细致、最发人深思的研究是由格雷夫（1994b）做出的。他比较了热那亚商人不断演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结构——这一结构最终提供了适于非人格化交换的基本制度——和马格里布商人（处于穆斯林文化中的犹太商人）的实践——他们未能做出必要



的制度调整，因而在地中海贸易竞争中失败了。

119 政治制度建立和实施有效的法律体系，使得契约的低成本实施成为可能，但是，政治制度在现代世界中的广泛失灵清楚地表明，在理解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过程上，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拉丁美洲的经历充满了导致军事专政不断出现的不稳定政治制度的实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权是最近几十年大多数年份里人均收入下降的灾难性源泉。

前面章节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查明不能迅速地从人格化交换转化为非人格化交换的根源：

1. 从我们作为狩猎/采集者的三百万年中演化而来的基因结构经过了调整，以适应于小集团互动的世界。这个世界使我们倾向于从事小规模的合作行为——这正是我们在不利的物理环境中生存所必需的氏族、部落和其他小集团互动的特征。这一基因结构的确使我们对人格化交换做好了准备。但是，它没有使我们对非人格化交换的世界做好准备。实际上，“背叛”是“自然的”反应。

2. 克服这一自然的反应，也就是背叛，需要心智构造的发展。这一心智构造要能够设想非人格化交换有利可图的世界中的结果。这样的异常情形需要逐渐地“灌输”进日益非人格化的关系中，以使参与者意识到和接受适当的制度。

3. 但是，意识到适当的经济制度和组织——诸如汇票、银行、公司结构、企业和涉及远距离贸易的各种经济制度——的可行性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发展非人格化实施机制，以提供非人格化交换中协议的有效实施。最终，这要求作为强制权威的源泉的国家的发展。

120 4. 拥有（以较低的成本）实施产权的强制力的国家的建立导致国家有能力利用这一强制力去剥削公民，正如麦迪逊很久之前提醒我们的那样。应该建立强大但有限的政体，完全理解这一问题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我们在理解这一问题上已取得了进展。但一个事实是清楚的：这样的国家不能一夜之间建立。它需要能够巩固正式规则的有效非正式行为规范的发展。

II

西方世界从人格化交换的简单世界逐渐演化到成为当今发达经济特征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世界。直到我们可以流利地谈论全球经济的今天，经济史学家才根据市场规模的增长来描述这一演化过程。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在经验上着眼于信息网络的社会学家描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信息交流结构，该结构为了在现代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中有效地利用知识而将分散的知识聚集在一起。随着西方世界的演化，变迁过程是一度非常广泛的价格体系的逐渐扩展过程，政治规则和管制——它们只是偶尔被有意制定以更有效率地整合知识——的逐渐增加补充、互补、有时阻碍了这一过程。为了找出相互联系以使市场运行得更有效率（下一部分的主题），西方世界经过了很长的酝酿期，尽管市场运行还远远谈不上理想。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更加令人畏缩的任务。为了在来自发达世界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它们必须精心构造有效的价格体系，并通过建立能够以较低成本整合知识的制度和组织来补充它。以标准经济理论作为指导毫无用处。这就意味着，来自发展中经济的某个人一旦学到了比如先进的化学知识，他将会要求与这种知识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稀缺性相当的工资，因此也就自动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激励。事实上，在发达国家，这个人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只有当那一特殊知识能与其他互补性的知识以较低的成本加以整合的时候，那一特殊知识才是有价值的。

有效整合分散知识所必需的内部联络需要的远远不止一个有效的价格体系，尽管有效的价格体系是基本的先决条件。基本公共物品、不对称信息和无处不在的外部性要求建立制度和组织来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整合分散的知识。关于这条道路的各个步骤我们仍未完全了解^[1]，但它们可以被描述如下：

1. 在独裁世界中，个人必须成为杂家（jacks of all trades）。生存

依赖于学到知识以应付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各种各样问题。在这一背景中，专业化的增加将以生存所必需的多样性的降低为代价。

2. 随着市场的发展，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个人交换不断增加的专业化知识要以更少的“通用”知识为代价。通用知识的损失必须由贸易补偿。

3. 只有当由于专业化而导致的不确定性的增加被由于可以获得更广泛的多样化的知识而导致的不确定性的降低所补偿且有余时，贸易才会使个人境况改善。

4. 不确定性的降低并不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它需要低成本的跨市场交易。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必须使得新用户不必拥有详细的专门知识。我们不指望汽车的购买者成为技工或工程师，也不指望计算机用户成为计算机程序员。担保、保证和商标只是广泛的制度和组织的例证，这些制度和组织能使从事专业化的个人进入其他消费市场，以在专业化世界中实现潜在的节约。

5. 对生产者来说，为了整合生产知识，更加复杂的结构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信息网络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19世纪德国在化学工业中开创性地将科学原理应用于技术。但正是在美国，这种融合在大学中得到发展，这始于188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首次开设的化学工程课程。化学知识与工程原理的结合产生了革命性的发展。^[2]今天的美国大学在每一发展领域都处于理论知识和应用知识革命性整合的中心。硅谷只是这种整合成果的一个例证，但却是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证。在这一整合中，发达世界的其他部分落后了；而在不发达世界中，建立必要的制度和组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III

持有自由主义信念的经济学家一段时间以来在某种错觉之下辛勤耕耘。这种错觉就是：存在某种叫做自由放任的东西；一旦“有效率”的

产权和法制就位，经济就会运行良好而无须进一步调整。2001年至2002年，涉及安然（Enron）、迪奈基（Dynergy）、世界通信（WorldCom）和其他公司的丑闻应该可以使这种错觉寿终正寝。事实上，不仅在某一时刻（at a moment of time）必须组织要素和产品市场，使得参与人通过价格和质量（而不是相互残杀或者从事其他反社会行动）竞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over time），维持市场效率的条件也将随着技术、人力资本、市场状况和信息成本的变化而变化。每个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以一种结构为特征，该结构规定了参与人能够从事投机从而影响投机收益性的边际。交易成本——这里指度量和实施成本——在每种情形下都会发生变化；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就必须有一个制度结构为参与人提供在那些边际上竞争的激励，并且提供对社会而言具有生产性的那些边际本身。典型地，这就需要一套正式约束（通常是法律、规则和管制的混合）和非正式约束，以产生意愿的结果。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否弄清与在某一时刻创造“有效率”市场相关的问题，然后看看能否弄清随着时间的流逝，维持有效率的市场的条件的变化这一问题。首先，在某一时刻：

123

1. 尽管在每一市场上参与人的效用函数不同，我们仍然假设收入和福利最大化（加上通常的有关不确定世界里的决策的防止误解的说明）将指导参与人的选择，给定技术状态和竞争状况施加给参与人的约束。但是，这两个变量的结合产生了诸多参与人据此能够而且即将行动的边际。我们寻求的是在每种要素和产品市场上，哪一套激励和负激励将为参与人提供正确的诱因。

2. 每个市场的绩效特征就是正式规则和修改、限制甚至否定正式规则的非正式行为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市场上的交易成本都反映了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结合。即使产权被良好地界定，度量和实施也是不完善的，因为产权提供一般规则而不是“迎合”每个市场的明确特征。

3. 其他用于各个市场的特定规则将由政府制定，而政府几乎肯定不是一个无私的政党。政治市场的结构将决定在塑造治理各个市场的其

他规则中，谁的声音被“听见”。

4. 即使政府政策的表面目标是经济效率，政府参与人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头脑来实现这一目标也不是显而易见的。

5. 实施将由参与人，不管是管制机构还是法院，采用自己的议程进行。

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各个要素和产品市场要求不同的特定约束以便为参与人提供恰当的激励，而且经济变迁也要求制度结构不断变化，以维持效率。对资本市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不管资本市场在某一时刻多么好地促进了增长，在另一时刻也可能成为增长的阻碍；并且无法保证资本市场会随着经济演化而自动地演化。市场结构决定了参与人的激励；随着上述条件的变化，在时间 t 促使参与人创造有效资本市场的激励可能在时间 $t+1$ 促使参与人从事破坏、削弱或者实际上毁灭资本市场的活动，结果对整个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史就是个经典实例：最初激起突飞猛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的资本市场只是发展了随后的硬化症（sclerosis）。资本市场如此，动态变迁世界中的其他市场也是如此。

问题非常复杂，因为对不断变化环境的成功的适应性调整需要改变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的改变通常需要经由政体制定新规则。就参与人（也就是，经济组织中的企业家）认识到适应性调整的需要来说，他们或许能够单独作出必要的调整。类似这样的自发调整似乎成为美国汽车、钢铁和软件企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针对日本竞争所作的成功的适应性调整的标志，进而导致了美国企业在 90 年代成功的组织创新。但是当变迁涉及政体及其对新规则的制定时，适应性调整就很难。对于那些认为他们将受到规则变化的不利影响的人来说，政体变成了战场。例如，在日本资本市场上，政体特别是金融委员会没有能力重构资本市场是硬化症的直接源泉。但是，历史充满了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未能改变规则的例证。曼库·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国家兴衰探源》（*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研究了缺乏“革命性制度变迁”时，市场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僵化的固有趋势。

新古典经济学家通常能够理解制度是重要的，以及产权基础和法制是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那是他们认知中的一个巨大改进，加之他们认识到宏观稳定性的重要性，这就渐渐改进了国际组织和经济顾问们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在我们生存的动态世界中显然是不充分的。很少有证据表明，随着特定的有效率市场根本特征的改变，这些顾问和国际组织已经正确地认识到制度变迁的需要了。资本市场似乎对随着经济演化需要不断地改变这一点最为敏感，经济危机的历史也充满了金融市场在这些事件中的关键角色的故事。然而，几乎没有对动态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所必需的制度调整的系统研究^[3]；对其他要素和产品市场的系统研究也同样缺乏。

长期未能改善个别的要素和产品市场能够而且已经导致总体增长率的下降以及实际上的经济停滞。我们已经考察了日本；1940年之后阿根廷农产品出口市场的毁灭导致了阿根廷经济40年的相对下降。那些与随着时间的流逝维持有效率的的市场有关的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指出的：

1. 市场绩效特征的改变要求对这一变化的（各个）源泉的初始理解；
2. 为改进市场绩效而设计的“成功的”改变需要有关总体变迁过程的正确理论；
3. 应用这一正确理论需要关键参与人（能够改变市场结构的企业家）拥有这样的理论，并愿意而且能够据此行动；
4. 在这些改变必须由政体颁布法令推行变革的地方，制定这样的政治政策存在另外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现有的制度结构会产生与其利害攸关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会试图阻碍变迁。

IV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静态的，因此就倾向于蒙蔽从这一理论中汲取灵感的政策制定者。结果就导致了太过频繁的政策处方，进而产生了与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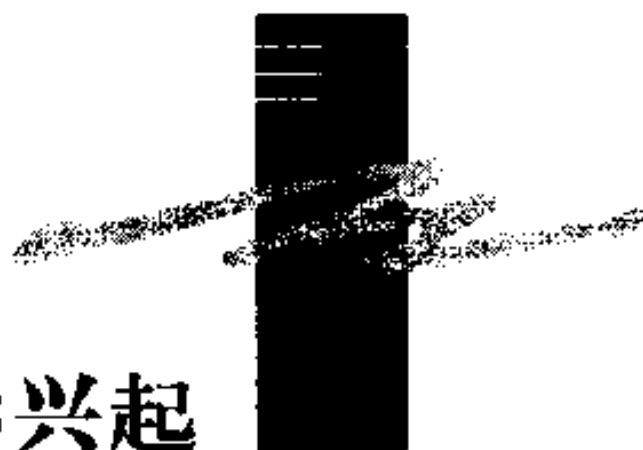
的相悖的结果，因为从静态理论中衍生的政策在动态背景中将会产生未曾预料到的（同时令人不快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本研究中没有提出有关变迁的动态理论，我希望读者同样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哪种可能有用的理论会逐渐形成。尽管演化博弈理论可以抓住特定变迁的某些有趣要素，但是难以就此得出一般理论，因而毫无价值。然而，详细说明为什么这样的一般理论是不可能的，应该可以为我们采用更受限制但更易处理的方法来处理动态变迁做好准备。这一方法的基础在前面的章节里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过。特别地：

1. 把可能由物理环境改变导致的变迁搁置不谈，人类环境中的变迁广泛反映了制度的变迁，这是第5章结论部分的主题。那些能够在制度环境中激发变革的组织中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企业家的根本信念将成为人类环境变迁的源泉。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蛮好。

2. 但是下一步就更困难了。这样的初始变迁可能改变了认识到的互补性或替代性组织的机会成本。我们将不得不详细解释对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制度矩阵的理解，以洞悉其中的联系。我们也将不得不了解受影响的组织的新的机会成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理解市场结构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特征，以便对初始变迁的间接结果（secondary consequences）熟稔于心上没有贡献什么。例如，如果某个商业企业倡议的法律变革会对工会的生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工会在阻碍、防止或废除这一行动中的有效政治“权力”。理解政体结构对于预测结果是绝对必要的。

3. 我们要意识到现有的制度矩阵并且对其内部联系熟稔于心，就必须拥有比当前更详尽的有关某个经济的制度矩阵的知识。由社会学家从事的信息网络分析尽管本身不是理论性的，但却在更好地理解那一矩阵上迈了一大步。一旦我们采取了那样的研究，我们就能察觉受影响组织的机会成本的改变，并在制定政策时考虑这一信息。这样的研究几乎不可能恰当地处理动态变迁问题；但这的确使我们对我们必须处理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10章 西方世界的兴起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指 10 世纪到 18 世纪之间西方世界由相对落后的地区成为世界霸主的历史进程。^[1]其中既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变革，也包括制度变迁中心的转变——即从处理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转到处理日益复杂的人类环境的不确定性。到 18 世纪，科学及其在解决经济稀缺和人类福祉问题上的系统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是，这已为下两个世纪的革命性发展奠定了基础。本章主要利用这个基础来说明社会变迁的全过程。以下这些重要问题在其他章

127

节都讨论过，诸如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分散知识的整合，以及在设计有效市场的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这里，我们集中研究信念、制度和其他因素（诸如地理、军事技术和影响变迁过程的演化着的竞争条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与其他章节相比，本章有必要进行更为详尽的描述。

I

既然历史是关于过去的选择如何影响今天的决策的，那么任何出发点都不仅是随意的，而且是对历史连续性的破坏。因此，如果我们从10世纪的西北欧开始讲述我们的故事，那么我们只能在历史长河中瞥见一鳞半爪。

128 罗马帝国于公元5世纪的混乱中灭亡；大约一千年后，即1500年，一个或多或少有点随意的历史编年表标记了封建主义的终结。在此期间，西欧逐渐从继罗马秩序解体和日耳曼部落对西欧侵略之后的无政府状态中摆脱出来，形成了政治和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演化主要受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影响（尤其在南欧），希腊—罗马文化遗产改变并最终塑造了在6世纪到10世纪期间出现的许多制度安排。封建领主的庄园似乎是从古罗马时代的庄园住宅直接演变而来的，而处于依附状态的殖民地居民则似乎是封建社会农奴的前身。奴隶制也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罗马法保留了下来，而秩序逐渐形成的地区则为产权形成提供了基础。

教会使古典社会的文化遗产保留至中世纪。教会是罕见的知识宝库——实际上，修道院往往是中世纪欧洲最有效率的耕作中心。如果教会通过拯救人们的灵魂换回财富和土地，从而成为物质财富的主要拥有者，那么，禁欲主义、隐士生活和虔诚的修道士也是教会的特征。最重要的是，教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信念结构，一种可供参照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它们塑造了中世纪世界的感知。这种共同的参照结构成为这些感

知继续演化的基础。这些感知将指引我们做出选择，从而塑造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西北欧与地中海沿岸（希腊—罗马文明的所在地）在地理环境上有很大差异。后者的特点在于：轻微的和/或季节性降雨、砂土、从葡萄和油橄榄树栽培到谷物种植的多样的农业；前者的特点则是：丰富的降雨、茂密的丛林以及难耕的土地（适于牲畜生长，而且随着耕犁的适当改进，也适于谷物生产）。这些气候和地理的特征决定了西北欧的农业经济结构。

西北欧 10 世纪时生活的制度、智力和地理背景必须置于最基本的初期组织环境——缺乏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下加以考察。与只存在五百年的小规模的政治单位相比，罗马帝国的瓦解预示着更多东西。大规模政治经济组织的任何优势在随后的时代都不存在或者是微不足道的。1453 年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建立在对新宗教顶礼膜拜基础之上的穆斯林世界创建了势力遍布北非并扩展至欧洲的新帝国。但是，上述这些例外和短命的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都没有驳斥关键的一点，即有可能由一个帝国来统治地中海地区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

维金人（Viking）、马扎尔人（Magyar）、穆斯林人从三面夹击侵掠了西欧。维金人于 786 年袭击了英国海岸，795 年和 799 年又分别袭击了爱尔兰和高卢。伦敦于 841 年遭到洗劫；维金人的航船溯河而上侵袭了法国北部的鲁昂和南部的图卢兹等不同的城镇。915 年马扎尔人突袭了不来梅，并于 937 年向西打到奥尔良。西欧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坚固的防御工事、重骑兵（heavily armoured knight）和封建主义的等级的、分权的结构。结果，各方在军事上陷入了僵局。城堡很难被入侵者所攻破，除了那些得到充分资金支持且坚持不懈的侵略者，因为他们能够长期围困城堡，以至于能饿死城堡中的居民。战斗主要发生在重型装甲兵之间，一般规模较小。885 年维金人在围攻巴黎时被击退，995 年马扎尔人在奥格斯堡附近被击败。结果，地方秩序得到复兴，庄园（拓荒而来）得到了扩张，城镇得到了增长。正是在这些最初的情况下，政

治、经济和军事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条件，这些条件导致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130 经济活动都在庄园里（也有例外）和城镇里进行。庄园土地分为三部分：领主的领地、农民拥有的土地和公有地。大多数农民作为提供劳役（每周两三天）的农奴被束缚在庄园上，而且归属于拥有庄园的领主。他们受制于领主的司法权，只能在领主法庭上寻求正义，因而他们的活动和经济交易都受到限制（Preirte-Orton, 1960, 424—425）。传统的庄园组织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激励。孤立的庄园限制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当技术发展时也减慢了技术的扩散。庄园习俗中（蕴含）的激励几乎不能促进技能和知识的快速增长或技术变迁。虽然以马代替牛耕种主要出现在9世纪之后并且进展缓慢，但是带轮子、犁壁和犁刀的重型犁、马挽具和钉马掌的确出现了（Mokyr, 1990, chapter 3）。同样的，谷物轮作的二圃制也逐渐被三圃制所取代。但是，人口至少从10世纪就开始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维金人和马扎尔人停止入侵之后，秩序得到了相对的改善。这一人口的增长——和随后的人口下降——在庄园组织的变迁中起了主要的作用。

广大地区秩序的重建和改善导致了快速的经济和政治变革，而演化着的城镇是这一变革的中心。无论是南部和中部意大利的众多城邦共和国，还是低地国家的城市中心，都是动态变革的起源地，这些动态变革起因于地中海与斯克尔特河（Scheldt）和默兹河（Meuse）流域的贸易机会的增加，以及它们与南欧以及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地区的紧密交往。

在1300年前，贸易主要由旅行商人来进行。旅行商人常常组成团体以相互保护；一些团体甚至要求成员在商队中必须武装自己，这说明和平与秩序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旅行商人和集市的重要性在1300年后开始下降（De Rover, 1965）。贸易的增长促进了城镇的扩张，并且商人定居下来进一步加速了城镇的发展。地理条件的约束和陆地运输的高成本使得城市出现在海湾的突出部（如布鲁日）、一条路和一条河的相交处（如马斯垂特（Maestricht））、两条河交汇处的附近地

区（如根特（Ghent））和运输的中转站（如布鲁塞尔）。

II

西北欧在 10 世纪到 16 世纪之间经历了无休止的各种规模的战争，131
从地方的贵族冲突到百年战争之中的大规模战斗。这一时期也是人口数量急剧变化的时期，人口从 10 世纪增长到 14 世纪，然后在 14 世纪早期开始下降，这一下降趋势持续了大约 150 年才得以扭转。

军事技术的变革不仅促进了战争性质的深刻变化，也大大改变了政治单位的有效规模（Bean, 1973）。由于训练军队的成本和进攻与防守的装备成本都在增长，因此战争花费更加巨大。不管最终是雇用了具有危险性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军，还是如法国查理七世创立的职业常备军，如今政治单位要生存下去需要更多的税收，仅靠统治者从传统封建来源获得的税收是不够的。然而，如果统治者的财政需要增加，那么创造额外税收的潜在资源也会增加。在较大规模的地区建立秩序引起了意义深远的人口变化、贸易增长、市场扩张和货币经济的普遍发展。

14 世纪，由于出现了淋巴腺鼠疫和肺炎，城市人口数量急速下降。这直接导致了贸易和商业数量的绝对下降，可供国王征收和攫取的税收也绝对下降。但是，商业数量的下降并不等同于人口数量的下降。规则和法律的基本制度结构依然存在，并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当人口数量出现反弹时，这种框架将成为增长的基础。人口数量的下降对耕作组织有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它使土地/劳力的比率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劳动力稀缺问题，促使地主间的竞争加剧，最终改变了庄园组织和农业组织。

解决统治者财政困难所必需的税收主要来自于：充公（confiscate），借款（尤其是向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或统治者向经济群体提供服务以换取税收。这些方法在历史上都被尝试过。充公无疑是杀鸡取卵。最终王室拒绝支付债务，佛罗伦萨（和其他地方）的银行家们就遭受破产的命运——但是，在君主们通过借款进行耗资巨大的战争之前，132

一些银行家已经从王权垄断中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也从统治者身上获得了其他好处。第三种方法，即提供服务——尤其是产权的授予和实施——以换取税收，引起了一系列广泛的结构变化，从保护外国商人，到合并行会规则和商法使之成为国家强制实施的法律，到建立（英国的）国会（Parliament）、（法国的）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和（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议会（Cortes）。

III

这些军事、人口/经济变迁对制度和组织变迁影响深远。农业已远离具有依附性劳动力的自给自足的庄园，走向了市场化，地主和农民已经很少被习俗性的权利和义务绑定在一起，而是更多地受一种不断演化的产权结构的制约。

一些城镇和城市位于扩大的国内和国际贸易区之内，大量制度的和组织的创新使它们的发展成为可能。汇票的演化与流通技术和贴现技术的发展需要贸易中心的发展，如香槟集市（Champagne fair）和其他的集市、银行和专门从事贴现业务的金融机构。海上保险（marine insurance）的演化过程是这样的：由为保险人的损失支付部分赔款的零星的个人合约发展到由专业保险公司提供的标准的印刷合约。海上保险是分散风险的一种方式，商业组织是另一种方式，它可以使投资多样化，也可以汇总大量投资人的投资，诸如：康孟达组织（commenda）、受监管的公司和股份公司（North, 1991）。实现行会商人兄弟般秩序的行为规则，由违背即开除（ostracism）的威胁强制实施，这似乎是合约实施机制的开端。这些准则演化成了商法并在欧洲贸易区传播开来；它们逐渐与普通法和罗马法相融合，最终由国家来实施（Milgrom et al., 1990）。

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政体的演化使经济制度结构的建立成为可能，它最终也为法律及其实施提供了一个框架。这样一个框架对于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非人格化交换来说是一种基本的要求。发展就是（某

些)政体从勒索转为提供“保护和正义”以换取税收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发展的最初动力是不顾一切地寻求额外的税收;但是,如上所述,获取税收可以采取几种形式——一种是充公或者拒绝偿还债务;另一种是建立并实施产权以换取税收。

统治者在面临财政危机时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导致了根本不同的结果,但它们也无一例外地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不管是在荷兰的经济增长还是在西班牙的经济停滞的情况之下。

为了理解荷兰的成功,我们必须回顾低地国家的繁华城镇(如布鲁日、根特、里兹)的演化过程、它们的内部冲突以及它们与勃艮第人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间的关系。这些城镇的繁荣,不论是建立在羊毛织品贸易还是建立在金属贸易的基础上,在早期都有利于以城市为中心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区域形成,这些区域在乡村社会占据压倒性地位的时期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城镇的内部冲突反映了贵族和同业公会之间正在形成的紧张局势,还反映了他们在努力创建地方垄断过程中的持续冲突。成功的地方垄断会使生产率的真正源泉枯竭,而这些源泉正是这些城镇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勃艮第统治的全部影响就是阻止了限制贸易的行为。1463年“好人菲利普”(Philip the Good)建立了一种代议制机构——全国性议会,它能够制定法律,也有权投票支持统治者征税。这种议会鼓励贸易和商业的增长。勃艮第家族的统治者(和后来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不顾强烈的反对,积极取消行会的垄断特权和贸易限制,诸如布鲁日和根特等纺织城镇中的贸易限制。由于法规和产权中的良好激励的作用,新兴工业中心不断涌现出来,统治者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低地国家的繁荣带来了大量的税收,勃艮第家族和哈布斯堡王朝从中大为受益,因此,低地国家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颗明珠。后来,菲利普二世对该地区日益苛刻的征税,导致了叛乱、安特卫普的陷落、北方七省的成功独立以及阿姆斯特丹成为商业霸主。也正是荷兰,特别是阿姆斯特丹,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地。

134

让我们比较一下荷兰和西班牙经济增长的简史。费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统一了卡斯蒂尔和阿拉贡,建立了

一个民族国家，结束了和摩尔人几个世纪的战争以及封建贵族之间无休止的内战。1516年查理五世继位，西班牙成为欧洲霸主的伟大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米兰尤其是低地国家的税收也日益增加。查理五世维持一支欧洲规模最大和装备最精良的军队所需的军费不断增长，因此抵消了不断增加的税收。然而，为了维持和扩张帝国，所需的费用更多；当低地国家发动叛乱反对查理五世的继承者菲利普二世时，帝国不仅失去了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且，与七省作战又增加了额外的开支。从新大陆获得的财富的减少进一步加深了财政危机。国家不顾一切地寻求税收，导致了出售地方垄断权、充公、更高的税率。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到，贸易和商业的衰退以及无数次国家财政的破产。

135 这些对比鲜明的经济增长和衰退的故事，经过适当但通常微小的修改，无数次重现在历史和现代世界中。当经济为从事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活动（如荷兰人所做的）提供制度激励的时候，就会产生经济增长。当对经济的集中政治控制和垄断特权使得从事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活动的激励不足时，就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失败的事例大大超过经济成功的事例。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特例，而经济停滞和衰退成为普遍的情况，这反映了人类组织失灵的持久趋势。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指导人类选择和行动的信念的演化过程。

IV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新教——尤其是卡尔文教派（Calvinism）——伦理中所蕴涵的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到底是怎样的因果关系呢？我们怎么知道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来自于其他的源头呢（Tawney, 1926）？韦伯把宗教与价值观联系起来，然后又把价值观与经济行为联

系起来；但是他并没有论证，随后的行为怎样使得能产生不断的经济增长的特定制度和组织出现（Coleman, 1990, 6）。而且，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Counter-Reformation Catholicism）同样鼓励个人主义和节制，而韦伯把这些都归于新教名下。

考虑特定制度的和组织的结构演化和行为信念之间的关系是有用的，因为这样可以为这种演化提供一种解释。学者们一直认为个人主义的行为信念适合经济增长。在引起广泛争议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一书中，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认为，英国个人主义起源于13世纪或者更早。此书描述了一系列对家庭、工作组织和乡村社区的社会结构拥有的不断变化的、个人主义导向的态度。这些态度体现在处理财产继承和妇女法律地位的一系列正式规则中。阿夫纳·格雷夫（1989, 1994a）对比研究了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后者具有伊斯兰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特征，活跃在11到12世纪地中海贸易中。格雷夫发现，这两个社会商业组织结构的系统性差异起源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行为信念的不同。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商人逐渐形成了群体内部的社会沟通网络来实施集体行动。这种社会沟通网络在相对较小的同种族群体中是有效的，但是它们不适宜于进行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不同种族商人的增加所引起的非人格化交换。相反，热那亚商人形成了双边实施机制，这必须建立正式的法律和政治组织，以监督协议的实施——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制度/组织路径，它允许并导致了更复杂的贸易和交换。格雷夫指出，对于拉丁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来说，这些信念结构的差异具有一般性；然后他把欧洲的这种信念结构与第三部分所述的经济制度和组织的发展联系起来。

136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在不同社会中有不同的行为信念，不同的行为信念导致了不同形式的制度和组织，那么信念是怎么产生的呢？在第4章中，我提出，既然宗教是前现代世界居主导地位的、有组织的信念结构，那么体现在宗教中的人口/资源约束可能就是信念的来源。大量文献研究了宗教教义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但是，得出的结论是非决定性的，因为文献可以从几乎任何宗教中挑出不利于经济增长

的特定方面，其中的一些例子有，伊斯兰教反对保险市场，基督教反对利息支付（Koran, 1986）。

137 然而，研究中心不应集中在特定的规范上，而应集中在特定的信念结构（例如宗教）由此形成的学习过程上。简而言之，学习过程是这样一种方式：个体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经验，一个既定的信念结构过滤来自于这些经验的信息。因而，一个人可以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为学习过程提供了有利的过滤，而正是学习过程导致了有助于经济增长的适应性调整；或者也可以认为，中世纪西方世界的特定地理/经济/制度背景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产生了随后的适应性调整。实际上，正是两组经验的结合产生了信念结构中的适应性调整，进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政治/公民的自由。基督教教义中蕴含的信念结构，总体来说按照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演化，尽管还有一些相反的论证。厄恩斯特·本克斯（Ernst Benx, 1966）和林恩·怀特（Lynn White, 1978）都主张，基督教信念逐渐演化出这样一种观点：自然应该为人类服务，因此宇宙能够也应该为了经济的目的而被控制。这一观点是技术进步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是，正是中世纪/早期的现代欧洲部分地区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条件提供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对于形成这种观点起着催化的作用。从这个视角来说，韦伯的新教伦理是这种适应性调整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不是最初起源。

V

现在，我们准备探索西方世界独特的演化过程的奥秘。但在我们理解的和要解决的问题之间还有些差距。而且，一个完整的图景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的成本：经济增长中有很多失败者，在变革的过程中他们的状况不断恶化。但是总的来说，人类的物质条件，以及公民、政治、宗教和经济活动中的人身财产安全都得到了改善。

把社会中制度/组织结构置于研究的中心，我们就能够在变革的背

景中探索经济和政治组织的相互作用，变革由参与人感知的变化或外部力量所引起。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发展的失败为我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集中的政治控制限制了选择，其他可供替代的选择只能在有关政治经济决策的长期后果的不确定性中寻找。大规模政治经济秩序的缺失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人类自由的环境。在分散、竞争的环境中，发现了多种可替代的方法：一些成功了，如荷兰和英国；一些失败了，如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有一些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如法国。但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是选择的多样性和不断增加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与统一政策相比）。即使西方世界中的相对失败者也对欧洲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38

最后一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正是分割的政治实体之间竞争的动态结果产生了一种特别具有创造性的环境。欧洲在政治上是分割开的，但是它既拥有基督教世界的共同的信念结构，也拥有信息和交通联系，从而使得欧洲某个地方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发展能迅速传遍整个欧洲。在解释荷兰和英国经济成功的过程中，如果忽视来自于欧洲其他部分（和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相对较小）的影响，那么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解释力。意大利城邦、葡萄牙和日尔曼国家都落后于荷兰和英国；但是，银行、艺术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改进和印刷术正是前者为欧洲发展做出的一些显而易见的贡献。

“事后诸葛亮”能使我们更加了解西方世界的兴起吗？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大规模秩序的缺失意味着：决策的源头在城镇或者在庄园/封建等级。这些决策以塑造参与人最初感知的文化遗产为条件。让我们从城镇在欧洲大陆发挥的作用讲起。

中世纪西欧的城镇多种多样——意大利城邦、为抵抗外来侵略而建立的城堡、地方自我管理的城镇；但是所有城镇在演化过程中都有一个关键因素，即在服从外在权威时享有的自治程度。欧洲城镇在权威下的相对自由是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城镇的一个因素。随着秩序的相对增长，经济机会不断涌现，从而，贸易的交易成本下降，城镇此时能够利用新的机遇——不管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地中海贸易，还是西北欧低地国家

139 城镇的羊毛和金属贸易。商业扩张导致了与传统的贵族、国王和教士并行的新的利益集团，即商业利益的增长。城镇经常可以从贵族和教士的阻挠中争取到自由。自由如同财产安全一样对经济增长必不可少。在适当的时机，城镇可以买卖自由，也可以得到或丢弃自由。在压制下逐渐发展的新教改革提出了对另一种自由的关注——信仰自由，即选择崇拜谁的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成为相互纠结的问题。11世纪到14世纪商业的扩张不仅引起了城市的增加，而且促进了连接西北欧和地中海贸易的商业网络的发展。市集、行会和商法的组织框架方便了汇票的使用，同时需要政治经济秩序的制度框架来支撑。秩序需要在城镇内部创造博弈规则的框架，也需要跨越政治边界建立允许交换的规则及其实施机制。

亨利·皮伦尼（Henri Pirenne, 1963）生动地描述了低地国家城镇内的政治/经济秩序。他讲述了在繁荣的城镇经济中民主秩序的制度基础的建立过程，这种制度基础逐渐被行会限制以及贵族和更加势单力薄的平民之间为控制政体而引发的冲突所破坏。但是，皮伦尼认为，“中世纪的市政民主由而且只能由有特权的成员组成。他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自由和人人平等的理想”（同上，168）。在皮伦尼看来，当时的民主是独断的，并没有受到对民主和平等的理性诉求的激发，因此与现代民主不同。这样说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皮伦尼所描述的是根本变革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政治秩序的重构和不可避免的内部冲突是经济扩张过程的一部分，在历史上随处可见——冲突不仅在内部上演，发生在城镇和城镇中演化着的利益集团间，而且也在外部上演，发生在城镇与君主和统治者之间。我重申一下本章正在讲述的主题：变革无疑是个稳步增长的过程，建立在先前存在的制度框架基础上并对其作出修改，同时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信念结构的制约。皮伦尼在他的故事中描述了多种政治经济组织演化和相互作用的方式，这种方式正是制度/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这不是说民主必然会胜利，而是说会为控制政权而斗争。无疑，包含民主和平等的现代情感的信念结构不是那个时代的感知的一部分，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

英国向经济增长和自由演化的路线与欧洲大陆的不同。作为一个岛屿，它不易被征服，不需要常备军。信念结构是有差异，这点麦克法兰讲得很清楚。诺曼底人对英国的征服，作为英国不易征服的一个例外，产生了比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更集权的封建结构；但是，正如由贵族所拟订的大宪章（Magna Carta）表明的，国王无权干涉贵族、城镇、外国商人和农奴的传统自由。英国的政治制度在很多重要方面也 and 它在欧洲大陆的邻居们不同。最重要的是英国议会的单一。整个国家只有一个议会；没有像法国、西班牙和荷兰那样的地区等级。英国也没有城镇、教士和贵族的划分。梅特兰指出：“很明显，在早期，或许从一开始，市民和议员就是和爵士坐在一起的”（Maitland, 1963, 175）。在欧洲和英国，庄园中农奴和自由劳动力地位的变化不受他们对其低等地位的感知的变化所支配。然而，期限更长的租约的逐步演化减轻了债务，向公簿土地（copyhold）（在西方）的转变反映了劳动力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这是14世纪人口的下降、城镇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机会和由此导致的对劳动力的争夺的结果。

由于秩序的相对改善和人口的变化，市场、城镇和贸易发展了起来，君主的财政危机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相互竞争的政治单位之间的无处不在的战争以及不断增加的战争成本导致了这种危机，它们在发生的政治/经济变革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从1200年到1500年，西欧的许多政治单位经历了无休止的冲突、联盟和战争，逐渐演化成民族国家。与其说这是为了寻求生存所需的政治单位规模，不如说这是为了增加征税能力。对于统治者来说，收取实物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统治者将朝廷从国家的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以实物的形式来消费这些商品和服务。11世纪到14世纪的经济扩张导致了货币经济的增长，税收也以货币的形式来征收；然后在14世纪和15世纪，由于人口下降，地租降低，税收也随之下降。

一年的战争能使政府的花费增加四倍——而且战争是地方性的。下降的税收和不断增加的财政成本使欧洲的君主们处于一个更为恶劣的困境中。习俗和传统限制了国王对少数地主的勒索，跨越公认习俗的限度

就有可能出现叛乱。有时国王的封臣和他势均力敌，当然他们联合起来力量就会更大。而且，封臣有时能够而且的确与外国的君主联合来推翻本国的国王；因此，对封臣勒索的增加会使国王处于危险的境地。

尽管君主可选择的空间是有差异的，但他们可以利用的一个共同选择是授予特权——产权——以交换税收。随着贸易和商业扩张超出了城镇或庄园的范围，商人们发现，由更大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提供保护可以降低提供保护的私人成本，因而商人们乐意向君主交税以换取保护。为避免税收损失（如逃税），统治者授予了土地转让权或者继承权，从而建立更安全和更有效率的产权。城镇被授予贸易特权，异国商人被赋予法律权利并且不受行会限制，行会被授予了排他性的垄断权，作为交换，城镇、异国商人和行会都必须交税。

不断发展的民族国家之间无处不在的竞争是变革的潜在根源之一，同时也限制了民族国家内部统治者的选择。竞争迫使君主出售权利和特权，其中最基本的是授予“代议制”机构——国会、全国性议会、议会——制定税率的权利和/或某些特权，以交换税收。国家之间的竞争为人民提供了选择余地：人民可以逃离一个国家或者向另一个国家转移自己的动产，这样就限制了统治者的选择。

但是，这个时候国家开始分化。一些代议制机构保持并提高了它们的地位，为代议制政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他的代议制机构衰落或者消失了。在此过程中，统治者和选民之间不断变化的谈判力量的对比是决定性的。谈判力量主要由以下三点决定：国家提供财产保护时选民可以获得的潜在利益的大小；替代当前统治者的难易程度——即现有统治者的竞争者（政治单位内外部的）接管政权和提供同样（或更多）服务的能力；决定不同种类的税收带给国家的收益和成本的经济结构。

例如，在低地国家，生产性的城镇经济从政治秩序和产权保护中获得很大收益。这种政治秩序和产权保护首先来自勃艮第人然后来自查理五世。围绕出口贸易建立的经济结构使得贸易税易于征收，但却没有达到能够损害贸易的比较优势的程度。菲利普二世的苛刻要求使人民确信，只有独立经济才能继续繁荣。反抗由全国性议会发起，它于 1581

年签署了《放弃效忠菲利普二世法案》(Act of Abjuration of Allegiance to Philip II)，并宣布各省独立。最终，北方七省成功独立；结果，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的经济政治结构不仅具有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且具有政治和公民自由的许多基本特征。这一新独立国家（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的权力归属于各省，全体一致（unanimity）规则意味着全国性议会必须获得各省代表的选票。虽然这个程序比较麻烦，但是这种政治结构还是存在下来了。这种政体不仅逐渐形成了政治代议制的基本要素和民主的决策规则，而且，还支持宗教自由（一个与西班牙王室冲突的同样重要的原因）。联合省的实际政策是在宗教领域的宽容；正是这一政策鼓励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持异议者的迁入，他们中的很多人作为荷兰经济的增长作出了贡献。

143

和欧洲大陆一样，英国传统的封建税收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英国得自外贸的税收（包括对酒、日用商品和羊毛织品的征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在不断增长；但是，13世纪的羊毛出口贸易成为国王收入增加的支柱。艾琳·鲍尔（Eileen Power, 1941）描述了参与羊毛贸易的三个集团（羊毛生产者在国会的代表、大宗羊毛批发商和国王）之间的交易。在他们达成的协议中，大宗羊毛批发商获得了对出口贸易的垄断和在加来的一处仓库，国会获得了征税权，国王则获得了税收。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总结了这种交换过程：“国会实际上是用货币购买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对其立法、调查弊端和分享国家政策指导的权力的承认”（1896, vol. 3, 599）。

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君主制已达到其权力巅峰，但是它从没有追求法国和西班牙国王得到的对征税权的绝对控制。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充公之后，亨利八世把它们转让给了很多贵族和教士，结果“亨利需要下议院，因而他小心翼翼培植了它”（Elton, 1953: 4）。斯图亚特王朝继承了都铎王朝制定的方针，国王与国会之间的论战是众所周知的。论战的两个方面值得分析。一方面，人们逐渐将习惯法视为最重要的土地法——这一立场是爱德华·科克爵士特别拥护的，另一方面是国王授予的垄断和由此造成的对自由的侵犯之间的联系。正如戴维·萨克斯指出

的：“建立经济垄断是国家权力理论的具体体现，自由的概念就是在与该理论的对立中成长起来的。关注对垄断的不满有助于在保护个人权利和维护大众利益之间维持一种强有力的理性联系”（David Sacks, 1992, 86）。

相反，西班牙演化成专制的君主政体。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统一了两个不同的地区——卡斯蒂尔和阿拉贡，建立了一个民族国家。由瓦伦西亚、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组成的阿拉贡，在13世纪的后期从阿拉伯人手中被夺了回来，成为一个主要的贸易中心。它的议会代表了商人的利益，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如果阿拉贡决定了西班牙的未来的话，那么它的历史将会发生巨大改变。卡斯蒂尔一直忙于内战和与摩尔人的战争，没有遗留下来强大的商人集团。它的议会权力很小，伊莎贝拉成功地获得了对贵族和宗教政策的控制权。一个集权的君主政体和官僚制度随之产生；正是卡斯蒂尔决定了西班牙（后来的拉丁美洲）的制度演化。

来自哈布斯堡帝国的收入和新大陆的财富使得西班牙在欧洲建立霸主地位成为可能。但是随着上述来源的收入不断下降，国王不得不采取一些不顾后果的权宜之计，如前面描述的加税和充公，而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垄断和集中的政治控制并肩而行。西班牙所走道路的影响被证明是持久的，并且导致了三个世纪的经济停滞和政治不稳定。而经济停滞和政治不稳定直到20世纪中叶佛朗哥逝世之后才得以终止。而且，西班牙后裔把这套制度和组织带到了拉丁美洲。不过，这套制度和组织既不能使经济持续增长，也不能维护政治和公民自由。

最终，荷兰和英国沿一个方向演化，西班牙和法国沿另一个方向演化。之所以沿不同方向演化，原因在于统治者和选民不同的谈判力量以及决定谈判力量的三种根源：国家提供财产保护时选民可以获得的利益；替代当前统治者的难易程度；决定各种税收收益的经济结构。我们可以依次找出使演化轨迹不同的地理/经济/制度模式。谈判力量是变革的直接起因，但不是全部起因，忽视信念结构所起的补充作用必将误入歧途。西欧最初具有说拉丁语的基督教世界所共有的信念结构，但由于

不同的经历，欧洲不同地区的初始信念结构沿着不同的方向演化。荷兰和英国的经历使信念结构沿着促进对自由的现代感知的方向演化。与此相反，西班牙的经历不仅使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延续下去，而且使中世纪等级秩序中蕴涵的信念延续下去。

J. H. 赫克斯特 (J. H. Hexter) 比较了 1500 年英国的中世纪式自由——“特权者受法律保护的要求权的一个变化的集合体”——和 1628 年议会签署的权利请愿书 (the Petition of Right) ——请愿书关注“最基本层面的自由”。英国信念结构的演化过程可以从这一比较中简要地展现出来。赫克斯特 (1992, 1 and 2) 声称：请愿书的签署是“走向现代自由（我们所知的在我们世界的自由）的决定性的第一步”。社会的等级结构决定了谁可以享有中世纪的自由，奴隶、农奴和其他依附他人的人被排除在自由之外。与此相反，权利请愿书为所有的英国人提供了一组受法律——国会颁布的法律——保护的权力。不断变化的对个人权利的感知——从对中世纪特权的看法，到对 17 世纪英国人生而自由的想法——反映了 1500 年到 1628 年信念结构的演化过程。信念结构与荷兰、英国的特殊状况正向融合，导致了经济和政体的制度演化。这种融合推动了思想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产生了新教改革，而且产生了一种演化着的信念结构。这种信念结构可以导致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自由的演化的行为。西班牙——以及更低程度上的法国——的相反环境巩固了现存的制度结构，抑制了经济增长和政治/公民自由，并由此决定了信念结构的演化。

第11章 苏联的兴衰



146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个经济成功发展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信念不断被经验所修正并持续演化，导致了引发现代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变革。这是一个试错过程并同时伴随着好运气。如果我们以参与人的身份试图去理解变革的过程，那么，在整个历史中再没有比苏联的兴起和衰落更好的例子了。^[1]它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1. 信念、信念的形成方式与经验如何修正既定的信念结构之间的持续关系；

2. 政治决策结构在决定实施何种信念时的作用；
3. 信念通过正式的规则制定结构从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4. 对特定制度政策的结果的反馈；以及
5. 面对意外的或不理想的结果时，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反馈在修正政策中的有效性。

本章不准备详细阐述苏联复杂的演化过程，只是想通过回顾苏联的兴起和解体来强调它的历史。在初始阶段，苏联就显示出创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复杂性和为此作出努力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而它的解体则说明了在一个刻板僵化的社会里进行根本变革所存在的问题，这种僵化是由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所采用的方式造成的。苏联的兴起和衰落最好地体现了目标和结果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本性变革的过程中社会秩序的脆弱。尽管苏联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击退了纳粹入侵、获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技术的巨大发展，或许最令人难忘的是，从一个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极低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的国家——但是，它最终还是解体了。

147

I

革命后不久，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工具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所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利润、工资，都应该被废除——有必要完全重新开始。市场和货币也应该消失。随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从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到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再到 1928 年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都反映了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他人的演化着的观点。最初的“理论”通过学习逐渐形成并得到修正，而学习来自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下经过修正的信念。

最初的理论是什么？外部事件又是如何对它进行修正的呢？毫无疑问，战时共产主义时代似乎已经拥有一套实用的政策来应对无休止的当前危机。首先，几乎一切（包括土地）都国有化了，以实物形式而不是货币单位支付工资，生产决策要依照物质单位来制定，为工人制定的强制性任务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对工人的生产率和农民的农业产量的负面刺激也收到了预期的结果。决策权掌握在赫鲁晓夫集团手中，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拥有制定政策的权力。然而，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需要授权，最终党严密控制了官僚机构。^[2]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了一个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辩证的运动过程，因此，有必要在社会主义形成之前使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俄国又提出了另一种预言。他们认为，俄国革命能够发生，而且能够在西方触发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两方面必须相互补充才能使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在俄国土地公社的基础上）成为可能。换句话说，俄国这种独一无二的但仍很原始的条件将不能独立地承担起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Lewin，1995，152）。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革命不是必然的，俄国将不得不独立建立社会主义。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多大程度上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建立新经济政策（NEP）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还是一个从农民经济中汲取更多产出的应急之举？“起先，1921 年下半年，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必要的撤退，后来，从 1922 年起，他又认为新经济政策成了资本主义重新发展的开端。就此而论，布哈林追随了列宁的观点。早在 1922 年，列宁就开始宣称：撤退已经结束了；就像日本通过 1905 年的直接进攻未能夺取旅顺港，然而通过长期围攻却取得了胜利那样，布尔什维克通过直接进攻未能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将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围攻’战术来实现这个目标”（Ferdinand，1992）。

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投资农业还是工业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些人主张首先要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他们认为这样将为快速的扩张作准备，

在经过较长的酝酿期之后就可以进行重工业投资。相反，托洛茨基采纳了重要的左派理论家 E. 普里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的观点，认为重工业应该优先发展，重点扩张工业能力。

到 1926 年，工业投资一直在增长，但是出现了工业品的持续短缺和农业采购的长期危机；1927 年到 1928 年的粮食危机催生了新的农业政策。因此，对农业（尤其是粮食）价格的苛刻控制，导致了市场输送量的下降，从而增加了对私有农业普遍集体化的压力。“正是整个过程中非计划的特征迫使国家采用更多的计划，即扩大行政控制的范围，国家机构接管整个国民经济。瓶颈和危机领域出现的越多，越需要更多的控制来堵上漏洞。换句话说，这就是完全国有化的‘指令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过程，内在的机制推动了中央集权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机构的形成”（Lewin, 1995, 101—102）。

从本书的基本观点来看，苏联的早期历史并不令人感到惊奇。最初的信念体系被迫对每一次新危机（包括正在发生的革命、内战、饥荒）作出特定回应，这说明了信念不仅是参与人对经济基本结构的不完善和原始的理解，而且是参与人对实现目标所必需的激励结构的更加原始的理解。参与人之间的权力争夺使这段历史更加复杂，权力争夺以斯大林获胜告终。他强制推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农业集体化和对重工业的投资。与此同时，一个巨型的国家机构发展起来，以有计划地发挥所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不断演化的工业发展计划的潜在根源是最高地位的工程师（是计划过程中的关键计划者）所持有的一种深刻和持久的信念——为处于领导地位的布尔什维克所熟知的 20 世纪 20 年代的技术统治论运动（technocracy movement）支撑了这一信念（比较：列宁的著名口号“共产主义 = 苏维埃政权 + 全国电气化”）。^[3]

II

由斯大林巩固的苏联政权是 20 世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斯大

150

林统治下，苏联把（在一个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并采取高压政治、暴力等手段来完成这个任务。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典型的极权国家……1991年8月，这个国家就不再存在了。尽管在结构上仍是极权主义的，但经过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已经衰退和削弱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制定和实施政策目标的能力。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苏联政权的主要执政者——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他的“领导角色”。没有出现新的制度来填补这个空白。（Mcfaul, 1995, 224）

我们能详细描述1985年到1991年之间的显著衰退吗？

我们从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47年所作的有先见之明的评论讲起：“如果……有什么可以干扰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统一和效力，那么苏联就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转变成最弱小和最卑微的国家之一。”^[4]事实上，正是这一现象——对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破坏——似乎成为苏联终结的直接原因。不过我们首先应该回顾过去，为苏联在1985年到1991年之间的衰败提供历史背景。

斯大林统治的最后两年中几乎没有任何组织变革。主要的变革不得不等到这个伟大的独裁者死后。1953年3月5日，他的继承者们接手了他的遗产：一个伟大的国家，第二大军事和工业强国，不过也是一个有很多弱点和不平衡发展的国家。苏联虽然作出了伟大的科学贡献，但它的住房条件令人震惊，消费品质低劣，村庄还很原始。即使在单一部门内，例如粮食耕种，现代化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也与除草、晒干和装载过程中的完全非机械化的手工操作并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处理过度集中、可接受（或已接受）的投资准则的缺乏、农业价格与运输网络的缺陷、物资供应的瘫痪这些问题？怎么可以容忍一个能制造原子弹的国家却不能向它的人民提供鸡蛋呢？怎么在恐怖条件下鼓励必需的创新呢？（Nove, 1969, 314）

151 斯大林死后，苏联经济的首要问题就是改革。主要的改革——那些将大幅度降低中央计划和等级管理（administration）的作用的改革；直接

的生产指标、价格和工资控制；相应地提高市场、分散决策和非国家所有权的作用——却从未推行。在逐渐意识到整个经济存在严重问题并经过不公开甚至公开的长期讨论之后，旨在在现有制度框架之下改进制度效率的小规模改革被尝试推行。^[5]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增长率显然在下降，但是顽固而强大的官僚机构已经成为庞大的苏联政权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之下改革努力几近于零。在列举了许多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直接原因之后，格罗斯曼接着说道：“一连串不当的、局部的、不断失败的经济改革侵蚀了对传统体制的未来的信心，当苏联开始出现动摇的时候就加速了它的衰落”（Grossman, 1998, 26）。他补充了以下传统原因：私人手中的非法财富、无所不在的腐败、有组织的暴力犯罪的激增和对官僚政治忠诚的重新定位，并且强调了影子经济的快速发展。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想通过经济与政治制度的自由化来使经济获得新生。“在尝试依靠现存的政治制度进行经济改革仅仅三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就断定他不能依靠现存的政党和政府制度来执行他的改革计划。他进一步推论：只有改变治理制度（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ance），他才能推行改革（perestroika）（重组），这样既能削弱根植于现存制度框架内的反对者，又能在社会中扶持改革的支持者”（McFaul, 1999）。结果，现存的控制体系迅速解体。

改革绝不是一个经过慎重考虑的方案。1987 年 6 月召开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颁布的一系列改革增加了厂长制定价格、工资和产出指标的自主权。第二年的《合作社法》（*Law on Cooperatives*）使私有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这些改革激励厂长去隐瞒产出、为自己转移资源和瞒报利润（McFaul, 2001, 42）。

厂长，作为各种委托人的有知识的代理人，开始取得了他们所控制实体的事实上的产权。首先，他们夺取了消费权。因为委托人不可能监督企业的所有生产活动，所以厂长有机会进行个人消费和盗取资源，也能够通过企业其他人员控制消费。

其次，厂长获得了利润。通过隐瞒收入或者瞒报额外产出，厂

长牺牲了委托人的利益，增加了个人财富。一个大规模的黑市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机会；没有市场法规抑制逃避责任的行为。而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一系列改革使小企业和合作社增加了厂长从国有资产中获取利润的机会。依据这些新法规，有企业家精神的厂长建立寄生的合作社、集体所有的实体、租赁合同和合资企业，它们都成为从大型国有企业资产中谋利的利润中心。与外部承包人，尤其是外国承包人的有利可图的交易都是通过小企业进行的，使得整个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而，厂长从财产中获得了利润，却没有承担任何与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责任。苏联的厂长从没有获得第三项权利——财产的转让权或者让渡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只有委托人（国家）才能够行使这项权利。这就是说，整个经济体系只有一个法律上的所有者，使得在苏联内部的财产转让没有任何意义。（McFaul, 1995, 222—223）

改革也破坏了苏联政治体系中发挥稳定作用的政治结构——这一结构建立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这种非正式制度“为各级党的领导人和经济管理者提供了他们作为苏联管理阶层的特权和责任”（McFaul, 2001, 43）。这些特权和责任受到经济变迁的威胁，因为经济变迁增加了厂长的自主权，因而减少了党的官员的权力。来自党内部的对改革的抵制使得戈尔巴乔夫将部分党的领导人作为改革的敌人清除出去，并改变了某些治理党的内部政治活动的规则（McFaul, 2001, 45）。推行开放（Glasnost）或公开（openness）的政策，目的在于创造更多的言论自由，以削弱党的领导人对改革的压制。减少审查、放松对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招回流放者安德烈·萨克哈夫，以及允许竞争提名第19届党代会（召开于1988年）代表，这些都削弱了党的官员的权力。

开放政策成功了。1989年的选举导致了政治活动、媒体批评和大批政治运动的爆发。

最初，来自下层的力量是戈尔巴乔夫的盟友，他们共同反对保守的共产党中层官僚。然而很快，下层对变革种类、程度和步伐的需要超出了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改革议程。从苏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国际代表团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Deputies in the USSR Congress) 开始, 决心进行真正的革命性变革的政治参与人开始组织起来, 反对苏联政权的传统统治制度。鲍里斯·叶利钦领导的这一新的政治力量迅速地滑向“反霸权组织” (organization of counterhegemony); 为了创造新未来的集体方案。一些不系统的主题, 虽然最初模糊, 但最终变得明确起来, 有助于这些挑战者针锋相对地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社会及政治制度 (ancien regime)。(McFaul, 1999, 114)

第8章研究了社会中秩序和无序的微妙平衡; 对苏联的描述揭示了当潜在的政治结构被侵蚀的时候, 脆弱的秩序将会怎样。史蒂文·索尼克 (Steven Solnick) 简练总结了这个过程:

当组织中的高层官员被证明不能控制下属的活动时, 他们开始怀疑他们还能控制什么资源。这些怀疑的扩散侵蚀了组织结构内部的权威。仍旧忠诚的地方官员也开始怀疑, 如果中央崩溃了, 他们以前对上级的顺从可能使他们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注定不幸的对中央控制的重新强调——如在巴尔干国家——只会通过进一步证明中央的脆弱来加剧危机。

最后, 在政策改革的有效性取决于一致的制度回应的关键时刻, 地方官员全体背叛, 苏联体系的支柱倒塌了。实际上, 苏联制度的崩溃就像一个巨型的银行挤兑, 在官僚机构的大门永久关闭之前, 地方官员蜂拥着去索要资产。正如银行挤兑那样, 失去对制度的信心使制度终结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与银行挤兑不同的是, 背叛的官员不是索要自己的合法资产的存款者, 而是窃取国有资产的国家雇员。

154

从这个角度来看, 国家“解体”的图景可能看起来是不全面的。苏联的制度不仅仅是萎缩或者分裂, 而是被试图攫取通用性资产的各级官员所撕开。在组织资产更多地只能由国家专门使用的地方, 例如征兵局, 等级结构被证明更易复原。而在组织资产绝大部分是现金和建筑的地方, 等级结构几乎无一例外地瘫痪了。在这两

种极端情形之下，国家崩溃的催化剂都是国家雇员本身。一旦银行挤兑开始，这些官员不仅窃取了国家资源，而且也窃取了国家本身。(Solnick, 1998, 7)

虽然苏联解体的细节是无数文献和争论的主题，从构成了该项研究的核心的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潜在解释并不复杂。适应性效率需要一种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在面对非各态历经的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时，将会灵活地尝试各种选择，以处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种制度结构也需要一种信念结构，来鼓励和允许进行实验，同样也消除失灵。苏联恰好成为了这一方法对立面的代表。

第12章 提高经济绩效

从前述章节来看，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应该显而易见。上半个世纪的经济史充斥着未能实现发展的经济体，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到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的，总体来说，世界经济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在 21 世纪初期，对世界经济的一个纵览揭示了与过去经济状况相比史无前例的繁荣。然而，超过 1 亿人每天生活费仍旧少于 1 美元，超过 2.5 亿人少于 2 美元；时停时续的增长仍然是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特征；日本仍旧陷于停滞之中；印度

155

尼西亚作为一个整体仍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些都让人迷惑不解。我们不仅知道成功的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新增长经济学清楚地说明了这些条件——而且我们甚至知道从基础上支持成功经济增长的制度类型。此外，“有用”知识的存量——经济增长潜力的基本决定因素——以不断增加的速度持续增长。

前面的章节已经尝试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如果经济增长仅仅是知识和技术存量增长的一个函数，那么，人类的未来福利看起来就可以得到保证了。一旦我们考虑到意识和不断演化的文化之间复杂的、远未被我们理解的相互作用，这种保证就不存在了。信念→制度→组织→政策→结果的演化方式导致了空前的经济福利，也导致了无休止的灾难和人类的痛苦。在完全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之前，我们仍有一段路要走，但我们已了解很多。前面的章节探讨了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三个关键难题——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构成现代人类环境的特征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制度结构和一个非各态历经的世界。这对于我们直面这些难题的来源以更好地理解如何处理它们将是很有益的。我们从信念和由此产生的制度结构讲起，接着探讨源自演化着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以及随之产生的交易成本的问题，还将探讨源自分散的知识的问题。随后，我们就可以提出改进经济绩效的具体建议了。

I

即使最粗略地概述一下世界各地的现存信念，也不能提供与理性假设的潜在观念相一致的乐观观点。原教旨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种族仇恨、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和迷信一直影响着选择。在科斯世界里，所有参与人总是选择能够最大化总体福利的政策，并为输家提供补偿；但是在真实世界里，根深蒂固的信念和偏见常常导致高不可攀的交易成本。亚当·斯密解释国民财富的根源已经有二百多年了，但是，在多大程度上那些影响政治/经济变迁的人在决策过程中持有他的

看法是很成问题的。

我们现在已经充分理解了制度，以至于能够查明差的绩效的来源。它们源自路径依赖。我们从过去继承了人造结构——制度、信念、工具、技术、外部符号储存系统（external symbol storage system）。一般来说，人造结构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不过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危险地——在提高经济绩效的尝试中遭受失败的危险——忽略了它。我们仍未充分理解这种文化遗产在多大程度上容易被人类审慎的修正所“影响”（malleable）。任何时候，文化遗产都严格限制了人类实现变迁的能力。我来列举一下由此产生的问题：

1. 从过去继承的制度结构可能反映一系列不受变迁影响的信念，这或者是因为被提议的变迁与这种信念体系背道而驰，或者是因为被提议的制度变迁威胁到了现存组织中的领导者和企业家。在从根本上来说相互竞争的信念并存的地方，建立一套可行的制度安排的问题就会增加；这一问题也会使一致同意的政治规则（consensual political rule）的建立成为整治短期灾难的处方。

157

2. 决定经济绩效的人造结构由相互依赖的制度组成；为了得到理想的绩效而去改变其中一种制度，结果有时却产生不完全的、有时对生产不利的活动。

3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它们的实施特征的混合决定了经济绩效；虽然正式制度可以被法令所改变，但是，非正式制度短期之内却难以改变，实施特征也仅能加以不完全地控制。

如果我们能获得制度政策结果的完美反馈，那么我们就能理解我们的行为是否达到了想要的目标。然而，系统总有那么多的“噪音”，以至于我们无法得到清晰的信号，即使我们想要理解行为的结果；产生反馈的信息等级链条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人们很难根据这些反馈做出正确的评判。改善经济绩效需要时间——比批准这些变革的政治家的时间期界要长。短期之内，改革可能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参与人的状况变差；如果他们有权参与政治过程，那么他们很可能会终止改革。

II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描述理想的政治模型——独裁主义模型和一致同意模型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得到简要的描述，其中的四个“理想”成分重述如下：

- 158
1. 一个制度矩阵，它产生了一批组织，建立了一组权利和特权；
 2. 政治和经济市场中交易关系的一个稳定结构；
 3. 一个基础结构，它使政府遵守一组为组织和交易关系提供保护的政治规则和实施成为可信承诺；
 4. 作为规范内在化和强制性实施结果的顺从。

理想的经济模型由一系列经济制度组成，这些制度为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激励。但是，这种一般性的认识并不能给我们太多的帮助。产权导致有效的价格体系，因此建立产权是必需的一步，但关键在于建立产权的具体过程。交易成本被定义为度量被交易的物品的成本和实施合约的成本，因此我们必须设计出一种产权体系，能在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交换中降低交易成本。因为每个要素和产品市场具有不同的物质、技术、信息和政治特征，因此，价格体系的一般条件的创造必须伴之以在每一市场中构建必需的制度框架，以产生有效率的结果。而且，由于上述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此，这些建构也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我们需要更详细地考察经济中交易成本的来源。交易成本主要产生于：

1. 度量一种商品或服务的双重有价值的维度；
2. 保护个人的产权；
3. 整合社会中分散的知识；
4. 实施合约。

下面我们将依次讲述这四点。

1. 商品和服务通常具有关系个人效用的多重维度。如果每个维度都能被度量,我们就可以更精确地界定产权,从而增加个人效用,降低交换成本。

2. 制度和组织所需的有效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发展常常伴之以个人投入资源保护他的财产。 159

3. 社会中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越多,社会中的知识就越分散,整合这些分散的知识所需投入的资源就越多。

4. 合约的实施涉及监督和度量交换——以确认交换条件是否得到遵守——的成本,以及发展有效的违约惩罚机制的成本。

改善经济绩效意味着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关键在于变更制度以实现这一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

1. 发展统一的度量体系,进行技术研究以更好地度量,改进对产权的界定;

2. 建立有效的司法体系以降低合约实施的成本;

3. 构建制度去整合社会中分散的知识,去监督和度量协议并解决争议。

应当强调,出现在西方世界的制度,如产权和司法体系,是不能够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在于创造激励结构,而不是对西方制度的盲目模仿。从家庭(联产)责任制(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开始,中国发展出一种信念结构;这种信念结构无须借助任何西方的标准处方就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如果中国想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它必须在政治/经济结构中构建激励体系,这可能需要建立那些更具西方社会的适应性效率特征的制度。

III

绩效较差的经济的制度矩阵不能为提高生产率的活动提供激励。为之作出的解释有两方面。第一,它们的现存制度结构产生了在现存结构 160

中具有既得利益的组织。第二，分散的知识需要一个制度和组织的复杂结合体，以建立有效的产品和要素市场。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恰当的结合体。前一个问题最普遍的来源是“庇护主义”（clientelism）的持续存在，这是试图把人格化交换扩展到较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市场上的结果。尽管这种向经济市场上的扩展可能也的确产生了经济市场的大规模扩张，但是，向政治市场上的扩展一般会产生运作较差的民主，这种民主的特点是垄断、腐败、锁定目标的开支（targeted spending）和总体上较差的经济和政治绩效。^[1]

现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灰暗历史是对我们关于经济发展的政治学的不充分知识的一个有力控诉；拉丁美洲的政治史只是稍微不太令人失望；俄罗斯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的经历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政体。打破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问题，而理解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是另一个问题。

161 全球信息成本的急剧下降以及高收入国家明显的物质成功，为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当维护现状的组织被差绩效、腐败的曝光或者有关其他地区更好绩效的信息所削弱的时候，正式规则的变迁就可能发生。而且，正式规则详细说明了理想政治模型的四个部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能被制定成法律。但是，要使这种正式规则有效，需要非正式约束和实施的补充。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形成这种非正式规范，对此有大量论证和相互矛盾的证据。毫无疑问，限制政治参与人自由度的根深蒂固的非正式规范，对于发达国家长期的经济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实施需要建立必需的制度和组织，也需要建立互补的非正式约束。独裁者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具有很大优势。实际上，他可以创造前面列出的建立有效政体所必需的四个条件。但是，在更长的时期内，一致同意型政体是必需的，因为统治者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可能最终会被危机或死亡所破坏。

建立稳定的一致同意型政体需要时间，仅仅实施正式规则只会导致失望，甚至是灾难。正如前面所述，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之后移植了美

国宪法，但是结果却大相径庭。成功的一致同意型政体需要一系列基本规范去限制参与人，不过发展这些规范需要时间。本土技术的不断进步将逐渐积累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是建立一致同意型政体的必要前提。在本土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以提供教育、医疗或其他援助的方式出现的外部援助明确地涉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的本土技术。显然，任何增加绩效较差的经济的人力资本的努力都必须基于对该经济的文化遗产的清晰理解。

IV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政治经济体系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结构逐渐演化现代形式，在此过程中通常缺乏深思熟虑的计划。结果，我们没有完全理解对绩效至关重要的这一结构。但是，一旦我们试图改进差的经济绩效，我们就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相互依赖产生了什么样的复杂问题。整合分散的知识不只需要价格体系。正如第9章所述，现代专业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交易成本——确定产品和服务的度量和绩效特征的成本，这些特征不同于个人的专业化知识，不过却是有效整合分散知识所必需的。

162

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函数。但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逻辑必然会造成这样一个世界：个人掌握了大量的本专业知识，但却对其他所知甚少。哈耶克强调了另一个关键点，即个人最终不能完全理解政治/经济的总体特征。我们的知识至多是不完整的，在这一点上哈耶克无疑是正确的，他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为解释我们的不全面的理解提供了基础。但是，哈耶克没有认识到，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事社会工程，即使我们完全赞同他就价格体系相对于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的效率，以及他与社会主义计划者辩论时的获胜论证。我们必须回到意识的本质上，从恰当的视角进行总体论证。意识是关于人类意图的——建立在人类逐渐形成的非凡想象力和创造性基础之

上的意图。但是，如前所述，意识是我们创造性本质和自我毁灭能力的来源。

理解社会中制度作用的关键是认识到制度体现了我们有意识的心智的意图。单个市场的或者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都是人类创造的，它们都不是自发地或者“自然地”发挥作用的。而且，随着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这些基本参数的改变，这个结构如果要运作良好的话（不管如何定义），必然也要不断作出改变。在没有外部性、不完美和不对称信息以及搭便车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面对复杂的经济变迁的价格体系。但是，这种想象忽略了我们仍未完全理解的在非各态历经的世界中人类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人们对不断演化的世界的诠释方式，特别是关于经济变迁和政治变迁的相互作用，以及关于打破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现有均衡的军事技术变革的诠释方式。正如在第2章中所述，在各态历经的世界中，我们最终能够正确地理解世界，但是在异常变化频仍的世界中，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应对这种异常情况的最好方法是，保持那些允许试错试验发生的制度，这种方法哈耶克多年以前就曾提出过，也已经成为美国物质成功的来源。这种结构不仅需要多样的制度和组织以便试验不同的政策，而且需要有效的方法去消除不成功的做法。只有在非正式规范演化相对较长时间之后，适应性效率才能逐渐形成，而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没有捷径。

V

有了这些如何改善经济绩效的告诫，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否获得有关这一主题的更多实证知识。

1. 提高经济绩效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清楚地理解经济绩效差的原因。度量不同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的交易费用是关键的第一步。获得了这一信息，我们才能够把经济绩效差的原因追溯到制度/组织结构上。但是，高交易成本通常不利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即使给定要素禀赋它们

本可以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因此，提高经济绩效还需深入理解经济的潜在前景，以便一降低交易成本，人们就可以想象出经济中产品和服务种类的扩张。

2. 为了改善制度结构，我们必须先清楚地理解这一制度框架的来源。我们只有知道身处何处，才能知道去往何方。理解社会的文化遗产是进行“可行”变革的必要条件。我们不仅要清楚地理解构成现存制度的基础的信念结构，也要清楚地理解在多大程度上信念体系受到变迁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现存制度和它们的组织基础的来源，才能

164

获得进行可能的结构改革的洞见。

3. 面对发达国家的竞争，不发达国家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即整合对经济低成本运作不可缺少的分散知识。“全球经济”并不是同一水平的竞技场。发达国家在制度/组织框架方面有着重大优势，这一制度/组织框架能够（虽然并不完美）攫取整合分散知识所固有的潜在生产率，而分散知识是在一个专业化的世界中有效率地生产所必需的。所以，一夜之间建立制度/组织矩阵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保持竞争力，多种政府干预——连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终止政府干预所需的全部告诫——在短期内是必不可少的。

4. 提高经济绩效必然需要一个可行的政体，它能够构建必要的经济制度并提供有效的实施。在缺乏正式和非正式的一致同意型政治制度遗产的国家，通往有效政治制度之路或者需要一个独裁者有能力有意愿去建立并实施必要的经济规则，或者需要经由非政府组织（NGOs）和有效的外国援助实现的、更加漫长的零碎发展（piecemeal development）过程。在外国援助中，教育、健康、司法或者其他援助被有效地设计和传送，以将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传递给当地居民。^[2]这样也会带来外部性副产品，即逐渐积累建立有效的一致同意型政体所必需的政治人力资本。我知道这一选择没有捷径可循，它还需要“诱导”现有政府不去干预这种局部改进和知识转移。

在一致同意型政体所需条件存在的地方，提高政治透明度的制度规则的发展使得对政体的更有效的监督成为可能。研究有效（也就是说，

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政治政策的文献汗牛充栋, 所有这些文献都在不同
165 程度上反映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洞见。

如上所述, 经济规则的改变必然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 因此认识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有权参与政治过程以及失败者有能力取消拟议的变革是绝对必要的。虽然科斯解并不总是可以实现, 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也会减轻制度变迁中的反抗。

前面的章节应该使我们充分认识到, 并不存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固定方案。任何经济模型都无法刻画特定社会中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即使生产率增长的源泉众所周知, 每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不同的。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遗产, 同样反映了不同的地理、物质和经济环境。本书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是, 在你提高经济绩效之前, 你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 然后, 在你试图改变社会之前, 你必须理解这个社会的独特特征。因而, 如果你想有效地实施变迁, 你必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性。

第13章 我们走向何方？



166

过去几个世纪空前的经济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和生活期望提供了一个研究人类持续进步的背景和视角，这并不令人惊讶，而且理由充分。知识存量的增长所带来的物质改善已经超出了我们祖先最为大胆的梦想。美国现在的贫困定义（一个四口之家一年大约有18 000美元收入）已经超过了（给定适当的通缩因子）几个世纪以前除一小部分人以外所有人的生活标准。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进步的标准有时刻定在知识存量的增长上；在解决稀缺性的问

题上，知识存量的增长似乎并不存在报酬递减。但是本研究的焦点在于制度和人类建立制度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因此，这里我们也试图创造一个由制度构成的复杂社会，能够应用知识存量来创造有效率的经济。然而，当我们在这个更大的总体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环境中研究人类的生存条件时，结论变得模糊起来。

本书的观点对于理解人类未来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意义。我们对于未来只有有限的认识，而且它对于人类对未来的意义还非常不确定。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必须了解经济福利的巨大成就，理解演化过程所具有的和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非常简要地探讨这种研究人类未来条件的方法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我将逐一研究信念的演化、人类的创造性和适应性、制度适应性成功的不确定性，以及适应性效率的限制条件。

I

167 从前面几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理解非常不完全，而且意识的确切性质也是一柄双刃剑。意识既是激发人类创造力灵感的源泉，隐含着人类生存条件积极方面的内容，同样又是（与伴随的文化条件一起）导致大屠杀、无休止的战争、人类野性以及现代（以及非现代）恐怖主义的迷信、教义、宗教的来源。我们是否已经充分掌握了心智和大脑与人类环境交互的方式，以使我们能够理解信念的来源？我们是否已经知道了非理性信念与各种文化属性相结合从而产生特殊的反社会属性的方式？人类在不同环境中的“自我意识”已经导致了信念体系极大的不同，这些信念体系过去是、现在和将来继续是人类行为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源泉。但是，我们对这些信念体系演化的方式、传播的方式及其对人类绩效的影响所知甚少。现代军事技术的破坏性意义使这种理解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II

本研究的一个中心命题是，世界的非各态历经性质造成了人类在演化过程中面临更为复杂和相互依赖的新环境时如何成功处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社会成员的心智所发展出来的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的高低，以及问题的新颖程度。一个社会中的某些成员可能会看到问题的“真实”性质，但是却无法改变制度。因此，必须使那些能够作出政治决策的人也具有这种想法；然而，政体能否将这种人“安置”到决策制定的位置上并不是不言而喻的。

心智的运行方式是很重要的：如果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大多数行为是由基因推动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在面临新问题时的灵活性是怎样的呢？人类今天和明天所面临的问题与狩猎者/畜牧者的个体所面临的问题之间没有多少相似性。问题的新颖程度显然是可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我们已经开始熟练地讨论技术变迁、因特网以及基因改变，并将其作为问题的答案，然而我们没有认识到能够导致人类环境改变的那些新问题。我们正在创造的互相依存的世界需要巨大的社会变迁，并向我们提出了人类适应能力问题。

168

III

信息成本的降低以及所有社会都可以利用其他社会的绩效使得制度模仿和制度的适应能力明显加快。但是，尽管可以利用其他社会的成就，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继续扩大。我们在前面几章中阐述的对于变迁过程的理解清楚地表明了赶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创造将经济规则与正确的激励恰当地配置在一起的政治制度。我们对于复杂制度和政治经济在技术上相互依赖的结构的理解

解还很不充分，而这对于改善它们的绩效是很必要的。对我们在刺激南撒哈拉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有限的成功所作的冷静分析表明，在对改善绩效的制度充满信心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穆斯林世界（穆斯林世界内部以及与它的邻国之间）的骚乱给人类的未来投下了深深的阴影。20世纪90年代早期俄罗斯的骚乱清楚表明了构造一个运作良好的新制度框架的难度。一个复杂的因素就是变迁过程本身，它将会使来自过去经验的解决方案在新的环境中无法运作。经济学家所坚持的理论是用来处理19世纪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的，那个时期的问题是资源配置。经济学家总是试图将那个理论进行修订以适应发展的基本问题，对于解决本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这个理论是完全不适当的。

IV

历史上所有的社会最终都会衰亡和消失。有些国家像罗马延续了几个世纪，其他国家如苏联只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曼库·奥尔森认为，在不存在周期性革命的情况下，利益集团会使社会陷入僵化，扼杀作为增长基础的生产力进步。苏联简短的历史就是僵化的制度框架所具有的内生缺陷的证明。我所提出的适应性效率是指当问题演化时，社会不断修正和创造新制度所不断需要的条件。伴随适应性效率的一个要求是政体和经济体能够在面临普遍的不确定性时为不断的试错创造条件，消除已无法解决新问题的制度性调整。哈耶克将这个条件作为他的人类生存观点的核心。这当然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发展的特征，尽管其发展历史中还存在一些瑕疵。看起来一个潜在来源就是建立一套非正式制度约束，它对于所有形式的僵化的垄断都是有利的约束。但是，建立这样的制度更多的是好运气，而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即使知道它们的来源，它们在长期内也会演化，不能够有意或者在短期内进行复制，而且也不能保证灵活的、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结构在我们正在创造的更

为复杂崭新的世界中得以持续。过去文明的经济衰退的普遍性表明适应性效率可能会有局限。

知识存量的增长会使这种黯淡的结果一去不复返吗？一些转而研究科学技术的智囊团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他们提供的乐观预期相信会出现这种结果；但是在塑造人类决策的不同人类经验环境中，它是意识演化方式的复杂混合物。要理解人类的生存状况，必须关注参与人有意识的行动。经济学家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个选择的理论。但是要改善人类的未来，我们必须理解人类决策制定的来源。这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170



注 释

第 1 章

[1] 见 Denzau and North (1994) 对理性假设在哪些条件下有用、哪些条件下没用的讨论。

第 2 章

[1] 关于这个主题有大量文献。在 Manski (1996) 以及 Davidson

(1991) 中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很好综述和参考文献。

[2] 有必要区分对个人而言的不确定性和对社会团体而言的不确定性。虽然个人是决策者，但该研究关注的是对社会团体而言的不确定性。然而，这种区分模糊了个人风险和不确定性与组织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复杂界限，在余下的章节中我将探讨这一点。

[3] 当我在整本书中使用效率这个词时，我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给定技术状态和信息成本，市场有可能获得的最低的生产和交易成本。效率这个词通常用的是相对意义而不是绝对意义。而且，虽然在经济市场中效率通常与物质福利的提高相一致，但是在政治市场中福利的含义更加模糊，我将在第 5 章中展示这一点。

[4] 就“理性”而言，我指的是解释逻辑上一致，并且原则上经得起经验检验。

[5] 我们把知识定义为，物质和社会环境规律和模式的累积，从而导致的对这些环境的各方面有组织的解释。但这里并非说这些知识是“真实的”。

[6] 对知识、有用知识以及它们与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一个有创见的讨论见 Mokyr (2002)。

[7] 我要感谢同事 Sukoo King 对这些区分的详细说明。

第 3 章

[1] 见 Hogarth and Reder (1987) 就围绕该主题召开的多学科会议所做的会议综述。

[2] Baumgartner and Sabine (1996) 对这个领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很好的总结，指出了研究中的分歧以及取得的成就。

[3] North (1994, 362—363)、Holland et al. (1986) 也是研究这个领域的最好最全面的文献。

[4] Edelman and Tononi (2001, 212—218)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

很好的总结。

[5] 联系模型是感觉和认知过程的神经网络模型，通过这些过程能够获得以及形成对于现实世界的表述。“在不断重复的接触环境之后，人工神经网络能够通过改变它们的联结模式获得经验。它们实质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被动地收集数据，以与天文照片曝光相同的原理形成印象。对于物体的很多感知允许神经网络从世界上抽取与这个物体相关的相同点。这些相同点被存储在稳定的联系模型之中” (Donald 2001, 155)。对于联结理论的基础的批评见 Edelman (1992, 226—227)。

[6] 见 Brian Arthur (1992)。

[7] 对于共同文化遗产所扮演的统一化的角色的进一步研究见 Denzau and North (1994)。

[8] 见 Boyer (2001) 的讨论，该讨论非常有价值。

[9] 这个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Bechel and Graham (1998)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出色的讨论。可以特别看一下 Robert Mccauley, “Levels of Explanation and Cognitive Architecture”。对斯莫伦斯基观点的讨论在该文第 621 页。

[10] 参见 Modularity (1994) 以及其他人对卡米洛夫-史密斯的评论。

[11] Damasio (1999) 对大脑和心智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意识的意义进行了细致和富有想象力的研究。Edelman (1992) 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也很有争议，他试图将大脑的演化理论（他称之为神经达尔文主义）整合到意识理论中去。我下一章的研究即建立在他们的研究之上。

[12] 见 Hutchins (1995, 354)。这一部分来自 Knight and North (1997)。

第 4 章

[1] 此处的很多描述以及后面对于意识性质的总结都来自于 Edel-

man (1992) 和 Damasio (1999)。

[2] 特别见 Edelman (1992, Part III) 对这些问题所作的详细的分析。

[3] 这个术语经由 Richard Dawkins (1998, 302—308) 得以流行, 在 Dennett (1991) 中是非常重要的术语。Searle (1997) 在第 5 章对丹尼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4] 见 Kuran (1997); 另见 Kuran (2003)。

[5] 见 Joseph Henrich et al. (2003), “‘Economic Man’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第 5 章

[1] 我不会重复我在以前的研究中所做的有关制度的分析。本章的研究的确建立在以前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 但是扩展甚至在某些方面修正了以前的观点。

[2] 现在有大量的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关于行为规范的文献。Bendor and Swistak (2001) 是一篇从演化的视角入手进行综述的著作。

[3] Viktor Vanberg (1994) 对哈耶克的理论作了精彩的综述, 并尖锐地批评了哈耶克的某些结论。

[4] 见 Weingast and Marshall (1988), 他们运用这些概念分析了国会的组织结构。

[5] 接下来的几段来自于 North (1990a)。

[6] Lupia, McCubbins and Popkin (1999) 认为政治市场比我们在本文中所论证的更有效率。

[7] 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日益增加。剑桥大学出版的《制度和决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系列丛书提供了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最为重要的论文。Hughes (1977) 是研究政治制度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开篇之作。

[8] Barzel (1997) 对这个问题作了精彩的讨论。

[9] Williamson and Masten (1999) 提供了用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企业的一般性观点。

[10] 这一节来自 North (1995a)。

[11] 见 Easterlin (1996) 和 David (1997) 的精彩论述。

[12] 有很多关于组织内部结构的文献，例如奥利弗·威廉姆森，加里·米勒和吉姆·马奇等人的著述。他们的文章分析了组织内部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这和本文研究的重点不同，本文重点研究制度和组织之间的互动。

第 6 章

[1] Witt (1992), Hodgson (1993) 和 Denzau and Zak (2001) 是有关这方面的很好的文献综述。

[2] 例如，Dawkins (1998) 对斯蒂芬·J·古尔德和斯图亚特·考夫曼的理论做了严厉的批评。

[3] 我们从 Boyd and Richerson (1985) 中受到启发。

[4]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解释见 Dawkins (1998) 和 Dennett (1995)。

[5] 直到最近，我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制度和决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系列丛书的副主编，在一系列问题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深深打动了我；也有学者试图增进转型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绩效，通过这些文章我认识到分析第三世界经济的困难性，也认识到创建合适的政治经济结构能够提高经济绩效。

[6] Arthur, Durlauf and Lane (1997) 综述了复杂理论的进展。我也在这本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长期经济变迁过程的文章。

[7] Boyer (2001) 对此作了初步的解释。

[8] Martens (1999) 具体阐述了这种观点。

[9] Ben-Ner and Putterman (1998) 对此作了精彩的综述。

第二篇 引言

[1] 参见 Powell (1996) 对基因研究中涉及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的饶有趣味的阐述。

第 7 章

[1] 见 North (1981) 对新石器革命之后人类经济史的简短但却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综述。

[2] Diamond (1997) 记录了人类和动物的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作为结果的对人类发展或不发展的含义。该书指引我们理解了不同的环境对早期发展的含义，因而颇有价值，但后期发展的分析缺乏对适于发展的制度环境的复杂性的评价。

[3] 对这一演化的令人着迷的描写见 Donald (1991)。

[4] 前述图表概述了与人类环境发展有关的巨大变迁，但提醒的话 (a word of caution) 是必要的。这些数据是人类福祉复杂的、多维的各个方面的代表 (surrogates)，正如大量收入统计文献所证明的，这是相当差劲的代表。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考察这些维度时，度量问题甚至更加重要。一个较老但仍然有用的描述见 Adelman and Morris (1971)。

[5] 目前正在从事的大量实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行为的更好理解。除了前面几章引用的研究之外，Greif (forthcoming a) 概述了大多数正在进行的研究。最近的概述可在 Kevin McCabe (2003) 中找到。

第 8 章

[1] 这一章大部分源自 North, Summerhill and Weingast (2000)。

[2] 参见 Denzau and North (1994) 对这一论点的认知科学基础的详细阐述。

[3] 参见 Calvert (1998) 有关这一问题的博弈论模型，该模型阐明了秩序建立和维持过程中的许多关键问题。

[4] 这一描述取自 North et al. (2000)。更长和更详细的描述可参见 Rakove et al. (2001)。

[5] 更详细的分析性描述参见 Weingast (1998)。

[6] 参见 Haber et al. (2003)。

[7] 阿根廷的历史最好地阐明了这种脆弱性——该国 1940 年人均收入世界第六，然后 40 多年经济停滞，随后就是短暂恢复和（到写作本书时）经济崩溃。对阿根廷繁荣消逝的根源的讨论参见 Alston and Gallo (2001)。

第 9 章

[1] Martens (2004) 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2] 参见 Rosenberg and Birdzell (1986, chapter 8)。

[3] 一项激发进一步思考的研究见 Stiglitz et al. (1998)。

第 10 章

[1] 本章选自 North (1995b)。

第 11 章

[1] 我不是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不过我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帮助。我在叙述中没有提到他们，在此我向格雷戈里·格罗斯曼、迈克尔·麦

克福尔、约翰·利特沃克、安德烈·施莱弗和彼得·贝特克表示感谢。

[2] 在本章我没有讲述政治控制的演化过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见 Roeder (1993)。

[3] 在此我对格罗斯曼表示感谢，他不仅让我注意到了技术统治论，而且为我提出了许多其他的有益见解。

[4] 转引自 Grossman (1998, 24)。

[5] 这些评论总结了格罗斯曼（日期不详）写给我的关于后斯大林改革的评论。

第 12 章

[1] 关于庇护主义对民主的影响的讨论，见 Philip Keefer (2002)。

[2] Mwabu et al. (2001) 讨论了外国援助中的一些问题。

索引*

Abraham, Anita, 安尼塔·亚伯拉罕, 100

Act of Abjuration of Allegiance to Philip II, 《放弃效忠菲利普二世法案》, 142

Africa, 非洲, 75; Sub-Saharan 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vii, 75, 119, 129, 155, 160, 168

Antwerp, 安特卫普, 134

Aoki, Masahiko, 青木昌彦, 58

* 朱勇、王一凡、王建昌、张伟、王小芽、李剑整理了书中索引。

- Aragon, 阿拉贡, 144
- Argentina, 阿根廷, 125
- Arrow, Kenneth, 肯尼思·阿罗, 13
- Arthur, Brian, 布赖恩·阿瑟, 70
-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See also U. S. Constitution, 联邦条例, 110;
也见美国宪法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30, 31
- asymmetric information, 不对称信息, 55
- Augsburg, 奥格斯堡, 129
- Bangladesh, 孟加拉国, 99
- Barro, Robert J., 罗伯特·J·巴罗, 57
- Bean, Richard, 理查德·比恩, 131
- Bechtel, William, 威廉·贝克特尔, 32
- beliefs, 信念, 2, 4, 8, 11, 23, 49, 50, 79, 83, 99, 102, 116,
117, 146, 157, 166, 167
- collectivist, 集体主义者, 135—136
- consciousness, 意识, 47, 103
- decisions, 决策, 117
- of entrepreneurs, 企业家的, 126
- formation of, ……的形成, 25
- institutions, 制度, 49
- non-rational, 非理性的, 2, 41, 56, 72, 102
- novel situations, 异常情况, 69
- order, 秩序, 104—105
- social context, 社会背景, 36
-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63
- Benx, Ernst, 厄恩斯特·本克斯, 137
- Black Death, 黑死病, 20
- Bonaparte, Napoleon, 拿破仑·波拿巴, 112
- Boyer, Pascal, 帕斯卡·博耶, 41

- Bremen, 布雷门, 129
- Brezhnev, L., L. 勃列日涅夫, 150, 151
- Buddhism, 58. See also religion 佛教, 宗教
- Burgundians, 勃艮第人, 142
- Calvinism, 43, 135. See also religion 卡尔文教派, 43, 135; 也见宗教
- capital; human, 人力资本, 48—49, 94
- physical, 物质资本, 48—49
- social, 社会资本, 75
- capital markets, 资本市场, 123, 125
- Carolingian Empire, 加洛林帝国, 129
- Castile, 卡斯蒂尔, 144
- Catholicism, 38, 128, 135. see also religion 天主教
- C-D gap, C-D 落差, 14
- Champagne Fair, 香槟集市, 132
- Charles V, 查理五世, 134
- Charles VII, 查理七世, 131
- checks and balances, 制衡, 68
- China, 中国, 88, 137, 159
- Chomsky, Noam, 诺姆·乔姆斯基, 29, 31
- Christianity, 58, 136, 137. see also religion 基督教
- Clark, Andy, 安迪·克拉克, 24, 32
- Coase, Ronald, 罗纳德·科斯, 156, 165
- coercion, 强制, 105
- cognition, 认知, 25, 31, 33—34
- cognitive science, 认知科学, 5
- Coke, Sir Edwards, 爱德华·科克爵士, 143
- Coleman, James, 詹姆斯·科尔曼, 75, 135
-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 101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4
-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社区责任制, 118
- Competence-difficulty gap, See C-D gap 胜任程度—困难度落差; 也见 C-D 落差, 31
- computationalism, 计算主义, 31
- Confucianism, 儒家, 58
- Congress, See U. S. Congress 国会, 也见美国国会
- connectionist models, 联结主义模式, 26, 30, 31, 72
- consciousness, 意识, 4, 6, 38, 43, 44, 47, 103, 167
- conscience, 良心, 39—40
- core, 核, 39
- extended, 扩展的, 39, 40
-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129
- Constitution, 宪法
- contract enforcement, 契约实施, 159
- cooperation, 合作, viii
- Cortes, (西班牙或葡萄牙的) 议会, 142
- Cosmides, L., L. 科斯米德斯, 29
- Costa, Dora, 多拉·科斯塔, 96
- Cox, Gary W., 加里·W·考克斯, 52
- culture, ix, 文化, 18, 30, 34, 46, 49, 50, 51, 69
- evolution of, ……的演化, 72
- mimetic, 拟态的, 34
- mythic, 虚构的, 34
- oral, 口头的, 34
- theoretic, 理论上的, 34, 35, 74
- variation in, ……的变异, 42
- Damasio, Antonio, 安东尼奥·达玛索, 37, 39, 45

Darwin, Charles, 38, 44, 65. See also evolution 查尔斯·达尔文

Davidson, Paul, 保罗·戴维森, 19

Davis, Lance, 兰斯·戴维斯, vii

De Figuerdo, 德·菲格雷多, 106

De Roover, R., R·德·鲁弗, 130

democracy, 民主, 56, 71

Demsetz, Harold, 哈罗德·德姆塞茨, 57

Diamond, Jared, 贾里德·戴蒙德, 88n. 2

Donald, Merlin, 默林·唐纳德, 26n. 5, 31, 35, 69

Dynegy, 迪奈基 122

Easterlin, Richard, 理查德·伊斯特林, 96, 99

economic revolution: first, 87; second, 87 经济革命

Edelman, Gerald M.,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 26, 40, 41

efficiency, 效率, 15

Eggertsson, Thrainm, 思拉恩·埃格特森, 58

Elman, Jeffrey, 杰夫里·埃尔曼, 31

Elster, Jan, 简·埃尔斯特, 58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3, 148

England, 英格兰, 89, 107, 109, 137, 138, 143, 145

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国, 108

Enron, 安然, 122

entrepreneurs. See organizations 企业家, 也见组织

environment, 28. See also uncertainty epigenesis, 环境, 28; 也见不确定性渐成说, 29

equilibrium, 均衡, 23, 69

ergodic, 各态历经的, 13, 19, 22, 163

Europe, 欧洲, vii, 112, 128, 129, 133—134

western, 西方的, vii, 78

evolution; biological, 生物进化, 6, 66

Darwinian, 达尔文进化, viii, 6

ecomomic, 经济演化, 66, 74

psychology, 心理学, 28, 29, 168

Exchange; impersonal, 非人格化交换, 71, 84, 119

market, 市场交换, 71

personal, 人格化交换, 70, 84, 119

fanaticism, 45. See also beliefs, religion, 盲从, 45; 也见信念, 宗教

Feldman, Julian, 朱利安·菲尔德曼, 27

Ferdinand and Isabella, 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 144

Ferejohn, John, 约翰·弗里基, 24

Fogel, Robert W., 罗伯特·W·福格尔, 95, 96

folk theorem, 无名氏定理, 29

France, 法国, 109, 131, 138, 140, 143

Franco, 佛朗哥, 144

Galileo, 伽利略, 44

game theory, 博弈论, 69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See also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一般均衡理论, vii; 也见新古典经济理论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 118

Gorbachev, Mikhail, 米凯尔·戈尔巴乔夫, 4, 150, 153

Gould, Stephen J., 斯蒂芬·J·古尔德, 28, 71

government, See also state 政府, 84, 123; 也见国家

Greif, Avner, 阿夫纳·格雷夫, 18, 69, 75, 118, 135

Grossman, Gregory, 格雷戈里·格罗斯曼, 151

guilds, 行会, 141

- Hahn, Frank, 弗兰克·哈恩, 62
- Hayami, Yujiro, 速水佑次郎, 58, 59, 75
- Hayek, Friedrich A.,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 5, 32, 33, 36, 42, 51, 56, 72, 73, 162
- Hazelhurst, Brain, 布赖恩·黑兹尔赫斯特, 50
- Heiner, Ronald, 罗纳德·海纳, 14
- Henrich, Joseph, 约瑟夫·亨利奇, 47
- Henry VIII, 亨利八世, 143
- Hexter, J. H., J. H. 赫克斯特, 145
- Hoffman, Elizabeth, 伊丽莎白·霍夫曼, 28
- human environment, 人类环境, 7
- Hundred Years' War, 百年战争, 131
- Hutchins, Edwin, 埃德温·哈钦斯, 33, 35, 36, 50
- Iceland, 冰岛, 58
- imperfect information, 不完美信息, 24
- incentives, 激励, 1, 17, 18, 61
-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155
-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87, 89
- informal norms. See norms 非正式规则
- information networks, 信息网络, 120
- institutional change, 制度变迁, 3, 6, 17, 18, 43, 45, 59, 62, 64, 65, 156, 166—167, 168
- economic change, 经济变迁, 64
- intentionality, See also consciousness 意向性, 1, 3, 4, 6, 38, 42, 47, 51; 也见意识
- Islam, See also religion 伊斯兰教, 38, 44, 58, 118, 129, 135, 139, 168; 也见宗教
- Italy, 意大利, 75
- 168 •

Japan, 日本, 57—58, 124, 155

Karmiloff-Smith, A., A·卡米洛夫-史密斯, 32

Kennan, George, 乔治·凯南, 150

Kim, Sukkoo, 苏库·金, 21n

Knight, Frank, 弗兰克·奈特, 13

knowledge, 知识, 30, 63, 73, 98

Kuran, Timur, 蒂穆尔·库兰, 136

laissez faire, 自由放任, 122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vii, 7, 78, 106, 112, 119, 155, 160,
161, 168

law merchant, 商法, 20

learning, 学习, 25, 26, 61, 67, 69

Lenin, V. I., 列宁, 3, 149

Lewin, Mosh, 莫什·卢因, 148

Libertarians, 自由主义者, 55, 122

Loasby, Brian, 布赖恩·洛斯拜, 73

Lucas, Robert, 罗伯特·卢卡斯, 13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43

MacFarlane, Alan, 艾伦·麦克法兰, 135, 140

Maddison, James, 詹姆斯·麦迪逊, 55, 68, 119, 165

Madrid, 马德里, 112

Maghribi traders, 马格里布商人, 118

Magna Carta, 卡斯塔·马格纳, 140

Maitland, Frederic W., 弗雷德里克·W·梅特兰, 140

manor, 庄园, 129—130

marine insurance, 海上保险, 20

- Marshall, Alfred,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65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3, 148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3, 16
- McCabe, Kevin, 凯文·麦凯布, 28
- McCubbins, Matthew D., 马修·D·麦卡宾, 52
- McFaul, Michael, 迈克尔·麦克福尔, 150, 151, 152, 153
- McGuire, Robert, 罗伯特·麦圭尔, 114
- McKeown, Thomas, 托马斯·麦基翁, 96
- medicine, 医学, 99
- mental models, 心智模式, 25
- Mexico, 墨西哥, 113
- Middle Ages, 中世纪, 128
- Milgrom, Paul, 保罗·米尔格罗姆, 118, 133
- Military technology, 军事技术, 20, 102, 103, 131, 162
- MIT, 麻省理工学院, 121
- Mokyr, Joel, 乔尔·莫可里, 98, 130
- Moors, 摩尔人, 144
- Muslim. See Islam 穆斯林, 见伊斯兰教
- Nazi, 纳粹, 3
-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新古典经济理论, vii, 64, 65, 84, 125
- Neolithic revolution, 新石器革命, 18, 19, 20, 87
- Netherlands, 荷兰, 133, 137, 138, 140, 145
- network externalities, 网络外部性, 59
-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新制度经济学, vii, 11
- non-ergodic, 非各态历经的, 5, 20, 21, 22, 42, 45, 62, 69, 162
- Norman conquest, 诺曼底人的军事征服, 140
- North, Douglass C., 道格拉斯·C·诺思, vii, 18, 57, 59, 78, 101, 107, 118, 132

Nove, Alec, 亚力克·诺夫, 150

Olson, Mancur, 曼库·奥尔森, 114, 124, 169

organizations, 组织, 59, 60, 61, 117, 121

Orleans, 奥尔良, 129

Paris, 巴黎, 129

Parliament, British, 英国议会, 133, 142

patents, 专利权, 21

path dependence, 路径依赖, 2, 6, 49, 51—52, 59, 62, 77

pattern recognition, 模式识别, 26

Petition of right, 权力请愿书, 145

Philip the Good, (15 世纪法国勃艮第的) 好人菲利普, 133

Philip II, 菲利普二世, 134

physical environment, 物理环境, 7

Pinker, Steven, 史蒂文·平克尔, 29

Pirenne, Henri, 亨利·皮伦尼, 139

Platteau, Jean-Philippe, 简-菲利普·普拉图, 58, 75, 100

political order, 政治秩序, 158

Portugal, 葡萄牙, 112, 138

Power, Eileen, 艾琳·鲍尔, 143

property rights, 产权, 1, 50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109

protestant reformation, 新教改革, 139

protestantism, 新教主义, 38, 43, 57, 135, 139

Putnam, Robert, 罗伯特·帕特南, 75

qualia, 个人感觉, 39, 40

- rationality, 理性, 5, 23, 24
- religion, 宗教, ix, 16, 19, 38, 41, 72, 83, 167
-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43, 45
- representationalism, 象征主义, 31
- risk, 风险, 13
-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 128, 129
- Rosenberg, Nathan, 内森·罗森伯格, 99
- Russia, 俄罗斯, 77, 168, 169
-
- Sacks, David, 戴维·萨克斯, 143
- Sakharov, Andrei, 安德烈·萨克哈夫, 153
- Samuelson, Paul, 保罗·萨缪尔森, 19
- Santa Fe Institute, 圣菲研究所, 70
- Satz, Debra, 德布拉·萨茨, 24
- scaffolding, 支撑框架, ix
- Schumpeter, Joseph, 约瑟夫·熊彼特, 20
- Searle, John, 约翰·瑟尔, 38
-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 108
- Silicon Valley, 硅谷, 122
- Simon, Herbert, 赫伯特·西蒙, 7
- Singapore, 新加坡, 67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57, 72, 84, 156, 162
- Smith, Vernon, 弗农·史密斯, 28
- Smolensky, Paul, 保罗·斯莫伦斯基, 30
- 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 75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4
- Solnick, Steven, 史蒂文·索尼克, 154
- Solow, Robert, 罗伯特·索洛, 19
- South Korea, 韩国, vii, 67

Soviet Union, 苏联, vii, 1, 3, 4, 19, 155, 160, 168, 169

Spain, 西班牙, 112, 138, 140, 143, 144

special interest, 特殊利益, 55

specialization, 专业化, 72

Stalin, Josef, 约瑟夫·斯大林, 105, 149, 150, 151

State, 国家, 119—120, 158

States General, 全国性议会, 133, 142

Steckel, Richard, 理查德·斯特克尔, 96

Stubbs, William, 威廉·斯塔布斯, 143

Stufflebeam, Robert S., 罗伯特·斯塔弗尔比姆, 31

Taiwan, 台湾, vii, 67

Tawney, R. H., R. H. 托尼, 135

Tea Act of 1773, 《1773年茶叶法案》, 110

Thomas, Robert, 罗伯特·托马斯, vii

Tonini, Guilio, 吉莱欧·托尼尼, 26

Tooby, J., J. 图拜, 29

Toulouse, 图卢兹, 129

Trotsky, L., L. 托洛茨基, 147, 148

Tudors, 都铎王朝, 143

Turner, Mark, 马克·特纳, 31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96

U. S. Civil War, 美国内战, 111


U. S. Congress, 美国国会, 54

U. S. Constitution, 美国宪法, 52, 110, 112

Vanberg, Viktor, 维克托·范伯格, 51n

Veblen, Thorstein, 索斯坦·凡勃伦, 65

-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57, 135
- Weights and measures, 度量衡, 159
- Weingast, Barry, 106, 巴里·温加斯特, 118
- Western world, 西方世界, 1, 44, 89, 100, 101, 118, 146
- White, Lynn, 林恩·怀特, 137
- Wilson, Edward O., 爱德华·O·威尔逊, 29
- Wohlgemuth, Michael, 迈克尔·沃格姆斯, 56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52
- Yeltsin, Boris, 鲍里斯·叶利钦, 153



参考文献

- Abraham, Anita and Jean-Philippe Platteau.
2002.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in the
Presence of Endogenous Community Imper-
fection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Namu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Adelman, Irma and Cynthia Taft Morris.
1971.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
velopment;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Balti-
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 Alston, Lee and Andres Gallo. 2001. The Ero-
sion of Legitimate Government; Argentina,
1930 - 1947.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Arrow, Kenneth J. 1951.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the Theory of Choice in Risk-Taking Situations. *Econometrica* 19(4), 404 - 437.
- Arthur W. Brian. 1992. On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in the Economy. Queen's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854(May).
- . 1999. 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 *Science* 284(April 2), 107 - 109.
- Arthur, W. Brian, Steven N. Durlauf, and David A. Lane. 1997.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II*.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Bairoch, Paul. 1988. *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ristopher Braider,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rkow, Jerome H. , 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 1992. *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ro, Robert J. 1996. Democracy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1), 1 - 27.
- Barzel, Yoram. 1997.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tes, Robert H. , Rui J. P. de Figueiredo Jr,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8.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26(4), 603 - 642.
- Baumgartner, Peter and Payr Sabine, eds. 1996. *Speaking Minds: Interviews with Twenty Eminent Cognitive Scienti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an, Richard. 1973.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1), 203 - 221.
- Bechtel, William and George Graham, eds. 1998. *A Companion to Cognitive Science*. Malden, Mass. :Blackwell.
- Bechtel, William, Adele Abrahamsen, and George Graham. 1998. The Life of Cognitive Science. In William Bechtel and George Graham, eds. *A Companion to Cognitive Science*. Malden, Mass. :Blackwell.
- Bendor Jonathan and Piotr Swistak. 2001. The Evolution of Norm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6), 1493 - 1546.
- Benz, Ernst. 1966. *Evolution and Christian Hope: Man's Concept of the Future from the Early Fathers to Teilhard de Chardin*. Garden City: Doubleday.

- Ben-Ner, Avner and Louis G. Putterman, eds. 1998. *Economics, Values, and Organ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yd, Robert and Peter Richerson. 1985.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yer, Pascal. 2001. *Religion Explained: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Religious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 Burnette, Joyce and Joel Mokyr. 1995. The Standard of Living through the Ages. In Julian L. Simon, ed. *The State of Humani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 Calvert, Randall. 1998. Explaining Social Order: Internalization, External Enforcement, or Equilibrium? In Karol Soltan et al., eds.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homsky, Noam. 1975.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Clark, Andy. 1997. *Being There: Putting Brain, Body, and World Together Agai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Clark, Andy and A. Karmiloff-Smith. 1993. The Cognizer's Innards: A Psych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Mind and Language* 8(3), 488 - 519.
- Coleman, Jame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sta, Dora A. and Richard H. Steckel. 1995. Long-Term Trends in Health, Welfa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Paper 76,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Historical Factors in Long Run Growth, November.
- Cox, Gary W. and Matthew D McCubbins. 2001. Structure and Policy: 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Policy Outcomes. In Matthew D. McCubbins and Stephen Haggard, eds.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and Regulatory Policy*.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Finance Division.
- Damasio, Antonio R. 1999.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David, Paul A. 1997.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Quest for Historical Economics: One More Chorus of the Ballad of QWERTY. *Oxford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No. 20(November).

- Davidson, Paul. 1991. Is Probability Theory Relevant for Uncertainty? A Post-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1) (Winter), 129-143.
- Davis, Lance E. and Douglass C. North. 1971.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wkins, Richard. 1998. *Unweaving the Rainbow: Science, Delusion, and the Appetite for Wonder* Boston: Houghton-Mifflin.
- Deevey, Edward S. 1971. The Human Population. In Paul R. Ehrlich, John P. Holdren, and Richard W. Holm, eds., *Man and the Ecosphere*.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Reprinted from *Scientific American* 203(1960), 195-204.
- De Figueiredo, Rui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9. Rationality of Fear: Political Opportunism and Ethnic Conflict. In Jack Snyder and Barbara Walter, ed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emsetz, Harold. 1967.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2), 347-359.
- Dennett, Daniel Clement. 1991.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Boston: Little Brown.
- . 1995. 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2 (20), 83.
- Denzau, Arthur T. and Douglass C. North. 1994. Shared Mental Model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Kyklos* 47(1), 3-31.
- Denzau, Arthur and Paul Zak. 2001. Economics Is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In Albert Somit and Stephen Peterson, eds. *Evolutionary Approache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Elsevier.
- De Roover, R. 1965. The Organization of Trade. In M. M. Postan, E. E. Rich, and Edward Miller,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Jared. 1997.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 Donald, Merlin. 1991. *Origins of the Modern Mind: Three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8. Hominid Enculturation and Cognitive Evolution. In C. Renfrew and C. Scarre, eds. *Cognition and Culture: The Archaeology of Symbolic Storage*. Uni-

- versity of Cambridge; Monographs of th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7 - 17.
- . 2000.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Stanford University; Second KNEXUS Research Symposium, July 31-August 2.
- . 2001. *A Mind So Rar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 Dopfer, Kurt, ed. Forthcoming.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si, G. , L. Marengo, and G. Fagiolo. Forthcoming. Learning in Evolutionary Environments. In K. Dopfer, ed.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asterlin, Richard A. 1996 [1998 paperback]. *Growth Triumphant;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 1999. How Beneficent Is the Market? A Look at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rtality.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3(3), 257 -294.
- Edelman, Geraid M. 1992. *Bright Air, Brilliant Fire; On the Matter of the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 Edelman, Gerald M. and Giulio Tononi. 2001. *Consciousness; How Matter Becomes Imagina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 Eggertsson, Thrainn. 1996. No Experiments, Monumental Disasters; Why It Took a Thousand Years to Develop a Specialized Fishing Industry in Ice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30(1), 1 - 23.
- . 1998. Sources of Risk, Institutions for Survival, and a Game against Nature in Premodern Icelan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5(1), 1 - 30.
- Elman, Jeffrey. 1998. Connectionism and Artificial Life. In William Bechtel and George Graham, eds. *A Companion to Cognitive Science*, 496. Malden, Mass. : Blackwell.
- Elster, Jon. 1989. Social Norms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4), 99 - 117.
- . 1996. 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 *Economic Journal* 106(438), 1386 -1397.
- . 1998. Emo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

(1), 47 - 74.

Elton, G. R. 1953. *The Tudor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rdinand, P. 1992. Bukharin an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A. Kemp-Welch, ed. *the Ideas of Nikolai Bukhari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Fogel. Robert W. 2003. *The Escape 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 1700 - 2100; Europe,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gel, Robert W. and Dora L. Costa. 1997. A Theory of Technophysio Evolution, with Some Implications for Forecasting Population, Health Care, and Pension Costs. *Demography* 34(1), 49 - 66.

Greif Avner. 1989. Reputation and Coalition in Medieval Trade: Evidence on the Maghribi Trader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4), 857 - 882.

———. 1993. 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 The Maghribi Traders' Coal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3), 525 - 48.

———. 1994a. On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Late Medieval Commercial Revolution: Genoa During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2), 271 - 287.

———. 1994b.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5), 912 - 950.

———. Forthcoming a. *Institutions;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rthcoming b. Impersonal Exchange without Impartial Law; The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Grossman, Gregory. 1998. Subverted Sovereignty; Historic Role of the Soviet Underground. In Stephen S. Cohen et al. , eds. *The Tunnel at the End of the Light: Privatization,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Digital Collection, Research Series # 100, <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research/100>>.

Haber Stephen, Armando Razo, and Noel Maurer. 2003. *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 Rights, Political Instability, Credible Commitm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 1876 - 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hn, Frank H. 1987. Information, Dynamics, and Equilibrium.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4(4), 321 - 334.
- Hayami, Yujiro and Masahiko Aoki, eds. 1998.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IEA Conference Held in Tokyo,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EA Conference Volume, no. 127.
- Hayek, F. A. 1952 *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79.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Heiner, Ronald. 1983. 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4), 560 - 595.
- Henrich, Joseph, Robert Boyd, Samuel Bowles, Colin F. Camerer, Ernst Fehr, Herbert Gintis, and Richard McElreath. 2003.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s: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2), 73 - 79.
- Hexter, J. H. 1992. Introduction. In J. H. Hexter, ed. *Parliament and Liberty from the Reign of Elizabeth to the English Civil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ll, Kenneth. 1995. The Decline in Childhood Mortality. In Julian L. Simon, ed. *The State of Humani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 Hodgson, Geoffrey. 1993.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offman, Elizabeth, Kevin McCabe, and Vernon Smith. 1998.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Reciprocity: Experimental Economics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Economic Inquiry* 36(3), 335 - 352.
- Hogarth, Robin M. and Melvin W. Reder, eds. 1987. *Rational Choice; Th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lland, John H. et al. 1986. *Induction; Processes of Inference, Learning, and Discove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ughes, J. R. T. 1977. *The Governmental Habit*. New York: Basic Books.
- Hutchins, Edwin. 1995. *Cognition in the Wil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utchins, Edwin and Brian Hazelhurst. 1992. Learning in the Cultural Process. In C. G. Langston et al., eds. *Artificial Life II*. Redwood City, Calif.: Addison-Wesley.
- Karmiloff-Smith, A. 1994. Precis of Beyond Modularity: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Cognitive Science(with Peer Commentar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7(4), 683 - 745.
- Keefer, Philip. 2002. Clientelism, Credibility, and Democracy.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November).
- Knight, Frank H.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
- Knight, Jack and Douglass C. North. 1997. Explaining Economic Change: The Interplay Between Cognition and Institutions. *Legal Theory* 3(September), 211 - 226.
- Kremer, Michael. 1990. 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ne Million B.C. to 19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3), 681 - 716.
- Kuran, Timur. 1986. The Economic System in Contemporary Islamic Though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8(2), 135 - 164.
- . 1997. Islam and Underdevelopment: An Old Puzzle Revisited.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3(1). 41 - 71.
- . 2003. The Islamic Commercial Crisis: Institutional Roots of Economic Under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3(2), 414 - 446.
- Law Marc and Sukkoo Kim. 2003. Specialization and Regulation: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s" and the Emergence of Occupational Licensing Regulation in America. Draft,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aint Louis. Used by permission.
- Lewin, Mosh. 1995. *Russia/USSR/Russi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Loasby, Brian J. 1999. *Knowledge, Institutions, and Evolution in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Lucas. Robert. 1981. Tobin and Monetarism: A Renew Artic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2)(June), 558 - 567.
- Lupia, Arthur Samuel L. Popkin, and Mathew D. McCubbins, eds. 1999. *Elements of Reason: Cognition, Choice, and the Bounds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farlane, Alan. 1978.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Oxford: Oxford U-

- niversity Press.
- Maddison, Angus. 1995.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 - 199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Maifland, Frederic W. 1963.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A Course of Lectur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ski, Charles F. 1996. Treatment under Ambiguity. Santa F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96 - 10 - 078.
- Martens, Bertin. 1999. The Cognitiv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Behavior as a Response to Uncertainty. Working Paper, Max Planck Institute.
- . 2004. *The Cognitiv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 McCabe, Kevin. 2003. Reciprocity and Social Order; What Do Experiments Tell Us about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 McCauley, Robert. 1998. Levels of Explanation and Cognitive Architecture. In William Bechtel and George Graham, eds. *A Companion to Cognitive Science*. Malden, Mass. : Blackwell.
- McFaul, Michael. 1995.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World Politics* 47(2), January, 210 - 243.
- . 1999. Lessons from Russia's Protracted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t Rul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4(1), 103 - 131.
- . 2001.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cGuire, Martin and Mancur Olson. 1996. The Economics of Autocracy and Majority Rule;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Use of For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1), 72 - 96.
- McKeown, Thomas. 1976. *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ilgrom, Paul R. , Douglass C. North,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0.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 The Law Merchant, Private Judges, and the Champagne Fair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1), 1 - 23.
- Miller, Gary. 1992. *Managerial Dilem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Press.
- Mitchell, Brian R. 1975.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 - 1970*. London: Macmillan.
- Mitchell, Brian R. 1983.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The Americas and Australasia, 1750 - 1988*. London: Macmillan.
- Mokyr, Joel. 1990. *The Lever of Rich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0.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art Van Ark et al., eds. *Productivity,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Hague: Kluwer Academic Press.
- . 2002. *The Gifts of Athena: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wabu, G., C. Ugaz, and G. White, eds. 2001. *Social Provision in Low Income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 . 1990a. 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4), 355 - 367.
- . 1990b.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1.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s Costs, an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In J. Tracy,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4.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3), 359 - 368.
- . 1995a. Five Propositions about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Jack Knight and Itai Sened, eds. *Explaining Social Institu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 1995b. The Paradox of the West. In R. W. Davis, ed. *The Origins of Modern Freedom in the We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and Robert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and Barry R. Weingast.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

- 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4), 803 - 832.
- North, Douglass C., William Summerhill, and Barry R. Weingast 2000. Order, Disorder, and Economic Change: Latin America versus North America. In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Hilton Root, eds. *Governing for Prosper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Nove, Alec. 1969.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S. R.* London: Allen Lane.
- 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n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inker, Steven. 1994. *The Language Instinct: 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 Pirenne, Henri. 1963. *Early Democracies in the Low Countries: Urban Socie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latteau, Jean-Philippe and Yujiro Hayami. 1998.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frica versus Asia. In Yujiro Hayami and Masahiko Aoki, ed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IEA Conference Held in Tokyo, Japan*, 357 - 41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EA Conference Volume, no. 127.
- Powell, Walter. 1996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2(1), 197 - 215.
- Power Eileen. 1941(1965). *The Wool Trade in English Mediev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evite-Orton, Charles. 1960. *The Shorter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akove, Jack, Andrew R. Rutten, and Barry R. Weingast. 2001. Ideas, Interest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orking Paper, the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 Roeder, P. G. 1993.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erg, Nathan and L. E. Birdzell. 1986. *How the West Grew Rich*.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senberg, Charles. 1979. The Therapeutic Revolution: Medicine, Meaning, and Social Chang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n M. Vogel and C. Rosenberg, eds *The Therapeutic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acks, David. 1992. Parliament, Liberty, and the Commonwealth. In J. H. Hexter, ed. *Parliament and Liberty from the Reign of Elizabeth to the English Civil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muelson, Paul A. 1969.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Theory. In Robert W. Clower, ed., *Monetary Theory*. London: Penguin.
- Satz, Debra and John Ferejohn. 1994. Rational Choice and Social Theo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91(2), 71.
- Searle, John R. 1997 *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Solnick, Steven. 1998. *Stealing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olow, Robert M. 1985.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2)(May), 328 - 331.
- Stiglitz, Joseph, T. Hellman, and K. Murdock. 1998. Financial Restraint and the Market-Enhancing View. In Yujiro Hayami and Masahiko Aoki, ed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IEA Conference Held in Tokyo,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EA Conference Volume, no. 127.
- Stubbs, William. 1896.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ufflebeam, Robert S. 1998. Representation and Computation. In William Bechtel and George Graham, eds. *A Companion to Cognitive Science*. Malden, Mass: Blackwell.
- Tawney, R. H. 1926.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 Tooby, J. and L. Cosmides. 1992.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 In H. Barkow, L. Cosmides, and J. Tooby, eds. *The Adapted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Mark. 2001. *Cognitive Dimensions of Soci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6.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 C. : U. S. Govt. Printing Office.
-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01.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 U. S. Govt. Printing Office.
- Vanberg, Viktor. 1994. *Cultural Evolution, Collective Learning, and Constitutional Design*. Dordrecht and Boston: Kluwer Academic.
- Wallis, John Joseph and Douglass C. North. 1986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88. Should Transaction Costs Be Subtracted from Gross National Produc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3), 651 - 654.
- Weber, Max. 1904[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
- Weingast, Barry. 1998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the Civil War: Institutions, Commitment,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n Robert H. Bates, Avner Greif Margaret Levi, Jean-Laurent Rosenthal, and Barry R. Weingast, *Analytical Narrativ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eingast, Barry and William J. Marshall 1988.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Congress; or, Why Legislatures, Like Firms, Are Not Organized as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1), 132 - 163.
- White, Lynn 1978. *Medieval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lliamson, Oliver E. and Scott E. Masten, eds. 1999. *The Economics of Transaction Costs*.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 Wilson. Edward O. 1998.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New York: Knopf.
- Witt, Ulrich. 1992. *Explaining Process and Change: Approaches to Evolutionary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Wohlgemuth, Michael. 2003. Democracy as an Evolutionary Method. In P. Pelican and G. Wegner, eds. *The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Economic Policy*. Northampton, Mass. : Edward Elgar.



后 记

经济变迁是经济学中最富魅力却又远未得到充分解释的领域。为什么西欧能有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却一直陷于贫困之中？如何解释前苏联经济的兴衰历程？以诺思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拓展了我们对于制度变迁的认识，其主要贡献在于将制度与经济绩效联系起来：制度决定人类行为的激励结构，由此导致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然而，人们能设计最优制度实现意愿的经济增长吗？经济变迁是人类有意识行为的结果，人类意识与经济现实的

巨大差异表明，我们不仅需要理解最优制度设计，而且需要研究人类的认知过程，因为认知过程的深化无疑会拓展可行的制度集的边界，而认知过程的滞后则使有利可图的制度无法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就需要拓展原有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使之能够对人类心智结构的变迁提供更好的诠释，并对制度的未来演进做出更好的预测。诺思的这本《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就是探索人类意识与经济绩效关系的有益尝试。在这本发轫之作中，诺思详述了他对经济变迁过程的理解：人类信念决定他们所做的选择，进而决定他们所采取的行动。这一框架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经济变迁过程的认识，而且能够为我们有意识地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提供启示。

我们这次不啻余力翻译《理解经济变迁过程》，旨在为了解国外制度研究的前沿提供良好的契机，也为我国正如火如荼进行的经济社会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翻译具体分工如下：高东明、陈长江翻译第1、2章和前言、封底部分；邢华、陈长江翻译第3、4和13章；赵晓男、陈长江翻译第5和6章；钟正生翻译第7、8和9章；尹振东、王成思翻译第10、11和12章以及第二篇的引言。王宝来阅读了全书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杨瑞龙、郑江淮教授统一校对了全书。

诺思的思想博大精深，本书涉及的领域亦非常庞杂，因此，翻译本书既是一次令人赏心悦目的精神之旅，也是一次对我们学力和精力的考验。在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我们只能诚惶诚恐地指出，本书的翻译可能存在不少问题和错误，还请诸位方家不吝指正。

杨瑞龙

2007年10月30日